生 如 逆 旅

武云溥 著

Without you

人生如逆旅，

我亦是行人。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生如逆旅

作者:武云溥

ISBN:9787508652566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总序
醉能同其乐，醒能著以文

一

六根者谁?

李辉、叶匡政、韩浩月、绿茶、潘采夫、武云溥。

六根何来?

约8年前，天津作家杨显惠来京，之前采访过杨老师的武云溥组织了一个饭局，席间有李辉、韩浩月、潘采夫、武云溥、绿茶等，大家相谈甚欢。饭后李辉提议，这个饭局以后定期举行。就这样，一个不定期的酒局就形成了。不久，叶匡政加入酒局，形成了后来固定的六根酒局。

二

一件小事坚持多年就成了事，六根酒局8年下来已成习惯，个把月不喝一顿就酒瘾泛滥，只要不是两个人以上出差，我们总能找到喝一顿的各种理由。谁出书啦，祝个贺；谁出国啦，送个行；谁生日啦，喝个酒；谁有娃啦，认个老……

这几年，我除了六根酒局其他时间从不喝酒，所以，尤其珍惜每一顿酒。8年来，细算下来应该喝了小100顿酒，如果把喝酒的馆子记

录下来，会是一个不错的北京东部喝酒地图，遗憾我们从没记录。经常在酒局上，会聊起哪儿哪儿饭菜不错，哪一顿酒局谁醉过，又一起在哪儿喝酒看世界杯、欧洲杯以及各种杯。我们不挑食不挑酒，要的就是那种把酒言欢的状态。每次酒局李辉一般会带上两瓶好酒，我们酒量都一般，两瓶喝完正好合适，但通常这时候酒兴正浓，聊意正嗨，再补一瓶，喝到微醺。

六根是个开放的酒局，几乎每顿都有朋友列席，先后参加过六根酒局的朋友几年下来应该不下百人。张维娜和段旭两位美女由客而主，成了六根酒局核心喝客，她俩的加入让六根酒局有了更多欢乐的要素，不再是几个老男人傻喝。而且，她们也为六根做了突出的贡献，六根公众号的logo就出自段旭之手，维娜一度任六根公众号执行主编，编六根公众号很长时间，后来因为工作繁忙卸任。赵勇力和老武是发小，被老武“忽悠”来北京后，也频频在六根酒局喝起来，他话少，但酒量大；最后加盟六根核心吃客的是“醉醒客”丛书责编杨爽姑娘，她为我们几个老男人的小书稿真是操碎了心，最终，大家所看到的觉得好的都是杨爽的功劳，不好的地方都是我们自己太拖沓或小书本身的不足。

三

2014年5月的一次酒局上，我提议开通六根公众号。当时，大家貌似喝得有点迷糊了，被我酒后一通忽悠，竟个个举手赞同，恨不得当即立刻马上就开个号来玩儿。这一晚，基本上被我折腾成公号日，想了一堆名字，什么“酒嗝”、“五六七八酒”等等。最后，李辉提议的“六根”获一致认可。趁着大家酒后爱逞强的劲，把活都安排下去。老武注册公众号，段旭设计logo，潘采夫写卷首语，我编辑后台，每个人攒一堆稿子备用，这事儿就这么熙熙攘攘地定下来了。

当天晚上，老武就把公众号注册了；第二天，李辉就发了一堆稿子给我；第三天，段旭就把logo初样发群里讨论；第四天，潘采夫把卷首语写好了；剩下的拖拉机们，就假装自己那天晚上喝多了，啥也没听见。还好我有十几年编报纸催稿的经验，每天在六根群里喊杀，在六目睽睽之下，总算有一搭没一搭地来了一些稿子。

2014年6月6日，六根公众号正式上线，六根酒局第一次这么任性地给自己找了个喝酒的由头。我们按年龄排列六根更新频次，周一李辉，周二叶匡政，周三韩浩月，周四绿茶，周五潘采夫，周六武云溥，周日，六根荐书。

四

头根李辉，是六根的精神领袖。最靠谱的代表，从不拖稿，每次周一刚推完他的根文，周二就发来下周的根文，然后在群里喊“已交下周一根文”，这时候其他几篇本周的根文还不知道在哪儿呢。除了交稿靠谱，李辉的稿子也最是靠谱，“脚根”系列更是独一无二，描绘他这些年寻访过的名家故地，国内外走透透，带给人完全不一样的行走体验。

李辉稿件最大的优点就是，一个压缩包内，文图齐备，解开来直接往后台一编，不到半个小时就齐活。那些独家收藏的老照片更是弥足珍贵，比如写萧红那篇，端木蕻良题赠给李辉夫妇的“黄金时代”四个大字，现在看来是不是冥冥中的巧合安排？尤其突出的是，李辉交稿很有媒体人独有的对时效的敏感，如果是旧文，都会加上前言，描述选登该文的理由，没有编辑不欢迎这样的稿子，几乎你能想到的，辉爷都替你想到了。

叶帅叶匡政写诗写时评，文章产量之高让人惊叹。但他通常十天半个月不在群里露面，各种催稿对他无济于事，必须再短信确认一下。然后，他会一口气发过来一批，在群里@你一下后，又隐身不见。但每次酒局通知在群里发布后，他马上会露脸说：“我去我去。”然后，通常是后半局才匆匆赶来，因为他每天饭局太多了，赶场是常态。

他的文章比较高大上，各种儒家各种古典，时评也能让他导到几千年前去说事儿，通篇读完云里雾里，又觉得特别有道理。读他的文章我最关注如何从中找出配图的关键字，往往读好几遍不知道如何配图。最后只好找一张诸子老人家的图了事，毕竟文中引用了不少这些老人家的话。

韩浩月我喜欢叫他老浩月或月老。有一次我编六根荐书，不知怎么着就把他的名字打成“老浩月”，发出来后我一个劲儿赔不是，没想到他倒挺美，久而久之我们就叫开啦。他撰文产量可能是六根里最多的，专栏所涉无死角，时评、情感、书评、鸡汤，没有他不能写的。因为存量足够，又加上每天还在不断新产，所以，他的根文从未断过，有时候还会替其他拖拉机手顶文。

再一点，他是唯一能把文章编好放在后台素材库的，我只需点一下推送就可以。有时候我会行使一些主编权力，修改一下标题，他的文章里能抽出很多好标题，就像“老男人恋爱，就像老房子着火”这一类标题，都来自他的文章。曾有一段时间，我把他所有的文章都改成“老男人系列”标题，那组文章的阅读量都比较可观。难怪，他那么喜欢老浩月的称呼。

潘采夫是最不靠谱代表，他其实稿量也不少，存货丰富，但就是不交稿，说什么主动交稿存在感多差啊。想当年，他编《新京报》文娱时评版，基本上就是下午两点开完选题会，6点要把版编出来，他就是习惯这样的节奏，早交稿他心里觉得慌。当年，我们一起在报社服

务时，有一些约稿上的交集，通常是我帮他约稿，比他还着急。记得每次有重要历史题材电影上演，不等他催，提前几天我就跟杨念群老师约稿，然后，等他找我约杨老师稿时，稿子已经妥妥地在我邮箱里了。

这位小濮洲的十字街骑士，一不留神骑到爱丁堡去，写的小濮洲和爱丁堡随笔都特别好看。异域文化的交叉让他文风大变，他也成了我不太认识的爱丁堡骑士和小濮洲绅士。

武云溥是六根中的“80后”代表，当年我在报社时的最佳搭档。把选题交给他特别放心，到排版日他稿子自动到邮箱里，可以不用编辑直接下版，大小标题全都有模有样，甚至字数都差不离，也校不出什么错字，就这么靠谱。离开报社后，这些年他尝试了很多工种，同时升格为奶爸，产量严重受影响，也成了著名拖拉机手。早期的文章现在读来还是文笔绚丽、内容扎实。不久前汪国真去世，他捞出早前的采访稿，可以说是那几天最有分量的文章，刷屏朋友圈。后期从事商业报道，写了很多有质量的非虚构报道，但我对商业无感，还是觉得早期文章更好。

他发烧各种电子产品，对各种最新的网络应用也精通无比，唯独对微信公众号完全无感，口口声声说要接手六根主编之职，至今没见他在后台有动作。老武老比画，真枪见功夫，哈哈。

我自己个儿嘛，没什么好说的，他们把我推为主编，我就“主要负责编”。本来写文章就少，这些年做了奶爸更是笔耕迟钝，又因为开了一堆公众号，给自己挖了好几个大坑，每天都处在从一个坑到另一个坑的艰难跋涉中。

五

2014年10月，全职奶爸两年后我再次成为上班狗，加盟了中信出版集团。一来二去认识了美女同事杨爽，她是中信去年最畅销图书的执行策划编辑，在百万级以上。我向她推荐了六根公众号，她看了表示有点喜欢，然后，我不怀好意地向她提出想出一套六根丛书，以为她会当即否掉。因为他们分社以出版畅销书为主，像六根这样的小众书肯定不是她们的菜。没想到的是，她对六根丛书挺上心，让我们交了一些样章就开始走起了选题流程，更没想到的是，选题居然通过了。

我们专门组了温州大排档酒局，把“百万大编”杨爽请来。这一顿美坏了六根，第一次消灭了5瓶白酒，好像600万正在向我们招手一样。酒过六巡，签了合同，六根丛书正式启动。之后的每顿酒局，我们有了更明确的主题和由头。一顿商量截稿日，一顿商量丛书名，一顿合计书名，一顿描绘宣传方案……书没出，已经喝了不下六顿酒。

尤其是丛书名，群里几乎天天争吵个不休，什么“十字街”、“思无邪”、“六扇门”……什么鬼名字都有，我则一天到晚刷屏“醉醒”。也许是被我刷习惯了，起名高手李辉来了个“醉醒客”，再次获选，“六根”和“醉醒客”均出自他的命名。然后，越想越觉得这个名字好，怎么看怎么顺眼。有了好名字，如果再有一个好设计，就更完美了。每当这个时候，我第一个会想到一直葱白的设计师朋友胡颖。

2015年3月，我请胡颖帮忙设计醉醒客logo，他答应了。一周后，他给了我一个完整的logo方案，把我们六根都惊呆了，太完美了。

胡颖在自己“北平会”公号里，对这个设计做了一个释义：“醉醒客是一套丛书的名。绿茶兄给的视觉命题，并释义：挚友六人，号六根，持续了八九年的酒局，几乎每个月喝一顿，很固定，每次喝到微醺，也偶醉，但我们相信自己都有清醒的头脑，故名‘醉醒客’。

设计的工作从收集整理信息开始，以上可得出的关键词：友、六（固定），酒（酉本字、象形），醉、醒（夜饮东坡醒复醉）、客（梦里不知身是客）。把这些信息通过视觉加工出来，设计就完成了。”

六根下一顿酒局，最重要的嘉宾就是胡颖。

有了好的丛书名，每本书还要有好的书名。百万美女大编说现有的书名都不行，彻底重起。起书名酒局在懒人餐厅喝起，酒过六巡，各种书名满天飞。

老浩月是起书名高手，蹦出好多好词，在李辉的“脚跟”系列中，找到一句“雨滴在卡夫卡的墓碑上”，并把这个书名送给李辉。大家都觉得意境很对，李辉自己也很喜欢，“雨滴在卡夫卡墓碑上”就成了李辉这本的书名。

起了那么多书名的老浩月，最终忘了给自己起书名。在之后的每天，他在群里给自己起书名，大家也每天一场书名会，就是没给月老想出一个书名。这场书名大战持续了两个月，直到5月6日，“错认他乡”这个书名才最后落到浩月头上，大家一致认为该书名有范儿。

叶帅的书，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起名，但是他自己任性地起名为“可以论”。好吧，可以。

潘采夫整晚拿着手机一首首念茨维塔耶娃的诗，好像每一句都是书名，在他念得口干舌燥时，我从茨娃诗中听到一句“在风中小站片刻”，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在书中小站片刻”就成为我这本的书名。

我也回赠他一个书名“从小濮洲到爱丁堡”，但“十字街骑士”在他心中是霸气的童年回忆，谁也无法动摇。

最后，只有老武的书名还在比画。

六

六根六人，数我文笔最差，总序却落我头上，理由是，我是六根主编，最了解六根公众号和每个人的风格，这事儿必须摊我身上。我是六推不掉，只好闷一口酒，应了。就这么点儿事，被我拉拉杂杂写这么老长的流水账，真是醉了。

醉醒客。

绿茶

2015.6.6

唐山1976：伤城往事

你将要阅读下面的文字，如同你拿起一盘磁带。现在很少有人使用磁带这种古老的记录工具了，它有两个面，A面和B面，两面记载的内容可能不尽相同。

下面的文字与一场巨大的灾难有关，记录灾难的方式和作品有很多。媒体人钱钢写过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导演冯小刚拍摄影片《唐山大地震》，唐山本地作家张庆洲曾经写过纪实文学《唐山警世录》，后来又出版了长篇小说《红轮椅》。

你可以相信你所看到的，因为每个面对灾难的记录者都会心怀敬畏。你也可以不相信眼前的一切，因为时光无法倒流，往事不可重现。但你应该知道，写进书里的故事远非全部，同一个故事也可以有不同的解读。

每年7月28日，

夫妻俩心照不宣，

各自出门。

你去祭奠前妻，

我去拜祭亡夫。

1976年7月28日，唐山无雨

A面

天说黑就黑了。江心平搭上了一辆开往唐山的“大解放”。

汽车大灯划破了层层黑暗。远处蓦地腾起三个火球，跳跃滚动，耀眼夺目。

火球在田野滚动片刻就消失了。江心平说，这是地震前兆。

老司机哈哈笑了：“这黑更半夜的，闺女你没吓着吧？我清早打唐山出来，啥事儿没有。这要有地震，唐山能不报警？哈哈，一准儿是阶级敌人造谣哇。”

凌晨3点半。呼呼的风声响着，夜空出现泛泛的藕荷色的光，一闪一闪的，还伴着越来越大的闷雷声，似乎大暴雨就要来了。

不对呀，柳树叶儿纹丝不动，也没有沙粒打在脸上，江心平猛然警醒。哪来的大暴雨？这是大自然发出的最后警告——地光和地声。她扯着嗓子叫起来，叫声被更大的巨响吞没。

唐山碎了。

B面

江心平是《红轮椅》的女主人公，一个虚构的人物。张庆洲写这本小说时，想起的是1976年7月28日凌晨的唐山火车站。

那年他17岁，是铁路工人子弟。当时的唐山站如今改称唐山南站，只运货物，不运人。可在那天之前，这里旅客云集，往来繁忙。铁道部规定，列车经过唐山站，停靠7分钟。

7月27日晚上就特别热，候车厅里更像个蒸笼。旅客们耐不住，纷纷跑到站前广场上乘凉。

他们听到风声，看到“打闪”。大家都等着暴雨来临。

倘若有预见灾难的先知，在这个时刻大约也会庆幸吧，旅客们都在户外，户外就意味着相对安全。

凌晨3点半，距离大毁灭还有十几分钟的时候，突然有个女人发了声喊：“来雨了，大雨！”然后她就撒腿“蹽”进了候车大厅。

蹽，唐山话常用的动词，意为迅速走、大步跨。

周围的人跟着蹽进屋。

远处的人不明所以，见大家都往大厅跑，也就跟着跑。

只要有人带头，不需要过多言语，一个就能带动十个，十个带动一百个。

不出10分钟，广场上的人群一扫而空，旅客们全进了大厅。

他们再没出来。

候车大厅有宽阔的顶棚，沉重的钢筋水泥，从半空拍下来。

张庆洲擦擦眼睛，说，那天晚上在唐山火车站的人，只有一个检票员活下来。

这个大难不死的检票员，一定曾经满腹狐疑地仰望夜空：

没有下雨啊。

唐山市地震办负责人说：我有愧

A面

1976年11月8日，国家地震局《地震工作简报》第17期，标题为《青龙县在唐山大震前采取了预防措施》。

简报写道：由于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及中国科学院的柳忠阳插手国家地震局，严重干扰和破坏唐山大地震的预测预报工作，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由于县委重视，事先采取了有力的临震预防措施，广大群众有了思想准备，临震不乱，虽然房屋建筑遭到较重破坏，但人畜伤亡极小，收到了预防的效果。

这份简报末页注明，共印发430份。

还有一份出版于1991年7月25日的《中国地震报》，整版通栏标题是《一桩鲜为人知的事实：河北省青龙县在唐山大地震前采取了预防措施》。下面刊发了若干当事人的记叙文章，如王进志《唐山大震前我们青龙是作了准备的》、王春青《唐山大震前情况回忆》、赵树枝《唐山大震前大丈子乡的预防情况》……

河北省青龙县，距唐山市115公里，地震中有房屋倒塌，但无一人死亡。这在中国地震预防史上，被称为“青龙奇迹”。

B面

张庆洲拿出一叠纸页泛黄的文件，除了上面提到的《简报》和《中国地震报》，还有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唐山地震》，地震出版社1979年版。

张庆洲说，你看，1979年啊，地震局的专家就承认，唐山地震是漏报的。

“漏报”的依据，是小册子里列举的大量数据，比如“根据对唐山地区及周边48个县的调查，共搜集到70多种动物前兆异常2093起，其中以老鼠、黄鼠狼、猪、狗、猫、羊、鸡、兔等动物最普遍”。还有一些关于震情上报的记录：“六七月份，有些群测点及台站主动上报震情……到7月中旬以后，震情更为严重，京津地区地下水变化情况，引起有关单位密切注意，他们多次召开紧急会议，向上级汇报震情……”

1996年，张庆洲出版了长篇小说《震城》。不久，他接到一个神秘电话，对方不肯透露身份，只是告诉张庆洲，唐山大地震事先就预测出来了，但没有公开。欲知详情，可以去找一个叫杨友宸的人。

杨友宸，生于1932年，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1957年被定为“严重右倾”。1968年，杨友宸受命担任唐山市地震办公室负责人，创建许多基层监测台站，主抓地震预防工作。

“那个年代，右倾的意思是可以用你，但是不信任你。”张庆洲说，杨友宸领导的唐山市地震办公室，是正式的行政单位，不是后来有些人说的所谓“群众监测点”。1976年震前几个月，唐山地震办已经监测到了大量异常现象。

最终没有公开预报，是因为就在震情危急的7月，杨友宸突然接到命令，派他去干校“改造”。

“从1968年到1976年，苦苦抓苦苦抓，都摸着地震的尾巴了……”张庆洲叹息。

张庆洲找到杨友宸的时候，已经是1998年10月。

张庆洲问：“派你去干校，临走是什么心情？”

杨友宸哭了，说：“我有愧。”

“为什么？”

“我跟老伴说了，唐山震情危急，近些天就可能发生大震，你和老人、孩子们千万注意啊。我还给她讲了讲地震逃生知识。”

“后来呢？”

杨友宸痛哭流涕：“地震后，我家人一个没死，可是我心里更难受。我作为地震工作者，不能公开预报，只能悄悄告诉家里人。我没辙，真没辙啊。”

2005年，《报告文学》杂志增刊发表了张庆洲的长篇纪实《唐山警世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2006年初，该书单行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原国家地震局局长宋瑞祥欣然作序：“我相信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愿意看到地震灾害给人类带来的死亡和创伤。”

“杨友宸已经去世了，”张庆洲说，“我还记得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泪水始终不干。”

有的人死了，有的人活着

A面

2009年3月5日，唐山大地震纪念碑前。

风声猎猎，有市民放起一只形状诡异的黑色风筝。

碑文上书：唐山乃冀东一工业重镇，不幸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四十二分发生地震，震级七点八级，震中烈度十一度，震源深度十一公里。是时，人正酣睡，万籁俱寂，突然地光闪射，地

声轰鸣，房倒屋塌，地裂山崩，数秒之内，百年城市建设夷为墟土。24万城乡居民殁于瓦砾，16万多人顿成伤残，7000户家庭断门绝烟。

与纪念碑一街之隔，是唐山市百货大楼。夜幕降临，霓虹闪烁，人流如织。

这是一座崭新的城市。马路宽敞，横平竖直，即便最老旧的建筑，也不过30多年历史。穿着入时的姑娘们说笑着走进麦当劳，听见店员用韵味十足的唐山话招呼："来个鸡腿堡中不？"

"废墟上崛起的新唐山"，至少外表看上去，和中国任何同等规模的城市无甚不同。

路边，一个满面尘灰的中年男人，定定地看着远处。他坐在一辆手摇三轮车上，车后竖着小牌子：修锁配匙。

据说，这种手摇三轮车专为截瘫患者设计。而在唐山的地震截瘫群体中，许多人都从事"修锁配匙"的行当，凭手艺吃饭。

看不见的伤城，藏在唐山人心里。

B面

唐山人张庆洲说自己很幸运。

他在家排行最末，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七二八"之后，大姐震亡，二姐的孩子震亡。全家只失去了两位亲人，张庆洲说，这在唐山算很轻的。

大灾刚过，幸存者往往来不及悲伤。

最难过的，是灾后第一个春节。

“咱们中国人讲究团圆，所以唐山震后这第一个年三十，就真的过不去。”张庆洲说，“家家都缺了人，怎么团圆？”

除夕夜，不知哪家先传出了哭声，好像是西边的一家吧，张庆洲努力回想。

紧接着两家、三家、五家……听不清了，因为自己家也哭作一团。

张庆洲在《震城》里写：哭声像海潮一样，席卷了整个唐山。

他听说，有人自杀，有人精神失常，不是一个两个。

之后，张庆洲开始有意识地学习心理学，关注心理干预问题。

“我家楼上有个女孩，死于地震，23岁。”张庆洲说，“地震时就她自己在家，我们那是三层的楼，没全塌，摇摇欲坠。她住二楼，大喊救命，后来就慢慢没声了。第二天她爸爸冒险上楼去看，下来就哭。”

原来，女孩的尸体平躺在地板上，三楼的楼板掉下来，把她困在中间，但身上并无伤痕。父亲稍一使力，就掀开了困住女儿的楼板。

她本可以自己逃出生天，但放弃了。

“我分析她当时就是吓坏了。”张庆洲说，“不得不承认，巨大的心理压力会让人崩溃。”女孩的母亲无法承受丧女之痛，3个月后自杀身亡。

当然，内心的力量是双刃剑，可杀人，亦可救人。在张庆洲寻访过的幸存者中，有许多人曾濒临死亡又最终获救，张庆洲问他们同一个问题：临死那一刻，你在想什么？

有人说，“哎呀不行了，完了完了，死定了。”

还有人说，“我不能死。”

“你为什么不能死？”张庆洲问。

“说起来挺不好意思，我是放心不下家里的钱。这钱不是我的，你知道，那会儿工资都少，同事们交情深，就私下搞了个‘互助组’——每家都拿点儿钱出来，凑在一起有几百块，巨款了。这笔钱按月轮流用，比方说这月你家盖房，你就拿去，下个月再给别家。我们管这种集资互助的办法叫‘打会’。地震时刚巧轮到我‘打会’，钱都搁家里了，这事我知道，我媳妇知道，别人就不知道了，也没立什么字据。”

“你媳妇知道不也中吗？”

“那不中，我那败家娘们儿啊，她指定不还！我要是死了，她指定不会还钱给大伙儿，我那帮朋友也不会来要这钱，这败家娘们儿，我知道她！所以我不能死，我不能让朋友们受委屈，我得讲信用。我就坚持着，努力喘气，最后终于得救了。我媳妇也没死。活着多好哇。”

截瘫人群的爱情

A面

江心平是大学生，美女，她的青梅竹马叫陆志国。

陆志国在地震中被砸成了截瘫。江心平不顾家人的反对，还是嫁给了陆志国，开始了一段艰难的无性婚姻生活。

《红轮椅》讲的这个故事，是不是太理想化了？

十几年前，张庆洲见到了唐山某学校的一位女教师。“特别震撼，她长得真漂亮。”

漂亮的女教师，丈夫是截瘫。两人当年是一同插队的知青，偷偷恋爱三年。

他先返城，她还在劳动。惊悉他截瘫了，她大哭。

她的父母亲友自然反对两人继续交往，甚至连他和他家人也反对：好好的闺女，凭啥跟着一个截瘫活受罪？理解，完全理解。

她性子犟，执意嫁了过去。

他也确实是好男人，心灵手巧，不光学会了修锁配钥匙，还会织毛衣，还能用打字机噼里啪啦打字。截瘫男人也是男人，也能挣钱养家。

婚后两年，夫妻俩抱养了一个小女孩。小女孩长到10岁，多才多艺，获得河北省钢琴比赛少年组第一名。

电视台记者来访：多好的一家人啊，所谓幸福，不过如此。

女教师一概婉言谢绝，自家过日子，上电视做什么。

女教师就是江心平的原型。“十年前这故事就在我心里装着。”张庆洲说。

“江心平”今天过得好吗？

“大概5年前，她丈夫过世了。她改嫁，现在生活很平静。”

唐山大地震后，曾有国际卫生组织专家预言，由于生理、心理和医疗技术的种种限制，地震截瘫的生命极限是15年。而据新华社2008

年报道，30多年过去了，唐山仍有1600多名截瘫伤员健在，年龄最大的已近九旬。

B面

唐山有许多家庭，是地震后重组的。

男人需要女人，女人也需要男人。所以，重新组建家庭，往往很仓促。

仓促到什么程度呢？“划拉到篮子里就是菜，来不及更深地了解对方，两人行李卷搬一块儿，跟亲朋好友招呼一声，就算结婚了。”张庆洲说，“民政局都砸毁了，没地儿领结婚证。”

婚后发现合不来，只能再分开。很多人仓促结婚，又仓促离婚，彼此伤害。

也有婚后和睦，相敬如宾的。只是，到每年7月28日，夫妻俩心照不宣，各自出门。你去祭奠前妻，我去拜祭亡夫。

“我以为，人生最残酷，在于记忆。”张庆洲说，“当然，人生的欢乐也在于记忆。”

灾后百废待兴。然而有据可查，唐山恢复最快的，是人口数量。唐山人都知道，1977年和1978年这两年，出生的婴儿特别多。

张庆洲有个朋友的姐姐，本是芭蕾舞演员，像白天鹅一样美丽、高傲，舞姿翩跹。“人家跳过《红色娘子军》的，两条腿特别修长。”

地裂屋塌，把她砸成截瘫。对象立刻和她告吹。

截瘫加失恋的双重打击，让她几度寻死。幸被家人救下。

岁月流逝。亲友介绍的对象，她一概拒绝，心想，我都这样了，男人还要我干什么啊。

有个山东来的木匠，给她家打家具。一来二去，渐生情愫。山东木匠心肠好，愿意照顾她一辈子。

这里要提到唐山市政府出台的一项利民政策：截瘫伤者的配偶，户口可以调入唐山。

她感激丈夫恩情，婚后执意怀孕，想做母亲，想给丈夫一个完整的家。

分娩那天，痛苦万分。截瘫女人生孩子，把年轻的护士都吓跑了。妇产科大夫实在看不下去，手术刀抖个不停。

妇产科主任亲自上阵，操刀接生。

主任从产房出来，对焦急等候的山东木匠说了两句话。

第一句：“母子平安，是个女孩。”

第二句：“唐山女人真伟大。”

逃离乡村进城记

阎连科讲话有浓郁的河南味儿，身为大学教师，穿着打扮仍然像个农民，尽管他早已实现了年轻时的梦想：逃离农村，到城市去。他疲惫地叙述着中国的巨大变迁，只有30年，却仿佛过了三个世纪。作为中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说其实已经很难把握当下的现实。熟悉的农村已经远去，立足的城市仿佛又不属于自己，夹缝中的生存，很迷惘。

我们种地，

你们革命，

井水不犯河水。

房子：劳动可以换来的东西

说起来，我日夜挂念的故乡，却也是我最想逃离的地方。

田湖镇，属于河南嵩县，离洛阳有60多公里。小时候记忆里的农村老家，只有两件事情，第一是特别饥饿，第二是劳动非常辛苦。饥饿不是个体的感受，可能是中国整整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事情，毕竟我们经历过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饿死的人成千上万，那之后对食物的记忆会永远深刻。我家盖房子那年，到春节，家里没有一粒小麦，没有半把面粉，母亲借了别人家一碗面粉包饺子，我们兄弟姐妹四个每人吃了半碗，父母没有吃。母亲曾经尝试把白面和红薯面包在一起，结果不行，擀不成饺子皮。

至于劳动，就是永远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个孩子都看到，父亲母亲还有邻居，所有人都是这样，唯独村里的干部是例外。我那个村庄人口比较多，当年就有4000人左右，是很大的一个人民公社。我看到父母和乡邻在田地里劳动的时候，公社的干部提个热水瓶，敲个搪瓷碗，唱着歌去食堂吃饭。他们每个月有工资，我就想，这种人真好，第一不需要忍受饥饿，第二不需要劳动，真是最理想的生活。

当然那个年代不像现在两极分化，总体上说，农村还是贫富相对均等的社会，干部也并不富裕。我上学时要走10里路左右，去另外一个村庄，就会看到村长家的姑娘站在村头，拿个馒头慢慢地嚼着。她并不认真在吃，就是显摆。那馒头也不是白的，而是一层白一层黄，掺了棒子面的。反正她有吃的，就比我们强，之所以她有吃的，就因为她是村长家的姑娘。

这可能是我想逃离土地的最初契机。我只是想，当干部好，不用下地干活，但我并没有想到要离开农村到城市去，因为不知道有城市。其实我家条件也算不错的，无论如何，是解放后村里第一家盖起瓦房的，以前都是土坯和茅草垒起来的那种屋子。盖房子极其辛苦，在寒冷的冬天，要踏着冰雪，过一条很宽的河，到河那边把石头扛过来，有十几公里远。因为盖房子要打地基，买不起砖，就用石头代替，这是村里人最省钱的做法。一切能用力气换来的东西，绝不用钱去买——我想直到今天，很多农村人仍然坚持这个标准。

不管怎样，三间瓦房总算是盖起来了。在幼年的我眼中，房子很美。那些半圆形的瓦片，在房顶上一行行排列下来，像定格在天空中的许多大雁。瓦房四面都是土墙，在靠近路边的山墙上，全家人从远处运回的黄色石头砌在那里。另外三面墙上抹了一层泥，掺着麦糠，春天会长出瘦小的麦芽。墙外路过的村民，总会停下脚步，端详我家的三间瓦房，脸上挂着羡慕的神情。

三间瓦房，是父亲的事业，是一个农民拼尽汗水建造起来的，我的家。

城市：一环扣一环的梦想

方圆几十里范围，田湖是这一带的集市中心，更偏远的乡下人还在向往着我的家园。而我们住在田湖的人向往的，是20公里外的县城。县城里的人，向往的是60公里外的洛阳。从农村到城市，就是这样一环扣一环的梦想。我最早意识到城市的存在，是小学时有一天，一位像洋娃娃一样白嫩的小姑娘成了我的同桌。20世纪60年代，我的女同桌在课桌上划下了一条线，她说，谁也不能越过，不能碰到对方的胳膊。

我开始明白城里人的不同。她学习成绩很好，在我们这些农村孩子中间总是遥遥领先。和她做了同桌，我也开始用功，就好像要在城里人面前挣点儿面子一样。终于在一次考试中，她第一，我第二，仅有一分之差。考完试的那个暑假我度日如年，就盼着开学，盼着新的考试。我在书里写过那种感觉：好像盼望一场如意的婚姻。

现在想起来，那个年代很严重的问题是人口不能流动，所以人们总是从一个地方向往着另一个地方，乡村和城市的差别也由此而来。比如你要出门，必须先去开一个介绍信，没有身份证，也没有户口本，就是村里有关的干部会给你登个记。我还没有走进城市，只能凭着来自城市的同学，想象村庄之外的世界。

又到了考试的日子，我兴奋得一夜未眠。等到天亮去学校，老师站在讲台上，却没有带来试卷。老师说，同学们，今年考试我们不做题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所以，我

们考试的办法，就是同学们到讲台上来，背几条毛主席语录。能背出5条以上，就可以升级。

大家都愣了一下，随即掌声雷动。

我似乎再也没有了和城里人在考试中一较高下的机会。革命年代就这样席卷而来，我们依然上课，学习毛主席语录、诗词，还有“老三篇”。农村不是革命的主场，听说城里斗得很厉害，农村人无知无觉，种地才是实际的生活。我们在田里劳动的时候，曾经有两辆架着机枪的卡车从田边的公路上驶过，车上坐满了革命青年。他们突然开枪了，子弹打在我们旁边的草上，尘土飞扬。有当过兵的社员大喊“卧倒”，我们都赶忙趴下。

等到起身，卡车已经开走。生产队长对着远去的卡车大骂：“操你们奶奶！我们种地，你们革命，井水不犯河水，碍着你们啥事儿啦！”

只有革命青年的笑声，还在空气中回荡。

再后来，让我意识到城市存在的，是来到村里的知青们。有六七个人来自郑州，有一个来自洛阳，他们被村里人恭敬地安顿在收拾干净的大队部里。知青受到尊敬是有原因的，在买个烧饼都需要粮票的年代，知青能带来村里买不到的化肥、布匹和火柴。农民感恩戴德，不让知青下田，他们只需穿得光鲜干净，在村头漫步，有时吹吹笛子，到中午和黄昏，就到农民家里去吃饭。这叫“派饭”，我家也被派过，派到的人家就负责招待一两个知青一周的伙食，顿顿细粮白面。他们吃饭，我们这些孩子就眼巴巴在旁边看着。哦，原来不用劳动还有饭吃的，除了干部，还有知青。

城里人真好。

招工：有什么办法逃离农村

今天的中国作家很难把握现实的乡村，我们熟悉的年代已经逝去。比如，再不会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那种村庄了。为什么农村里的人至今怀念毛泽东？这没什么可说的，我现在和自己的母亲坐在一起，半天都不知道要聊什么，相对无言。当然我不能说从前比现在要好，城乡的差别永远存在。我十三四岁第一次到洛阳去，尽管当时城市里也不过是些三四层高的楼，可还是让我惊呆了：这么高！在农村里走夜路还要提着煤油灯的年代，城里马路上竟然有路灯，夜晚也如此明亮。任何农村孩子在这时候都会感到巨大的差别，感觉必须离开农村。

大约是1967年，村头的河滩地上，要枪毙几个犯人。其中有个农民，据说是企图强奸一个女知青，未遂，还是被毙了。我和几个同伴去看了枪决现场，沙地上有一些黏稠的血迹。与此相对照的有另一件事，邻村一个男知青强奸了村里的女孩子，事后女孩投河自杀了，只有十六七岁。男知青连夜逃走，回了城里。好像并没有执法者进城抓人，更没有枪毙或判刑。原来课本上说“四个现代化”，其中的农业现代化只是个美梦。直到现在，农村执法的宽度仍然超出我们的想象。也许你抢了几千块钱，判你10年，而另外一个人抢了一万块钱，却花点儿钱疏通一下，就回家去了。

我能有什么办法逃离农村呢？通常的考虑，就是招工和当兵这两条路。招工必须托关系，很多人家里没这个背景，也就不想这个事情了。当兵的难度也不小，但是如果你身体素质很好，总归还是有可能被选上。我是高中读了一年就先进城做工去了，不是正式的招工，是我恰好有个叔叔在新乡那边的水泥厂，通过他介绍，我才可以去水泥厂当临时工。

水泥厂那个脏啊，就像地面上的黑煤窑。所有人都戴个口罩，空气中密布灰尘。我的工作是在山上，用炸药炸石头，再把炸下来的石头装到小火车上运去工厂。这是最重的活儿，8小时一班，可人人都想每天干两班。因为只要能离开土地，只要能进工厂拿工资，对农村人来说就是很大的幸运。在农村劳动，不论每天干几个小时，特别有力气的男人才能挣10个工分，女人最多只有8个工分。在我们生产队，10个工分可以换算成一毛八分钱，这点儿钱能买什么呢？盐是一毛七一斤，鸡蛋五分钱一个。你劳动一天，能买三四个鸡蛋。但是工人就不一样了，最少一个月也有三四十块钱，顶农民干半年。

水泥厂干一班能挣一块六毛钱，一天如果能干上两班，一个月就有90多块。我和叔叔给工头送了两盒香烟，一瓶白酒，他就允许我每天干16个小时。那时年轻，身体能扛住，一个月都不洗脸，逮住机会往碎石地上一躺就睡着了，人家一喊就起来接着干。挣钱多啊，吃的也好，每天都有馒头，菜里也有肉。1975年到1977年，我干了两年，那是一生中最辛苦的日子，可每个月往家里寄钱的时候，还是感到无限温暖。

考学：想去北京，就填北京大学

如果就这样一直做工，不出意外的话，我的命运会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遇到拐点，很多人在那时下岗，或者陪伴着巨大的国营企业艰难转型。我哥哥当年本来说是去煤窑挖煤，结果干了一天就跑回来，说那个井太可怕，完全没有灯光，不知道下了多久才到井底，干完活儿再用绳子拉上来，那种恐惧难以忍受。后来他等到了另一次招工，也是托关系走后门，进了县城的邮电局。每天吃两顿饭，骑个自行车翻山越岭，把信送到山沟里去。每天走80公里山路，一个月24块钱，算是不错的工作，现在他也快退休了。

而我在1977年突然接到了一封电报。在山上炸石头的日子不仅枯燥，还与世隔绝，毛泽东逝世时我就是在山上干活，一周后下山才知道。打倒“四人帮”时，我还觉得“王、张、江、姚”的顺序一定是排错了，江青是主席夫人，怎么能排在王洪文后面呢？1977年那封家里发来的电报更是诡异，只有4个字“有事速回”。家里有病人，这4个字让我万分不安。我迅速买了火车票，从新乡到洛阳，再赶回家去。

到家发现，一切如常。家里人说，现在可以考大学了，让你回来考试，你回来得很及时，还有4天就可以考了。我高中还没毕业呢，就把初中课本找出来，复习了三四天。到了考场，就是报个名字，老师记上后，坐在那里就开始考了。考政治、语文和数学三门，作文题目是《我的心飞到了毛主席纪念堂》，好像要求写八百到一千字，每人发了三页400字的稿纸。我写起来激情澎湃，三页纸用完了，就举手问老师再要。老师跑过来一看，说哎哟这个同学，居然三页纸都写完了，字也这么工整。老师就举起我的卷子说，同学们，写作文一定要认真，像这个同学，稿纸都不够用了，这样肯定可以考上大学。

我也就以为肯定可以考上，考完回家等啊等，过了一段时间听说要报志愿。我们全家人都不知道报志愿是什么意思，同学们也不知道，就去问老师。

老师说，报志愿就是，你想去哪个学校，就把学校名字填到志愿那一栏里。

我们就问，去哪个学校好呢？

一共有哪些学校可以报，我们都不知道。其实我们村还不能算太封闭，毕竟还是在公路边上呢。老师就说，你们想去北京，就填北京大学；想去省会郑州，就填河南大学——其实河南大学并不在郑州，而是在开封，老师对此也一无所知。

不知道什么原因，第一个同学填了北京大学，后面的人全都填了北京大学，包括我。

结果可想而知，我们县没有一个考上大学的。我想走考学这条路进城的梦想，也破灭了。

当兵：20岁青年的最后机会

这些年来我靠写作谋生，这个行当太辛苦了。假如有机会选择命运，我宁可去做个书法家，写一个字卖一个字的钱，也不要选择文学。在现实的体制下，最好的选择当然是当官。少年时期我特别羡慕权力，可是现在变成特别恐惧权力。在北京的街上，看到任何一个警察我都会害怕。回到老家去，见到那些村干部，我依然会毕恭毕敬。因为虽然我不在农村了，可是我的亲人都还在，他们任何一个人都要被村干部管着。中国的农民最终都离不开政府的控制。比如村支书很厉害，他第一可以管你的宅基地，第二可以管你的计划生育，这两点是家家户户一定会遇到的问题；第三他还有权调解各种矛盾，比如孩子上学的问题，医疗费用报销的问题，等等。农村孩子要改变命运，现在仍然只能考大学，或者出去打工，而靠写作是行不通的。

我从读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偷偷写作，写一个关于贫农、富农和地主搞阶级斗争的故事。写了很长，一直到我进城打工，又回乡参加高考，考试失败后才写完。然后我就去当兵了，我已经知道写作不能让我离开乡村，当兵是最后的一条路。那时我已经20周岁，按照国家规定，一旦超过20岁就连当兵的机会都将消失。于是某个夜晚我站在病重的父亲床前，向他诉说参军的想法。父亲淡淡地说："当兵去吧，总在家里能有啥奔头呢。"

1978年12月我入伍，原以为和平年代当兵很安全，没想到1979年2月，中国和越南就打起仗来。说来不可思议，现在的我饱受颈椎病痛折磨，当年在新兵连却是文武双全。第一次射击训练，每人10发子弹，我打了99环。团长看傻了，说新兵怎么能打99环呢，就叫我过去，换个地方再打10发子弹。我又打了个98环。团长觉得，这应该不是偶然了，就选我代表全团，去参加全师的新兵射击比赛。过几天，我扛着枪去参赛了，又打了98环，拿了三等奖。当时部队里已经在做战争动员，我回来就开始害怕，射击表现这么好，肯定要让我上前线。

战争永远是恐怖的。我后来才知道，中越战争爆发后，农村里我的亲戚们30多口人，都住在我家，每天轮流去邮局查问有无我的信件。我的姑姑还频繁地去庙里烧香拜佛，为我祈求平安。我的父亲更是每天焦急万分，哮喘病愈发加重。而我在部队里却一无所知，我从来没有想过千里之外的战火会这样真实而深重地影响家乡父老——只因有个参军的我。

最后居然是文学救了命。我一到新兵连的时候，指导员就说，每个战士都把自己的名字写到黑板上去。大家都一个个上去写，指导员就在看谁的粉笔字写得好。我写完了。指导员就问：“阎连科，会不会出黑板报啊？”我说：“试试吧。”毕竟咱在家时候还是爱好写写画画的。我就开始出连队的黑板报，东抄西拼的，弄点儿散文诗歌什么的上去。有一天我们营的教导员路过，他姓张，曾经是我们军党委的秘书，诗写得很好，曾经在《诗刊》发过很多古体诗。“文革”期间，江青来视察，他给江青写过发言稿。因为这件事牵连，“四人帮”倒台后，他被从军党委的位置下放到营里。他是有文学细胞并且爱才的，看到我在出黑板报，就说：“这孩子你写得不错啊，叫什么名字，有什么爱好？”我说：“我叫阎连科，爱好写小说。”他说：“那给我看看。”

我就想起参军前写完的那部长篇，有二三十万字呢。我给家里打电话，让我哥把稿子给我寄来。结果我哥说："弟呀，你走后，母亲经常用你的稿纸烧火做饭，差不多都烧掉了。"

回乡：农村的精神抽空了

其实当兵不如当工人好，工人进工厂那天就有了铁饭碗，可是当兵以后你还要复员回来，只有极少数人能提干，成为军官留在部队。我们县和我同一批参军的有120多个人，只有两三个人提干，如果不是遇到中越战争，可能提干的人数会多一些。因为当时有规定，凡是在前线立过三等功的，都必须提干。这就把干部的位置一下子都占满了，比如连队本来需要四个排长，我们当时每个连都有七八个排长。起码三四年时间，这些多余的人都消化不掉。

这就是人的命运。复员的士兵，如果是城镇户口，国家负责安排工作，起码会让你到县城里某个机关坐办公室。而农村户口的士兵，复员还是要回到农村，继续种地，结婚生孩子，四处躲避计划生育。什么都没有改变，军旅生涯只是你人生的一段插曲。

我却是因为会写文章，作为特殊人才留在了部队。我让我哥把侥幸没被母亲烧掉的一小部分稿子寄来，拿给那个教导员看。他看完没看完我也不知道，但是在我们部队正准备登上去越南的火车时，他找到我，说有一个机会：武汉军区要在河南信阳鸡公山那边，办一个文学创作学习班。他说："我推荐你去学习，因为你是个人才。"

我问："打仗怎么办？"他说："你学习一个月回来，打仗的部队就走啦。"

我就明白了。在这个学习班上，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小说是分长篇、中篇和短篇的。我还认识了很多发表过作品的人，还知道了部队也有文学刊物。这个学习班让我收获很大。

我就这样留在了部队，继而留在了城市。可是城市与我并没有多大关系，文学不是集体行为，作家不一定非要待在北京这个文化中心。贾平凹在陕西，张炜在山东，写得多么好。我对城市的变化也缺乏敏感，北京奥运会之前有一天，我跟朋友见面，跑到那个世贸天阶，吓一跳，北京有这样华丽的地方，我居然都不知道。结果朋友说，这不是最近的变化，早就这样了。可是对我来说，城市发展越快，离我越遥远。

但是老家也回不去了，这恐怕是最尴尬的事情。我每年春节都回农村去，母亲对我说的话，一定是5年前甚至10年前就在说的，譬如村里某某家死人了，某某家结婚了，无非这些。而所有的邻居找我，永远都是在问，某件事能不能帮忙办一下。比如看病，比如孩子上学，比如找工作，他们找我办的这些事，跟30年前我自己遇到的事情一模一样。除了这些，我无法和他们聊现在的生活，因为我并不了解当下的农村。

现在的农村和城市只有一个字相同：钱。以前我们靠道德和宗法维持乡村秩序，现在维持秩序的东西就是钱。农村里选举，候选人会宰一头猪或一头牛，请村里人大吃一顿，最后选出的就是有钱人。当然，农村里有钱人一般也都是能干的，这是钱和权力的结合。这种权力对农村的伤害，从数字上看没有那么大，但是从精神上看，要远远大于城市。农村人没有地方说理，没有人愿意听他们诉苦，农民们内心充满不公的心理。为什么偷盗抢劫都要集中在过年的时候？这里一定是有相当一批人，过不去这个年了。

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农村里寂寞破败。表面上看就是街道上人少了，实质我想，这是把农村人的精神抽空了。出去的人在城市里受到

歧视，留下的人也没有精神依靠，那种没有着落的恐慌，只有他们自己才能体会。

农民的好日子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初，可以承包土地了，可以做生意了，贫富差距不大，吃饱有钱花，真正的好日子可能就那么几年。之后，城市发展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心转移，农村的问题迅速出现。小时候我们村口有条河，清水哗哗流动，吃饭时如果天气热，我就脱掉鞋子，把脚放在河水里。现在那条河早就没有了。好像全中国的河水都在慢慢断流一样，农村里打井越来越深，那些水都不知道去哪儿了。田湖镇原本有个造纸厂，污染特别厉害，关掉了。但是又冒出一个水泥厂，每天那个灰尘飞呀飞的，没有任何办法。

饥荒年代没有故事

许多地方有着隐秘而惨痛的历史，然而很少有像夹边沟这样的地方，沉淀了太多的亡魂，却因一位作家坚忍的写作而得以揭开面纱，昭告世人。做这件事的人叫杨显惠，是生于1946年的兰州作家。杨显惠寻访了100多位夹边沟农场幸存下来的右派，写出了《夹边沟记事》；他又找到了150多位定西地区经历饥荒的孤儿，写出了《定西孤儿院纪事》；之后他又继续在藏区的土地上行走，写出了《甘南纪事》。他说甘肃的故事一辈子都写不完，可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正在一个个死去，再不抓紧时间，就没有故事了。

以下是杨显惠的口述。

夹边沟农场进去右派3000多人，

最后活着出来的大约有500人。

狗都饿得爬不起来了

我的祖籍在甘肃东乡县，到我父亲那辈，人已经来到兰州，我就是在兰州长大的。饥荒年代，城市里还算不错，基本能保证不饿死人。1960年前后我在上初中，每月口粮30斤，到高中时变成32斤。1965年我高中毕业，那时候毛主席提倡“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就去了甘肃生产建设兵团下属的安西县小宛农场当农工，种地开荒。

安西县在河西走廊西部，靠近敦煌，再往西就是新疆。我在这里劳动了5年，1970年赶上工农兵大学生第一届招生，我就又回到兰州，

在甘肃师范大学念数学系，每月还有30块钱的工资。为什么学数学？分到农场里只有一个招生名额，就是数学系，你要不想上，有的是人想上呢。

在师大有个农村来的同学，跟我同岁，后来当了我们班的党支部书记，我们俩去搞过两次“外调”——在快毕业的时候，学校就会收到有些地方寄来的举报信，说某某学生家庭有问题，有过什么历史污点之类的。因为当年工农兵学员都是推荐上大学，僧多粥少，肯定会有人认为推荐不公平。系党支部要核实这些举报信的情况，就派我和这个同学去基层调查，这就叫“外调”。我们跑了两次，一次去武威，一次去定西。

那是我第一次到定西地区。我同学家在定西的通渭县，1975年那天在县城里，他说我们的外调工作做得差不多了，你跟我回趟我家吧。我们就往他家走，沿着山路到离县城很远的村里去。

到了他家，我很吃惊，太穷了，连一间房都没有，住的就是拿土块垒的拱形窑洞。他们全家只有一床被子，当天晚上我和他还有他弟弟，三个人睡在炕上，合盖那一床被子。他母亲和衣睡在厨房里，他父亲吃过晚饭就出门了，我想可能是去亲戚家睡了吧。

这同学就给我讲，他家在1960年饥荒的时候拆掉了房子，木头都换了粮食吃。他亲生母亲当年饿死了，现在这个是他继母，他还有个妹妹也饿死了。没有食物，他就出去流浪了两三年，直到饥荒过去，15年了，他家还是住在窑洞里，盖不起房子。

我说：“在学校里你可没给我讲过这些事情啊，我从来不知道还有这么穷的地方。”

他说：“唉，在外面哪敢讲呢。”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村里转悠，走到生产队的麦场上。他指着一堆麦秸说，昨晚他父亲就睡在这里。

然后走到一个院子门口，他说这里住着一个朋友，我们去看看。我见有只黄狗在地上卧着，就说你先过去，把这条狗抓住。不然狗认识你，不认识我，咬我怎么办？他说没关系，这狗不咬人。我看他说得肯定，就走过去。

经过那条狗身边的时候，狗抬起头，看看我，又趴下了。

我们走进院子。他说：“你知道那狗为啥不咬人？”

“为啥？”

“狗都饿得爬不起来了。”

只能养活400人的地方，来了3000人

那已经是1975年了。我估算一下，这个同学家里所有的东西加起来，也值不上我两个月的工资。他们吃的是人民公社，凭工分能分到一点粮食。你知道一个工分多少钱吗？一个人劳动一天，挣10个工分，换算下来等于两分钱。你家一年吃了多少粮食，用了多少柴火，会计都有记账的，到年底公社结算，你劳动挣的钱还不够吃掉的钱。

那两天的见闻给我印象太深了，所以1979年我写第一个短篇小说的时候，就写上了这些事情。那篇小说题目叫《陇上七月》，后来发表的时候，杂志编辑觉得“陇上”太刺眼，一看就是写甘肃的，就给改成了《七月里》。

但是此后，我一生都在写甘肃。我1988年至今都住在天津，可是二十几年来我从没写过天津，我没有思考过现在的城市生活，觉得光是写甘肃，写农村，写历史，这辈子可能都写不完。

到农村去，贫困是明摆着的事实，但在学校里我们不知道。我以前光知道1958年到1960年这段时间闹饥荒，饿死人了，没想到直到1975年他们仍然吃不饱。2003年我重返定西调查孤儿院的情况，问过那里的老人，什么时候才吃饱肚子了？老人们说，大概是1981年到1982年，土地承包到户以后。头一年承包了还不行，因为土地在集体经营时代已经贫瘠至极，要经过农民一两年的自主耕作，粮食才能打下多一点儿。

师大毕业以后，我又回到农场当教员，有一回带着学生去劳动，碰到好几年没见面的农场场长。我们在田间地头聊天，他就给我讲起了夹边沟。

夹边沟在酒泉境内，沙漠边上，最初这里建立农场，是因为有一小片盐碱地，开荒出来的话能养活400人。咱们国家解放后关押了很多在国民党政府工作过的旧职员，罪行严重的枪毙了，罪行轻的就判刑。到20世纪50年代有些人刑满释放，不能让他们到城市去，怎么安置呢？就成立了一些“就业农场”，夹边沟是其中之一。可是1957年开始“反右”，甘肃省一下子冒出来12000多个右派，其中有3000多人被认为是比较恶劣的“极右分子”，集中发配到夹边沟，这里就变成了“劳教农场”。

只能养活400人的盐碱地，来了3000多人，于是很快就缺粮。对外告急没有用，全国都在闹饥荒，右派被看作阶级敌人，更不可能获得救援。那时候劳教其实比坐监狱还惨，监狱有国家调拨的囚粮，劳教农场只能自己种粮，种不出来，就得饿死。

后来我多次到夹边沟实地探访，那种艰难的生存环境，确实超乎想象。零下二十几度的冬天，没有任何办法取暖，人们住在“地窝子”里。我当知青时也住过这种地窝子，就是地下挖个坑，拿大圆木架在坑上做梁，再找点草盖上，人就睡在坑里。1959年夹边沟农场的人均粮食定量，由每月30斤降到20多斤，到1960年降到15斤。长期吃这么少，劳动强度却很大，谁也耗不起。

另外，右派们的思想压力很大。当初送来这里宣布劳动教养，领导跟他们谈话时说的就是“学习学习”，结果来了就被当成敌人管教。要是判刑还好，起码知道哪天能刑满释放，右派没有年限，你会觉得一辈子就这样下去了。许多人家里女人闹离婚，子女也划清界限，很快就精神崩溃，自杀的越来越多。还有些人，听说表现好了就能放回去，于是拼命劳动，几个月就累到衰竭。

快要饿死了，为什么不逃

夹边沟农场进去右派3000多人，最后活着出来的大约有500人。当年我在小宛农场劳动时遇到两个去过夹边沟的右派，这两个人在夹边沟待了不到两个月就出来了，因为他们本就不该到夹边沟，上级搞错了。劳动了一段时间，夹边沟的管教人员偶然查花名册，发现没有这两个人的名字，就把他俩又遣送回去。这算幸运的，要知道很多人被划为右派之后，就被组织忘记了。你在哪里，你的死活，没有人关心，因为右派实在太多了。

跑出来的这两个人跟我谈起，说他们那个县送到夹边沟54个右派，活下来的只有6个。等到1997年我准备动笔写夹边沟时，就从最早给我讲夹边沟经历的这两个人开始，一个个地去寻访幸存者，一共访问了100多人。

人在饿到不行的时候，不会逃跑吗？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社会控制严密。现在我们有身份证就可以到处跑，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你到哪儿都会碰到查户口的。要是没有单位介绍信，你去外地找不到工作，连旅馆都不给你住，饭店都不卖饭给你。如果别人知道你是“跑出来的”，肯定会有人向组织汇报，警察就要来逮你。其二，右派们很多都是国家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我跟着党走了这么多年，现在犯了错误，在农场里好好改造，几年后释放回家，还能找个工作，重新做人。不能为了逃避现在的困难，变成失去身份的人，一辈子流浪。

况且，就算真想跑，你也未必跑得出去。定西地区通渭县和邻县交界的路上，当年设有一个哨卡，几个民兵守着。一天来了一家人，是夫妻俩带着几个孩子，说饿得不行了，想到邻县去。民兵们就给拦住了，说你们回家去，并且派一个民兵押送这家人回去，我们暂且叫他民兵甲。哨卡上有食堂，民兵甲就用口袋装了几个馒头背在身上，准备把这家人送回去，再把馒头给他们。

一行人就这样上路了。过了两三个小时，民兵甲回来了，馒头还背在身上。别的民兵就问他：“怎么这么快？”

“唉，走到一个山梁上，他们说没力气，坐下歇会儿，说什么也不走了。我没办法，就回来了。”

“那你怎么不给他们馒头呢？走不动了就吃馒头嘛。”

“哎呀，我忘了。”民兵甲说。

这件事是当时在场的另一个民兵后来讲给我听的，就叫民兵乙吧。过了两天，民兵乙走同一条路去办事，就看见那一家人还坐在山梁上——他们坐下去就没再起来，大人孩子好几口，全都饿死了。

在一切不能以常理推断的年代，有饿死的，也有撑死的。夹边沟有个右派，趁麦收时到地里偷吃生麦子，吃完还喝了开水，结果到晚上，麦子在他肚里发酵胀大。他翻滚号叫了一夜，还是死掉了。第二天，管教干部召开批判大会，指着他的尸体说："这种人不服改造，挖社会主义墙脚，同党顽固对抗，现在自取灭亡！"这个右派的老婆就在现场，都不敢哭出声来。

打死人不算稀罕事

民兵们并不饥饿，他们有公社的粮库，每天都有饭吃。饥荒年代，国家必须依靠暴力机器维持秩序。很多人提出问题：没有人暴动，抢粮食吃吗？那我就再讲个故事。

有个生产队，队长是从外村派来的。当大家饥饿的时候，知道队里仓库还有一点儿粮食，村民们就跟队长说："大伙儿饿得不行了，你把粮食分点儿，给咱们吃。"

队长说："不行。"

村民们想来想去，一定要想办法把粮食分了。怎么分呢？大伙儿决定把队长打死。

有一天队长从村外回来，路过生产队的羊圈。几个村民就在羊圈里待着，有人出来喊队长，说："你进来一下，我们有点事跟你说。"那时候队长已经觉得村民们对他不太友善了，所以走到哪儿手里都提着一根铁棍。队长就进了羊圈，但是他警惕性还是不高，对方好几个人呢。队长和他们讲话的时候，背后就有一个青年，拿根绳子突然套住队长脖子，然后一使劲，把队长扛起来，就勒死了。

那天下着雪，羊圈后面山谷里有个水冲下去的深坑，我们西北人把这种地方叫“窟泉”。几个村民就把队长的尸体扔进了窟泉，然后把羊赶出来，在附近乱踩一通，破坏现场。可是公社里本来通知这个队长第二天去开会，队长没去，公社就派人来找。雪地里有队长留下的脚印，到羊圈附近就变得乱七八糟，杂乱的痕迹一直到窟泉边上。最后，队长的铁棍找到了，继而窟泉里的尸体也被发现。那几个村民就承认打死了人，粮食也分掉了。

省里的工作组下来，要抓人判刑。可是抓谁？最后就抓了用绳子勒队长的那个青年。抓走还没判刑呢，青年就饿死在监狱里。

饥荒年代，打死人不算稀罕，但是极少出现集体对抗政府的事情。你说人们不造反，是不是因为饿得连造反的力气都没有了？这肯定是个原因，但关键原因还是不敢，政府对基层的控制太严密了。打死生产队长已经是大事，平时也就是村民打死村民。比如听说谁家又开始吃人肉了，某人吃掉了自己的孩子，别人就很害怕，说你看他吃得身体很壮，咱们都没力气，这样发展下去，他吃完自己的孩子，又来吃我们的孩子怎么办？大家一合计，就合伙把他打死。

那时候，每个人民公社都成立了孤儿院，有的不叫孤儿院，叫幼儿园。很多家庭，父母饿死了，剩下孩子，听说孤儿院管饭吃，大点儿的孩子就自己跑去，小孩子就有好心人给送去。可是孤儿院也吃不饱，孩子们还是大量死掉。有些孩子平时吃惯了草籽、树皮，到孤儿院里突然吃上了白面，肠胃适应不了，上吐下泻，也就死掉了。很多娃娃脖子细得撑不住头，坐着坐着就倒下去了。

我在农场当教员的时候，就听说了附近还有个饮马农场，那里有个连队，都是从定西地区来的孤儿，是农场到定西孤儿院招的农工。2003年我写完夹边沟，准备写定西孤儿的故事，就到饮马农场去寻找，认识了一个当年的孤儿。他给我讲，他们那个大家庭五十几口人，1960年以后剩下十一口。这个人同意给我带路。连续三年时间，

我访问了150多个定西孤儿。他们如今大部分都是农民，依然贫穷。有些是国家安排工作，当了工人，现在也处于下岗状态。

右派群体现在的状况也差不多，我调查到的100多人，也就10个左右属于上层右派，原本是县级干部，摘帽以后还回去当干部。大部分右派就是小学教师之类的普通职员，这些人在1958年之前每月工资三四十块钱，或者高一点儿到五六十块钱。1978年以后给他们恢复工作，还是每月几十块钱。他们的人生，有20年时间在农场度过，恢复原工作干不到三五年，也就该退休了。等到改革开放，全国人民的工资都上涨，咱们挣两三千的时候，他们的退休金也就三五百块钱。

看不到的档案

1981年我离开甘肃生产建设兵团，调到河北省大清河盐场，因为我老婆是天津人，不想待在西北了。我坚持写作，1988年成了天津作协的专业作家。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我并没有写夹边沟，那时候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时期，我觉得右派的问题不属于这个范畴。“文革”刚结束，作家们都在抒发内心的委屈、冤枉，但是右派不是简单的“伤痕”。1957年的“大鸣大放”，在我看来，是我们国家的知识分子对于民族前途的思考与抗争，是一次追求民主自由的意见爆发。我相信将来的历史，会对右派们有很高的评价。

1997年我开始寻访夹边沟右派，2000年开始在《上海文学》连载，这就是后来出版的《夹边沟记事》。我的写作主要走民间调查的路子，官方的档案资料查不到。我曾经尝试努力，找到甘肃省劳教局管理档案的人打听，他说劳教局档案不全，真正的档案不知道在哪儿。我又去找甘肃省公安厅的一个老同学，他告诉我，夹边沟的档案嘛，就在省档案馆里，但是你肯定看不到。我还是托关系过去找，省档案馆有人给我抱出厚厚一摞笔记本，翻开来都是人名。那人说，这

是档案目录，你瞧，夹边沟的所有档案都在我们这儿，但是你要想看到档案，必须有省委办公厅领导批的条子。

我哪有办法搞到这种条子呢，只好作罢。寻访幸存者的工作倒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困难，就是多跑点路。找到10个人，可能也就两三个人愿意讲，很多人不敢谈那段历史。当我已经在《上海文学》开始连载夹边沟系列时，兰州这边有报纸转载。武威地区有个县里的几个右派看到了，据说很喜欢，总是托人从兰州买报纸。这县里有我一个朋友，他就给我打电话，说老杨你到武威来，我给你介绍几个夹边沟出来的右派，现在都是县里的干部。我很高兴，就坐车去了。到了那朋友家里，朋友说你等等，我去叫他们——结果一个都没叫来。那几个右派的回话是：千万别让杨显惠砸了我们的饭碗。

其实除了我，甘肃还有一些人在写夹边沟，但是之前他们写的东西出不来。我也是离开甘肃很多年以后才能写出夹边沟的故事，可见这个地方的思想禁锢还比较厉害，和沿海地区没法比。我知道甘肃省工会有个干部，一直在业余写作，他曾经跑到省劳教局查过档案。结果这事让公安知道了，有三个公安到他家，把手枪拍到桌子上，说你从劳教局搞了些什么东西？全交出来！你要不交出来，我们就以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追究你的责任。

他吓坏了，可是也交不出东西来。他说我就翻了一下档案，交什么嘛。最后公安也没办法。可是有他这么一回遭遇，别的作家谁还敢再写?

现在夹边沟渐渐变成了公共话题，很多书也陆续出来。我觉得，如果以后还有人下功夫去研究的话，夹边沟问题的余地还很大。但是要抓紧时间了，十几年前我开始调查的时候，估计幸存者应该有200多人，现在活着的还有没有100人，我不知道。再过些年，可能他们去世的会更多。没有亲历者在世，就再不会有故事，夹边沟就要变成纯粹的学术问题了。

美丽甘南，消失的传统

我现在不写饥荒了，作家不能总是重复自己。我在《上海文学》连载了《甘南纪事》系列，写的是甘南藏区牧民的生活，写他们的传统价值观和现代化前进的脚步。甘肃南部和北部的自然环境差异非常大，甘南很美，山清水秀，民风淳朴。

我对藏民的最初印象还是在1965年，我在农场劳动期间，安西县有个水库，我在水库劳动过一年时间。因为水库大坝是1958年建成的，当时施工技术不好，坝基始终在漏水，于是农场每年都要派一个连队去加固大坝。我们住的工棚后面有条沟，沟里都是埋下的死人，我看到有穿藏民服装的尸体。管理大坝的干部就给我们讲，说这些都是劳改犯，有越狱时被打死的，也有饿死和病死的。当时县城里也经常见到藏族妇女，穿着皮袄，背着孩子，到监狱探望她们的丈夫。

这几年我总是跑甘南，和藏民一起生活。他们的生活方式在变化，比如吃饭，除了传统的蕨麻米饭、青稞炒面、酥油奶茶之类，他们也开始吃汉族人的馒头、烙饼、面条。服饰方面，他们平时也都是夹克西装。传统的习惯慢慢淡化，但他们内心还是保留着民族的特性，在社会转型期，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状态。比如两个年轻人打架，动了刀子，打死一个。他们不会立刻报警，藏民的处理方式是，首先由双方家族出面，寺院管理委员会主持谈判，谈出一个赔偿的命价，比如20万块钱。两家人协商同意的话，就不去法院了，赔钱了事。可是有时候法院知道了就不让，法院觉得你杀人了难道法律管不着你？就去把人抓掉。

我写了个短篇《恩贝》，讲的就是这种故事。两个男人因为偷牛的事情打起架来，打死一个。活着的被抓起来，他家人就去找死者的家人，说我家给你家赔命价，你们去公安局说说，让他们放人吧。结果公安局不听，把杀人的判了个死缓，死者家就没拿到赔款。

过了十多年，死缓改有期，表现好再减刑，杀人的这个男的就获释了。听说仇人释放回来了，死者的遗孀就把三个儿子叫来，她这三个儿子最大的二十多岁，小的也有十八九岁。这女人就说，你们的杀父仇人放出来了，你们现在都成人了，知道该怎么干吗?

三个儿子回答：知道。

过了些日子，附近寺院有个法事活动，这弟兄三人觉得他们的仇人会去参加。那人果然去了。等活动结束，在偏僻的路上，三兄弟就截住了仇人。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那人已经很老了，看了一会儿面前的三个小伙子，说：“不知道。”

“是你杀了我们的父亲。”

哦，老人明白了，说：“好吧。”

这三兄弟，老二老三拧住老人的胳膊，老大掏出刀子来划了一下，老人的脖子就断了。

然后他们就去投案。老大被枪毙，老二判8年，老三判5年。

一切都结束后，村里人就说那个妇女：“你早该知道，在儿子们面前不要讲过去的事情，你非讲。现在你的儿子一个毙掉了，两个判刑了，你高兴啦？”

那个孤独的女人回答说：

“这不是我高兴不高兴的事。藏族的儿子长大了，就要活得像个男子汉。”

广州黑人族群：熟悉的陌生人

“广州是个大城市，有很多外国人。”2013年4月，在白云机场开往广州市区的出租车上，司机阿强指着路牌向我介绍，“这边出去是三元里、广园西路，往前走到环市中路、小北路，都是黑人的地盘。”

阿强说的这片地方属于越秀区，聚集着大量来自非洲和中东国家的客商，他们大多肤色黝黑，身形壮硕，几乎都从事同一种职业：国际贸易，通俗说就是倒买倒卖。珠三角拥有中国最庞大、密集的制造业，黑皮肤的商人们在广州林立的商贸城里穿梭，批量订购服装、电器、日用品甚至汽车和摩托车零配件，运到非洲去卖，通常获利不菲。“因为这里的货物足够便宜，在非洲很畅销。”一个尼日利亚商人说，“我来中国就是为了赚钱。我不知道北京在哪里，在我看来，广州才是中国的中心。”

他们不知道北京在哪里，

广州才是中国的中心。

他的中文名字叫“小吴”，2008年来中国，现在汉语说得很流利，这在广州的黑人族群里不多见。但是除了谈生意，小吴也没什么机会运用他的汉语技能，“本地人不和我们打交道。”在宝汉直街的城中村，每当夜幕降临，霓虹灯亮起，街头几乎全是黑人，宛如非洲市集。“我们晚上都不去那边，全是鬼佬。”在的士司机阿强看来，即使取个中国名字，黑人也还是“鬼佬”。这个带有歧视意味的称谓背后，是外来移民和本地居民之间难以弥合的心理鸿沟。“我们的房子一般不租给黑人。”房产中介简姐说，“他们太吵，又脏，我不会讲外语，管理很麻烦。”黑人一般睡到中午才出来吃饭，下午逛市场、谈生意，然

后和朋友聚会、喝酒到深夜，本地人的作息时间则刚好相反。这种此消彼长的景观，导致黑人聚居的街区被形象地称为“巧克力城”——广州人眼中的城中之城。

黑色爱情

在珠江新城附近的“Sports”酒吧，李秋丽翻着酒水单，点了一瓶红酒。“这是我最近的爱好。”她熟练地开启瓶塞，“没准儿哪天有机会做做红酒生意呢。”珠江新城地处广州的CBD（城市商区），紧邻繁华的天河北，酒吧里坐满了老外，很多人认识李秋丽，过来跟她打招呼：“嘿，萨米拉！”他们叫她的英文名字，李秋丽也热情地和对方握手、拥抱。

“看不出来吧，我是潮汕人。”李秋丽说，父母从小教育她，女人要以家庭为重。在民风保守的潮汕地区，同龄的女孩们通常都在家相夫教子，很少有人像李秋丽这样外出打拼。“你知道我们家乡的传统有多恐怖吗？”李秋丽说，“潮汕人家一定要生男孩。我有个表姐嫁了人，已经生了三个女儿了，还在拼命生，非要生个男孩不可。她现在一怀孕就跑去香港检查是男是女，女孩就打掉，现在已经打到第七胎了，吓死人。”李秋丽有三个弟弟，都在潮汕老家待着，“二十几岁了还活在我爸的翅膀底下。”这种“被掌控”的生活方式让李秋丽“随时受不了”。

所以等到去广州读大学时，她终于有机会离开父母的视线，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裙子能穿多短就穿多短！”李秋丽暗暗发誓，要彻底改变已经被长辈铺设好的人生轨道。“在家里我妈妈从来不让我穿超短裙，从来不让我穿吊带背心，从来不让我化妆，从来不让我做的好多事情，我到大学里都赶紧做。”她在华南理工大学攻读国际贸易，每天打扮得很摩登，在校园里招摇过市，梦想做个成功的女商人，靠自己

的努力赚很多很多钱——这是当年她能想到最出格的生活，现在看来已经实现了：李秋丽在珠江新城的高档小区买了房，经营着一家电器贸易公司，晚上收工后可以到酒吧里喝酒，和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们聊天。

“只要你想改变生活，你就能做到。”李秋丽说。

而她生活最大的改变却连自己都没想到：嫁给了一个黑人。

李秋丽的丈夫大卫来自坦桑尼亚，31岁，2002年拿到中国政府的奖学金来广州留学，两人是在学校里的派对上认识的。黑人表达感情往往很直接，在小北一带黑人聚居的街区，中国女孩子很容易遇到黑人小伙子搭讪。“他们经常开口就问你要电话号码，或者直接说我喜欢你，你能不能做我女朋友之类的话。”李秋丽说，她和身边的女伴都知道不能轻易答应黑人的邀请，否则被纠缠起来很麻烦。

大卫追求李秋丽用了三个月，起初没少碰钉子。“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很活泼、漂亮，就问她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她回答不行。后来我才知道，东方女人喜欢含蓄，追她们需要多些时间和耐心。”大卫开始动脑筋，在校园里处心积虑地制造“偶遇”。吃饭的时候，李秋丽能看到大卫，买东西的时候又能看到他，站在宿舍阳台上看风景，这个黑黑的小伙子还是会出现在视野里。李秋丽开始对他有了兴趣。“当时我以为他是有女朋友的，因为有次去他宿舍的时候，看到门口有女孩子的鞋子。”有两个广外的女孩经常去找大卫，李秋丽以为其中一个是他女朋友，心想黑人果然不可靠，有女朋友了还说喜欢我。

“听说非洲黑人可以娶四个老婆，你当心被骗哦。”女伴提醒李秋丽。

说起青春往事，大卫哈哈大笑：“我信基督，只能有一个老婆。”再次表白的时候，他很慎重，先请李秋丽去酒吧喝酒，然后请她

去宿舍坐坐，放浪漫的音乐，两人又喝了点儿酒。估计气氛差不多了，大卫说：“请你相信，我真的没有女朋友……”

“好吧。”李秋丽回答。

吃在广州

天秀大厦矗立在雨中。

这座36层高、镶满绿色玻璃的大厦，是小北路的地标建筑，也是广州最著名的中非贸易集散地。大厦里密布的几百家商铺和写字间，大部分经营者是非洲人，剩下的也是和非洲人做生意的中国老板。天秀大厦门前是三条主干道的交叉口，高架桥和铁轨纵横交错，有个造型扭曲的天桥连接各个路口，天桥上有举着“PHOTO”牌子的摊贩。很多黑人来到广州，第一件事就是站在天桥上，以天秀大厦为背景拍张照片，寄给远在非洲的家人，告诉他们广州有多么繁华，遍地是金，发财指日可待。

不过2000年天秀大厦落成时，业主大都是中国人，广州还没有现在这么多黑人。“我是天秀大厦最早的租户。”沙巴餐厅老板阿里·伊士麦尔莱自豪地说，他已经在中国生活了15年，如果可能，他希望永远不要离开中国，“我会在这里待到死为止。”

阿里来自也门，这是阿拉伯半岛西南端的国家，隔着狭窄的红海和亚丁湾，与非洲大陆毗邻。在广州，因为各种机缘巧合，阿里本人也像他的国家一样，成了阿拉伯世界里连接中东和非洲的枢纽——在天秀大厦一层的沙巴清真餐厅里，400多平米的空间坐满了边吃东西边谈生意的穆斯林，除了几个中国服务生，餐厅里几乎全是黑皮肤。“这里是黑人的据点，很少有中国客人来吃饭。”阿里的助手卢小姐

说，“但是我觉得我们餐厅的食物很好吃，你也可以尝尝看。”餐厅的菜单上有几十种地道的清真菜品，价格不便宜，但确实很受附近的黑人欢迎。从开业至今，沙巴餐厅的生意一直很红火。

阿里原本经营着一家国际贸易公司，曾经在印度尼西亚待了10年，15年前第一次来广州，在陶瓷大厦租了一间档口批发服装。2002年天秀大厦的商铺开始营业，距离陶瓷大厦只有500米，阿里敏锐地意识到了商机。“陆续有一些非洲商人到这边来做生意，因为在广州拿货比香港更便宜。做生意的人需要一个见面谈话的地方，需要一起吃饭，有饭吃才能稳定下来。”越来越多的黑人客商来到广州，而能满足他们基本生活需求的服务业链条还未建立起来。当时整个广州的清真餐厅都很少，阿里就因为找不到习惯的食物而备感痛苦，他决定自己开家餐厅。

大卫和李秋丽也选择天秀大厦作为生意的起点，两人租下了大厦里的一间档口。那已经是2007年了，随着黑人的大量进驻，天秀大厦的本地业主开始纷纷搬走，以前定位商住一体的高档楼盘，逐渐变成非洲商人的贸易中心。围绕着天秀大厦的小北路、登峰街、环市中路等街区，一直延伸到三元里、广园西路一带，聚集了无数黑皮肤的商人。“2008年以前最多的时候，常住广州的黑人大约有2万人，流动人口可能还有6万人左右。”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李志刚是研究广州外来移民问题的学者，但他也无法准确统计黑人的数量，因为很多黑人并没有在中国的出入境管理部门登记备案。坊间流传着另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广州有大约20万黑人。

有需求的地方就会有市场，如今在小北一带，大大小小的阿拉伯餐厅有几十家。在天秀大厦、登峰宾馆、陶瓷大厦之类的商贸城里，还能找到很多为黑人提供家政服务、机票预订、货币兑换、美容美发等常用业务的店面。“我可以跟你说说这些黑人的来历。”大卫说，“有一些黑人是像我这样的留学生，在中国读完书以后发现有赚钱机会，

就留下来做生意。更多的是很早就在非洲做生意的商人，他们以前在迪拜、东南亚和中国香港拿货。大概2004年到2005年的时候，很多人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中国内地的市场。”而按照阿里的说法，商人们发现有利润的地方同时有吃有喝，就会蜂拥而至，迅速建立起各自民族和种族的商业圈。“哪里有钱赚，我们就到哪里去。”阿里已经在浙江义乌开了新的餐厅，他雇用的中国员工超过150人。

淘金年代

大卫是跟着他的非洲同胞学会做生意的。在华南理工大学读书期间，经常有坦桑尼亚商人来找大卫，请他做向导，一起去市场里看货。大卫讲中文很流利，能帮这些非洲商人和中国人讨价还价，老乡爱找他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对同胞的信任感：很多非洲商人都吃过中国人的亏，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太擅长骗人了。“本来在市场里看好的货，交完定金，等货发过来发现换成了另一种。或者是发过来的货物数量不对，甚至有些中国商人收完定金迟迟不发货，等你再去看的时候，他的档口都不见了。”类似的事情每天都在市场里发生，大卫慢慢也长了心眼。“我不再单纯相信档口老板的话，大额生意成交之前，我一定会去看他们的工厂。如果那个工厂看起来不够好，我就不做生意。”大卫说，但是有些貌似可靠的供应商也会出问题。有一次他订购了2000台电视机，因为是熟悉的厂家，大卫没有认真验货。2000台电视机运到非洲才发现，最多有400台能用，其他都是垃圾。

“出现这样严重的质量问题，厂家不负责赔偿吗？”我问大卫。

“他们根本不会承认这种事，反而会责怪我为什么不验货。”大卫很无奈，说在非洲做生意，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并不会签订规范的合同，双方都是基于淳朴的互相信任来合作，这种商业习惯到中国来很容易吃亏，有了麻烦也无法诉诸法律。那笔生意让大卫亏了不少钱，

最后厂家同意提供一些电视机零件给大卫，让他一边维修一边折价清货。

“这就是为什么非洲人来中国，还是要找非洲人合作。”大卫帮了同胞的忙，那些老板也不亏待他，经常会给大卫几百上千美元作为酬劳。有些人建议大卫，既然你这么熟悉中国市场，为什么不自己做生意呢?

在2007年的天秀大厦，刚刚毕业的大卫和李秋丽赚到了第一桶金：这是来自坦桑尼亚政府的订单，为一条正在修建的几十公里长的公路提供路灯。大卫在广东中山找到了符合要求的厂商，这笔生意为他打通了与非洲国家政府合作的门路。后来碰到总统大选，大卫还接了一单订制几十万件宣传T恤和围巾的生意。

“我做的很多项目，交易额都在几千万美元的级别。”大卫眨眨眼睛，“我不能告诉你我赚到了多少钱，这是商业秘密。”

2005年到2007年，那是最好的时代，在对中国意义非凡的2008年到来之前，云集在天秀大厦的商人们快乐地数着口袋里的钱，每个人对未来都信心满满。“一条牛仔裤进货价2美元，运到非洲卖5美元，利润是150%，我认识的很多客户一单就订几万条。”大卫说，生意最火爆的时候，每天上午10点钟，商人们要排队进天秀大厦买货，每个档口前都挤满了人。“20平米不到的一个档口，要租下来你猜多少钱？”李秋丽伸出两根手指：“20万人民币——这是转手费！租金还要每个月五六千块。”天秀大厦由三栋楼组成，中间一栋是商用，两边两栋本来是住宅楼，后来都被高价租出去开公司用了。即使这样，当年想在天秀大厦租间档口也非常困难。喧闹的市场，汹涌的客流，是广州的中非贸易极盛时期的景观，也是黑人移民“挤走”本地业主的商业能量。

隔阂难消

简姐在宝汉直街守着一个中介摊位。这条街上的房产中介都没有门面，只是在路边竖块硬纸牌子，上面写满出租房的简介和价位，城中村的房子较为老旧所以价格低廉，比如“宝汉直街二楼二房一厅家俬齐1250元”、“村前街一楼单房有床独厨500元”，等等。简姐的摊位比别的中介还要豪华些，有两块大牌子，一块写着“租房找简姐”，另一块写着“租房找简姨”。我问她：“外国人来租房子，有什么麻烦吗？”

“没有麻烦，给钱就可以。”

“可是你说过不租给外国人。”

“房子不是我的。”简姐或者简姨说，“我只是中介无所谓啦，是房东都不愿意租给外国人。”

“那这满街的黑人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我们这里都是民房，有钱的黑人不住这里，他们都住好点儿的小区里啦。”

大卫和阿里应该属于“有钱的黑人”，能够脱离聚居状态，有自己的家庭，和中国人做邻居，努力融入本地社会，他们是黑人移民族群里的成功人士和逃逸分子。更多的黑人则是像小吴这样，在聚居区租个房子暂且安身，并随时准备拎包离去，奔向下一个“有钱赚”的地方。登峰宾馆的客房几乎永远客满，但住客们总是来去匆匆。我在宾馆里转了几圈，看到一些敞开的房门，里面是堆积如山的编织袋，黑人们拿着手机大声讲话。小北甚至广州，都只是他们的仓库，不是家。

阻碍移民和原住民沟通的因素，不仅有语言和地域文化的天然差异，有时还来自一些莫名其妙的猜疑、恐惧和妖魔化。在搜索引擎里用“广州黑人”作为关键词搜索，很容易看到许多耸人听闻的传言，贩毒、抢劫、轮奸、传播艾滋病……诸如此类的负面消息好像都和黑人有关。“以前我看这些帖子也觉得好害怕，其实了解情况后就知道很多说法都太夸张了，哪有那么危险。”蔡晓纯说，“我经常一个人去小北那边和黑人聊天，请他们填写调查问卷。大多数黑人都很热情、友好。”

蔡晓纯是暨南大学新闻学院的大三女生，为了参加学术竞赛，她和几个同学一起准备了名为《在穗国际移民的生活状况和文化认同调查》的调研课题。这个课题主要的研究对象，就是生活在广州的黑人族群。从2012年10月开始，蔡晓纯和她的同学们在广州市内几个主要的黑人聚居区随机发放了几百份问卷，这样的田野调查做了四个多月。“从结果来看，相当多的黑人表示，他们在广州的生活缺乏安全感。”蔡晓纯说，“就像我们害怕他们一样，他们也害怕我们。”

“确实有一些黑人在广州会惹出麻烦。”大卫说，“非洲的50多个国家几乎都有人住在广州，可是尼日利亚人的名声就不大好。他们很早就跑到中国来，有些人很穷，以为只要到了中国就有生意做，来了以后才发现要从零开始。没办法，这样的人可能就会做些非法的事情。结果在中国人看来，黑人长得都是一样的，他们就认为黑人都不好。”

“广州人好像很不喜欢黑人，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尼日利亚人小吴说，“很多中国人觉得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赚中国人的钱，错了。我们是帮中国人赚钱，把你们生产的货物卖到世界各地。”

这个说法得到了广州社科院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长黄石鼎的认同：“广东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有很多过剩的产能和库存，被天秀大厦、陶瓷大厦这些中非贸易集散地消化了。”黄石鼎认为，中非贸易繁荣事实上有利于中国的产业升级。

“你们新的国家领导人前不久刚去非洲访问。”小吴问我，“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会对非洲更好？”

他指的是2013年3月下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坦桑尼亚、南非、刚果三国的访问，习近平给非洲带去了多个重要的经贸合作项目。我倒更想知道，小吴对在非洲工作生活的大量中国人有何看法。

“我的同胞都很喜欢中国人。”小吴说，“中国人在非洲修建铁路和通信设施，对我们帮助很大。当然，你们也会拿走我们的一些东西，比如石油，这很正常。”他的想法让我稍稍有点儿意外。小吴解释说，非洲有很多石油和矿藏，比起被美国人和欧洲人拿走，他认为不如给中国人。“虽然我有个兄弟在美国，但我不喜欢美国，因为美国人喜欢打仗。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这点和非洲一样。我在非洲的时候以为中国人都很友好，来到广州却发现不是这样。”小吴举例说，假如我和他同时站在路边打车，的士司机一定会选择我而拒载他——这我相信，刚到广州那天，我就问过的士司机阿强：“为什么你们不喜欢黑人乘客？”

“鬼佬很多麻烦啦。”阿强说，“有些人坐车不给钱，还有些人会砍价，说我多收他们钱。拜托，广州会堵车啊，我怎么敢保证每次都走最近的路？”

“我告诉你非洲人的习惯。”李秋丽说，“在非洲，人们认为每样东西的价钱都是固定的。今天买了一条裤子50元，那好，以后每次买裤子都是50元。要是有人卖60元，非洲人觉得那是骗子。要是你敢降价到30元，哇，非洲人会想，以前卖50元的都是骗子。”她说现在很多中国商人到非洲去做生意，也打价格战，结果把市场都搞乱了，谁也赚不到钱。

签证！签证！

听说我是记者，沙巴餐厅老板阿里很激动，他紧握拳头，无名指上的戒指金光闪闪。谈话开始之前，他先用几分钟时间表达了对中国签证管理制度的抱怨："在广州我有两套房子，两辆车，三个小孩都在中国出生，我全家都在这里，我给中国政府纳税，可是政府却不给我绿卡，这是个大问题。"阿里说，"我很不高兴。"

虽然依旧声称自己热爱广州，阿里现在却花更多的时间待在义乌。"广州警方对黑人签证的检查太严格了，同样的签证，在广州只能待一个月，义乌却能待一年。"一旦被警察查到签证过期，阿里就得千里迢迢回到他的祖国也门去办理续签，对商人来说，这样的旅途浪费的不止是时间和金钱，还有很多潜在的机会。

针对外国移民的严格管控，始于2008年，这一年也是天秀大厦由盛到衰的转折之年。

"那时候很恐怖的，警察在街上见到黑人就要检查护照，发现问题就会抓到派出所去。"李秋丽说，"甚至有些本来没问题，还有几个月时间才到期，警察拿过去用笔一划，7天！给你改成7天，到期必须出境，没有任何理由，警察就是希望赶你走。"

大卫有个黑人朋友当时因为签证过期被抓了，在拘留所里蹲了一个月。"出来以后他说，中国的拘留所不是人类可以生存的地方。"2008年，大卫也经常在街头遭遇警察，即使检查不出什么问题，他也觉得，在生活多年的广州，自己一夜之间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只是因为身上的黑色皮肤。

很多黑人在2008年离开了广州，天秀大厦也不复往昔繁荣。大卫和李秋丽都记得，曾经有个非洲富商，每年都到天秀大厦拿货。他来

的时候，整座大厦都会轰动。“这个老板总是提着整箱的美金，从一楼开始，挨个档口转过去，一边看货一边付现金。天秀大厦里所有人都认识他。”李秋丽说，“2008年之后，他再没来过。”

签证，成为广州黑人族群的隐秘伤痛。2009年7月，位于广园西路的矿泉街派出所被上百名非洲黑人包围，这次群体性事件让广州的黑人族群再度成为敏感话题。事件起因就是警察检查护照，一些黑人慌乱逃跑，在猫捉老鼠一样的追逐中，有个黑人坠楼身亡。

做调研的时候，蔡晓纯最喜欢去石室圣心天主教堂，在这里她能遇到最友善的黑人。每个星期天的下午，广州黑人中的天主教徒会聚集在石室教堂，虔诚地做祷告。等他们祷告完毕，蔡晓纯就过去找人聊天，请他们填写问卷，她就这样在教堂巧遇了同在暨南大学读书的坦桑尼亚留学生安娜。安娜是个漂亮的黑人姑娘，来中国4年了，对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她至今有很多困惑。比如，为什么广州的黑人小伙子都想追求中国女孩，却没有中国小伙子追求黑人女孩？比如，为什么中国人能做出以假乱真的山寨iPhone（苹果手机），却懒得自己努力创新？还比如，中国人居然没有信仰，天啊，上帝教人行善，那么没有信仰的人，不是很容易做坏事吗？

“我有一些建议给广州市政府。”蔡晓纯给我看她特别收藏的一份调查问卷，在卷尾的空白处有歪歪扭扭的圆珠笔字迹。填写这份问卷的黑人叫科恩，他认真答完了所有的选择题，还用英文额外写了一封信，希望蔡晓纯能把他的意见转达给政府。“我在广州待了一年了，由于我的家乡正处于危机之中，我无法回家，但是我在广州遇到了签证过期的问题。”科恩写道，“我去移民局向他们解释，请求延长我的签证。可是他们拒绝了我，要求我回非洲去办理。但是我没钱回家。请你们记住，假如政府延长我们的签证，那么黑人在这里就不会继续犯罪。”科恩认为，签证问题事关广州的治安。“因为我如果犯了罪然后跑到移民局要求延长签证的话，你们就会立刻把我抓住。”

理想生活

对于大卫和李秋丽，2008年的回忆还有更多的甜蜜。这一年，李秋丽怀孕了，他们决定结婚。

女儿领回来一个黑女婿，这让李秋丽的父母一度很难接受。论家境，大卫的妈妈是坦桑尼亚政府公务员，爸爸在大型国企工作，按照中国家长的考量标准，这些都是加分项。“大卫和我家人的矛盾主要还是因为肤色，其次是生活习惯。”李秋丽说，“没办法，只能慢慢说服父母。我去非洲也一样要面对这些问题。”

非洲人生活节奏慢，大部分人没什么时间观念，如果非洲人告诉你见面时间在“午饭后”，就意味着“等我什么时候吃完饭再说”，搞不好就到天黑了。尤其让李秋丽纳闷的是非洲人的审美观：中国女人崇尚“以瘦为美”，非洲女人却刚好相反，“非洲人的标准就是，女人的体型要像阿拉伯数字8。你长得怎样无所谓，只要有个8就行。”苗条的李秋丽跟着大卫到坦桑尼亚婆家，坐在一群说斯瓦西里语、胖得像个“8”的非洲女人中间，感觉莫名的自卑。

婚礼是李秋丽自己筹备的，在潮汕老家的父母没来帮忙，李秋丽就在广州找了间酒楼，摆了十几桌，夫妻俩分头去请自己的朋友。“那个婚礼我一生都不会忘记。”李秋丽说，当天来的全是年轻人，因为大卫的朋友很多，来自非洲各个国家的黑人们，把婚礼当成了欢乐的派对。他们喝着酒唱着歌，跳起非洲的传统舞蹈，直到午夜都不愿散场。

“最后酒楼要打烊了，服务员来催我们走。”李秋丽记得，那天喝了几万块钱的酒，还有个黑人喝多了，拉着服务员问：“你们是不是把酒藏起来了？”

现在，让我们回到现在，大卫已经成了被潮汕家庭接纳的女婿，他和李秋丽的混血儿子都上幼儿园了。幼儿园的小朋友觉得这个黑黑的小孩子跟别人不一样："你的皮肤好黑，你好脏。"儿子回家委屈地告诉妈妈，别的小朋友说我脏。李秋丽说："乖孩子，你的爸爸是黑人，所以你的皮肤就是黑的，黑皮肤并不脏。再说了，难道黄色皮肤就一定干净吗？"

儿子说："小朋友们还说我是外国人，应该说外国话。"

李秋丽说："你告诉他们，你在中国长大，当然就是中国人。"

写完了调查报告，关于广州黑人族群的研究也告一段落，蔡晓纯还是对科恩写在问卷上的信印象最深。"一个月内我的签证就要过期了。"信的末尾，科恩写道，"我真的想在中国多待一段时间，拜托了。"

你的理想是什么？我问尼日利亚商人小吴。他沉吟了一会儿，大概在想词。最后他看着我说："我想成为一个好人。"

什么样的人叫好人？

"就是善良，富有，Open（开放）。"小吴说，"我对你好，你对我好，大家都好。中国人为什么不明白这个道理呢？"

"我能给你拍照吗？"——对于这个请求，小吴拒绝了，而沙巴餐厅老板阿里反问："如果我同意拍照，你能帮我获得中国绿卡吗？"

SARS爆发，他也暴发

2003年，王岐顺这样问过自己。但他很快变得坦然，甚至自豪起来。SARS（“非典”）疫情把北京变成了一座弥漫恐怖气氛的城市，政府关闭了绝大多数可能导致人员聚集的公共场所，叫停了几乎所有演唱会、招聘会和大型展览，很多酒吧、KTV和饭店都关门歇业。人们也不敢再像往常那样和朋友聚会，然后一起去看场电影——在封闭的室内影院里进行两个小时静坐和呼吸，似乎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如果实在想看电影怎么办呢？一是你可以在家播放DVD，视听效果不及大银幕但是很安全；二是你可以去王岐顺的枫花园汽车电影院，那里有在空旷的露天场地架设起的大银幕，你坐在自己的车里，也很安全。

“非典”让三种人发了财：

卖口罩的，

卖板蓝根的，

开汽车电影院的。

就是这样别无选择的公众心理，导致王岐顺在2003年赚了很多钱。那时候他的汽车电影院已经亏损经营了将近5年，眼看撑不住了。“人家说‘非典’让三种人发了财：卖口罩的，卖板蓝根的，再就是开汽车电影院的。”王岐顺说他最开始有点儿愧疚，觉得这商机来得莫名其妙，做生意总不能幸灾乐祸。后来他发现，来看电影的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像监狱里放风的囚犯，这种抓紧时间享受生活的热情让王

岐顺也想开了："全世界都说北京是一座死城，我这里还能给大伙儿放电影，像不像沙漠里的绿洲？

土地问题

1998年，开个电影院很难赚钱，这点王岐顺有心理准备，何况他想开的还是中国第一家汽车电影院——谁都没见过的东西，就意味着要从头开始培养人们的消费习惯，大把的钱砸进去是肯定的。王岐顺在美国见过汽车电影院，觉得很新鲜，中国也可以搞一个。没想到的是，他居然需要先砸两百万元，购买一种满地都是的东西：土。

电影院跟土有什么关系？现在的枫花园汽车电影院位于朝阳区亮马桥路靠近东四环的地方，十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将近两百亩的荒地。更早之前曾经有个果园，因为地势低洼容易积水，果树都泡死了，此地就逐渐废弃荒芜，长起了齐腰深的野草。王岐顺从将台乡政府手里把这块荒地租下来，乡政府很爽快，终于有人帮他们解决荒地防火养护问题了。

王岐顺雇了七八个壮小伙儿，每人发一把新镰刀，让他们割草，割到镰刀都卷了刃。草丛里无奇不有，光青蛙就抓了一麻袋，还发现了小孩子的尸骸。众人奋斗多日，终于割完草，露出了土地的模样。王岐顺开着一辆越野车进去，扑哧，车陷在泥里不动了。

所以需要垫土。荒地比外面的马路大约低一米二，基本算一块低洼的沼泽。想开汽车电影院，得让观众的车能顺利开进来再开出去。王岐顺是沈阳人，从小在城市里长大，不懂基建活儿要怎么干。他找附近的建筑工地打听，人家告诉他租几辆巨型卡车，车轮子有一人高的那种，昼夜不停地拉土，再找台推土机把土平了。一车土要价一百元，王岐顺跟人砍到六十。他估摸有三百车土差不多够了，谁知第一

天就拉来三百车，土垫下去只有薄薄的一层，好像没垫一样。那就继续。每天三百车土，一直折腾了三四个月，到两万八千车的时候，地才算平了。

这段时光没日没夜，王岐顺的工作就是每天挎着一个装满现金的大包，按车次给司机结算工钱，真正数钱数到手软，累了在地上一坐就能睡着。有天夜里，王岐顺裹着军大衣，又坐在土堆边睡着了，恍惚中觉得呼吸困难，动弹不得，一激灵醒了，见身后一辆卡车正在倒土，已经压住了他的半截大衣。

那是王岐顺初次意识到，死亡离自己如此之近。一车土倒下来，能把他悄无声息地活埋。“好在当时年轻，反应快。”他死命挣扎，崩开大衣扣子，脱身跳出来，身后的土山轰然崩塌。

场地平整好了，王岐顺开始跑各种经营手续。北京市公安局的警察说：“开电影院啊，你得安装喷淋设备，还得有防火通道，达到消防合格标准才能批。”王岐顺说：“我这喷淋设备是天然的，一下雨就喷淋。满地都是防火通道，有情况开车就跑。”

“你这什么电影院？”

“汽车电影院，就是坐在车里看电影。”

“这个我们没见过，得请示上级领导。”警察拿起电话，“这儿有个人要开电影院……是汽车电影院，坐在车里看电影……对，他说一下雨就喷淋，有情况开车就跑……”

王岐顺想笑，忍住了。

坚持不停

1998年5月6日，枫花园汽车电影院开张。票价定为每辆车80元，观众寥寥无几；降到60元，还是没多少人来。王岐顺每天率领一众员工站在影院里的一个小土坡上，眺望门口的马路，看见有摇曳的车灯光进来，大家就激动鼓掌。

汽车电影院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北美，到1959年，伴随着汽车工业的蓬勃发展，美国拥有超过两万家汽车电影院，激烈的竞争甚至造成了室内影院数量的锐减。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汽车影院产业开始萎缩，电视机和影碟机把很多观众留在了家里。“现在美国大概剩下两百多家汽车电影院。”王岐顺去考察的时候相信，美国人经历的过去，就是中国人即将面对的未来。

枫花园惨淡经营的头几年，观众来得不多，媒体倒来了不少，包括很多外国媒体。王岐顺三天两头要接受采访，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记者问他：“你的电影院是自己开的，还是政府资助的？”“来看电影的人开的是自己的车吗？”“是共产党组织大家来看电影吗？”王岐顺被问得无语，他发现很难让老外理解，中国人已经有了享受现代生活的经济实力，而且很快会有接受新鲜事物的思想观念。枫花园刚好位于使馆区附近，吸引了世界各国媒体的驻华记者，《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BBC（英国广播公司）……老外们甚至会开着卫星转播车过来，支起长枪短炮对着王岐顺猛拍。墙内开花墙外香，枫花园渐渐有了些名气，票价又涨回到80元。

王岐顺在影院里开了个酒吧，他想把枫花园变成综合性的夜生活场所，看完电影的人可以在这里喝啤酒、吃烤串。有次外国媒体又来采访，对酒吧很好奇，拉着王岐顺在里面边喝边聊。老外比画着说要开瓶酒，服务生大喜，不由分说抄起一瓶XO（顶级白兰地）就给开了。“结账一千多块，把那老外给惊着了。”王岐顺说，“他们为好奇付出了沉重代价。当然，那时候我也是穷疯了。”

直到2003年，“非典”袭来。

“所有使用中央空调系统的公共场所都要求停业，因为害怕病毒通过飞沫传播。”王岐顺说，“中央电视台有个报道说，‘非典’期间北京的文化行业营收几乎为零——因为有我这个电影院还在营业，所以不是零。”央视记者跑来问王岐顺，为什么汽车电影院不停业？王岐顺回答因为我是露天的，没使空调。记者又问谁给你的片子，答曰“电影公司”。当时枫花园还不能做到和院线同步上映新片，北京新影联影业公司董事长魏健从枫花园开业就在关注这家特殊的电影院，他给王岐顺争取到了较为优惠的拷贝价格，因为“这是全国头一家汽车电影院，我们要支持电影市场化的探索”。“电影公司没接到上级通知吗？”央视记者是个爱较真的小伙子，又跑去北京市文化局采访。“文化局副局长王珠是个很好的女同志，她当时要是说让我们停业，那肯定得停，不然真出了事谁能负得起责任？”王岐顺很佩服王珠的魄力，她对记者的答复是：“我们知道它（枫花园）在营业，我们认为，以车为单位看电影，不能算是人员密集接触……这个应该可以继续开。”

因为爱情

枫花园成了“非典”阴霾下北京居民仅有的乐园。以前每天来几十辆车，2003年骤增到每天能来两三百辆，影院门前的马路上排起了长长的车龙。王岐顺给员工买来手套、口罩，规定每天清洗车辆和场地。“毕竟是服务行业，我也怕传染病啊。”当时家家户户都喷84消毒液，王岐顺买了几十桶，用大卡车拉到枫花园，给员工装备了喷雾器，让他们给每辆进来的车都里里外外喷一遍。84消毒液当时和板蓝根一样成为紧俏物资，王岐顺认识一个哥们儿的同学，就在生产消毒液的工厂工作，通过这层关系才能买得到。政府有关部门来检查卫生，对枫花园的防护措施表示“基本过关”。检查人员都穿着密实的防护衣，戴着防毒面具。“到底是正规军，太让我惊艳了。”王岐顺说。

但是他忽略了84消毒液的使用常识：稀释。

“后来才知道应该用5%的消毒液，兑上95%的水。”84消毒液的主要成分是氯，对金属有腐蚀作用，王岐顺说的5%都太浓了，常规的稀释浓度应该在5‰左右。枫花园的员工把100%纯度的消毒液装进了喷雾器，对着客人的车狂喷。

“你可别把这事抖露出去。”2013年，王岐顺告诉我，当年他是在给自己的车也喷过100%的消毒液以后才发现问题的。“仪表盘的金属板都给咬出了很多小白点，擦也擦不掉，像褪色的衣服。”

“非典”时期最火爆的电影是好莱坞大片《西部侠情》，故事讲的是美国中情局秘密研发了一种生化武器，病毒从实验室泄露出来了，通过飞沫传染，非常厉害。“这不就是SARS吗？”有人告诉王岐顺，你的电影院里在放“批判现实主义大片”，票房一片飘红。王岐顺自己去看了一场，电影里的美国兵也戴着防毒面具，封锁了疫区，见人跑出来就拿冲锋枪当场击毙。这片子在枫花园连映了两个多月，场场爆满，到后来发行公司的人都诧异了：“你们怎么老演这个片子，什么意思啊？”

枫花园每天晚上6点半开始放映，可是2003年，白天这里也有好多人。“打羽毛球的，跳绳的，遛狗的，没什么事干的人们都跑这儿来玩儿，反正也没别的地方可去。”枫花园还举办过好几场婚礼，新人和亲友们开着车过来，停在影院的空地上，银幕和周围的栏杆上挂满了鲜花和气球。没有婚宴，没有庄严的仪式，新郎新娘在围观群众的欢笑和起哄声中紧紧拥抱，婚就算结了。

“过去叫抗战夫妻，2003年有很多抗‘非典’夫妻。”王岐顺说，“我觉得爱情还是伟大的。”

有对中年夫妇，四五十岁的样子，来枫花园看完电影，坐在酒吧的椅子上，商量离婚的事情。两人谈孩子、房子、财产、老人，最后谈到了看电影。

男人说，你记得吗，当年咱俩搞对象的时候，总是约在西单看电影。

女人说，记得，每次我骑自行车过去，你坐公共汽车过来。

男人说，那会儿多好啊，大老远的，我看见你的红围巾，就觉得幸福。

女人开始哭。

男人接着说，当年啥都没有，现在我们有房子了，有孩子了，还有汽车了，都能看汽车电影了。

女人说，可是我们要离婚了。

两人抱头痛哭。

2003年，影院的员工把这个故事告诉了王岐顺。2013年，王岐顺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我问王岐顺，后来呢?

“后来他俩没离婚，几个月后还带着孩子来我这儿看电影。”王岐顺说，“我今年50岁，应该跟当年那对夫妇的年龄差不多。人到了这个岁数会懂，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离什么婚啊。”

和谐产业

小时候王岐顺就爱看电影，他在沈阳一个部队大院里成长，少年时代的生活就像姜文导演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洋溢着荷尔蒙的味道。军区里有个名叫“八一剧场”的露天电影院，用水泥砌起一道墙，刷上白灰当银幕，周围有几圈台阶当座位，看上去有点儿像古罗马斗兽场。部队里有专门组织大院“精神文化生活”的干部，隔三岔五给大院里的家属们发放电影票，但王岐顺领不到票，他的父母因为有点儿“历史问题”，下放到基层工厂劳动去了。所以他想看电影就得另辟蹊径：邻居家的阿姨就是电影院检票员，王岐顺每天扒着窗户看，见阿姨老远回家来了，就算准时间奔出去，拿起阿姨家门口的垃圾桶，提着走向垃圾站——整套动作必须自然、精准，恰好在阿姨进院门的时候让她看见。一来二去，阿姨心知肚明。检票的时候，王岐顺从地上捡张别人扔下的废票，给阿姨象征性地撕一下就可以入场了。

打通了这条门路，在露天电影院的台阶上，王岐顺度过了无数个快乐的夜晚，银幕光影变幻，让他深深着迷。从家到电影院是颇长的一段路，少年一路小跑着，也要走上个把钟头，电影散场再走回来，又是一个钟头。有时候突然下雨，别人都赶紧跑，他则索性慢慢走，边走边想起电影《雨中曲》里，潇洒起舞的吉恩·凯利。

少年长大后开始做生意，开饭馆，炒股票，办学校，做过很多行当，终于攒下了可以圆梦的资本。20世纪80年代末，王岐顺拥有了自己的汽车，还去了美国，见识过花花世界的无限可能。促使他下决心做汽车影院还有个政策契机：1994年，国务院颁布《汽车工业产业政策》，激活了私家车消费市场，捷达、富康、桑塔纳成了“先富起来的一批人”的身份标识。同年，广电部电影局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通知》，这个文件消除了中国电影发行渠道的市场壁垒，企业只要从影片发行权所有单位拿到许可，就能自主发行和放映电影。喜欢电影也喜欢汽车的王岐顺认为，这两项政策的交汇点，一定有机会。

只是做了这许多年，他对文化产业有了新的看法。“光想挣钱肯定不能干这个。”王岐顺算过账，按现在一辆车100元票价计算，制片方和发行方拿走43%，扣除3.7%的营业税和5%的国家电影发展专项基金，再扣除所得税、水电费、场地和设备维护费、员工人力成本等，一张电影票给影院带来的利润不会超过15块钱。“现在老说中国电影票房高，一年也就一百七八十亿，这块蛋糕放到整个GDP（国内生产总值）里来看是非常小的一块。政府要说扶持文化产业，免点儿税行不行？”在他看来，目前的电影票价对工薪阶层来说还是太贵。“万达在美国收购的那个AMC（全称American Multi-Cinema，美国多厅影院，现为中国大连万达旗下子公司）,院线我去过，挺好的，早场电影也就4个美金。”王岐顺说，“一般美国人月薪不下五千美元，中国人能平均五千人民币吗？差远了。”

“如果没有2003年的起死回生，你还会坚持做这行吗？”我问王岐顺。他想了想说会坚持，因为确实喜欢。“也有人劝我不如开个洗浴中心，那挣钱可快了，但我心里老觉得不是正道。”经营汽车电影院是挺有面子的事，很多外地游客到北京，白天看完故宫、长城，晚上会来枫花园看场电影，体验一下“首都文化氛围”。2003年枫花园出名后，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带着各大电影公司的老总来参观，中影董事长韩三平跟王岐顺打趣：“你这影院不错，肯定有好多小年轻开车来这儿搞对象。”

当着一群领导的面，王岐顺有点儿脸红。那会儿还没有“车震”这个词，他一直担心汽车电影院被人当成“不健康”的场所。这时候赵实说话了：“脸红什么？电影院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给年轻人提供谈恋爱的地方。”

领导们走了以后，王岐顺也多了个心眼，他想验证一下汽车电影院的“纯洁度”，就在银幕上方装了一个红外线探头。观察了一段时

间，王岐顺确信，中国人还是比较保守的。“搂搂抱抱很常见，车震什么的是真没有。”

所以，汽车电影院是个很“和谐”的地方，尤其适合家庭休闲活动。以前王岐顺喜欢把车停在前排看电影，现在他更爱在后排，看着前边黑压压停满了车，劳斯莱斯、奔驰跟捷达、夏利和睦相处，每辆车里都有一家人的故事。有位老太太是枫花园的常客，每次来都是一辆面包车，里边老老少少一大家子人，带着零食和饮料，边看电影边吃喝，其乐融融。老太太戴着一副瓶底厚的大眼镜，王岐顺怀疑她其实看不清银幕，有次忍不住过去问。老太太说：“我是青光眼，什么也看不见，就是跟着孩子们出来玩儿。孩子们看你的电影开心，我看孩子们也开心——他们就是我的电影。”

死是容易的，活着却更难

2013年夏天我第一次见到黄永，也是唯一的一次。他已经因为食道癌病情恶化，被医生宣布病危好几次了，每次都悠悠好转过来，出了医院照样抽烟喝酒、大口吃肉。2003年黄永作为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把中国的SARS疫情真相用一组封面报道“捅”给了全世界，引发轩然大波。我找他就是想了解当年的情况。在他家附近的一个小饭馆里，我们聊得很高兴，喝了两瓶啤酒——他在微博上的ID就叫“啤酒黄永”。

2014年12月，有朋友告诉我，黄永去世了。

以下是他讲的故事。

把SARS疫情向全世界报道的人，

后来成了个快乐的癌症患者。

黄永的2003

我现在是个癌症患者，对时间的记忆有点儿错乱。

2003年我是美国《TIME》（《时代》杂志）的记者，5月初出版的那期杂志，封面是五星红旗和一张SARS病人的胸透X光片合成的图片，可以看到红旗下浮现出布满阴影的肺部，标题是“SARS NATION”（非典国度）。这个封面报道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议，外国人觉得中国是个可怕的地方。中国人，尤其是一些青年觉得，老美在刻意妖魔化中国。

我是这组报道的作者之一，一个为外媒工作的中国人。

记得那年2月中旬，春节放假回来，我看到香港的报纸头版报道，广州居民在抢购白醋和板蓝根。我在《TIME》负责浏览几乎所有重要的中文报刊，办公室里订阅了差不多一百种，但是内地出版的报纸和杂志都还没有报道此事。我也没意识到这是多么重要的新闻，只是觉得好玩儿，就跟我的上司、《TIME》驻北京分社的社长报告，说广东有点儿奇怪的情况。我跟这个新到任的社长彼此看不顺眼，他也没理我。比起市民抢购什么东西的新闻，他更关心那些中国领导人的子女们在做什么生意，成天让我去打探此类消息。

但是《TIME》亚洲版的总部在中国香港，那边已经在关注日渐流行的奇怪肺炎。香港总部催我们北京这边也去调查一下，主要是询问一些医学专家对这种怪病有什么了解。从流行病学的角度分析，春节是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中国特有的大规模人口迁徙——春运，事实上导致了SARS从广东向全国扩散。北京也有大量的流动人口，所以成了后来的重灾区。

但是外媒的关注角度不在于疫情本身，他们对政府可能隐瞒信息这个问题更感兴趣。大概3月下旬的时候，官方披露北京有30多人确诊，当时我们已经完成了一轮信息搜集，大家分头去找医院和政府机构可能的知情者，各显神通，几乎已经肯定，官方公布的数字是大大低于实际感染者数量的。

但是北京街头还没什么紧张气氛。一千多万人口的大城市，谁会把几十个传染病患者当回事呢？北京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其实是我们杂志发表了蒋彦永的那封信之后。蒋彦永是解放军三〇一医院的老军医，他知道北京的几所医院里已经收治了相当多的“非典”病人，但是媒体还在宣称“疫情已经得到控制”，这让他感到愤怒。

蒋彦永写了封信描述他看到的一切，这封信发给了CCTV(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两家电视台没有反应，蒋就把信又发给了美国《华尔街日报》。不知道为什么，《华尔街日报》也没动静，最后蒋彦永才联系了我们。当天我和一个同事就抓紧把这封信翻译成英文，挂到了《TIME》的网站上。

那应该是4月初了，蒋彦永的信一出来，全世界都炸锅了，中国政府面临着很大的国际压力。但他这封信严格来说还不能直接证明中国政府撒谎，我们这些在中国的外媒记者就开始采取各种手段展开调查。

我决定去几个医院看看。北京有几个专门收治传染病人的医院：地坛、佑安、三○九、三○二等。我带了一个摄影师，装成进医院看病的样子，去这几个医院的呼吸科打探。在地坛、三○九和三○二都没有看到“非典”病人，但是三○二医院有个大夫跟我聊了一会儿，说他们这儿有十几个疑似病例。地坛医院的护士一听我说发烧、咳嗽，那眼神立刻就不对劲了，说你快出去到哪儿哪儿哪儿，然后她就一溜烟跑了。

我最后去了佑安医院。这里有个专门的传染病区，我冒充来探视的病人家属，门卫不让进，我就往别处溜达，走到楼底下给病人配餐的地方。那是一个长长的走廊，脚步声的回响很沉闷，恐怖电影里经常有这种场景。我看到两个护士推着一辆餐车出来，两人穿得特夸张，又是防护服又是防毒面具。我一看，这肯定有事，就凑上去跟她们搭讪。护士说我们这里有好多“那种病人”，具体数字说不清，总之你赶紧走，别跟这儿待着。

我就继续在病区里乱转，转到一栋楼后边的时候，发现这里一楼每个窗台里面都堆满了装食品的塑料袋。因为处于隔离状态的病人不允许家属探望，医院工作人员会把家属送来的食物放在窗台上，病人开窗户自己拿进去。我看到有一扇窗户半开着，隔着纱窗看到，里边

有个穿病号服的女孩，大概20来岁的样子，我就过去跟她说话。这女孩居然是三○一医院的护士，因为得病被隔离到佑安来了，她告诉了我SARS传入北京的源头：北京第一例确诊的SARS患者是个山西的打工仔，过年从广东回山西，在家里发了病。山西的医院治不好，这人刚巧有个老乡在北京某部队大院工作，是给首长开车的司机。司机说我带你到北京的大医院治病去，就开车拉着这个病人到北京，送进了三○一。这个病人把司机全家都传染了，进了医院，又把三○一整个呼吸科的大夫和护士都给传染了。

“然后我就到这儿来了。”女孩说。

这符合我们之前的预判：SARS流行早期的感染者，很多是没有做好防护措施的医护人员。既然确认了这里关着的就是SARS病人，我开始挨着窗台数每个病房里的床位，每间病房四张床，哪个床位有人是能看出来的，因为病人严禁出病房，吃喝拉撒都在里面，床边肯定堆着生活用品。我数完了一楼的病房，有一百多人。这时候跟我来的摄影记者开始拍照，相机一拿出来就被医院的保安发现了——所以我特别讨厌摄影记者，关键时刻他们太扎眼，总是破坏我的工作。

保安把我们轰出去了。不过关键的证据已经拿到，我回去就开始写稿。写完以后，那个讨厌的社长说，你别回家了，找个饭店把自己隔离了吧，住宿费报销。

我很高兴地跑到丽都饭店住下来，玩儿了一个礼拜。整个“非典”时期，《TIME》的记者凡是做了相关的报道，杂志就出钱让你住最好的酒店，说是隔离，更像奖励休假。我在酒店里大吃大喝，还经常跑出去玩儿。有一天社长叫我去开会，居然在凯宾斯基，我去了才知道，这家伙把自己也隔离到饭店里了。

在凯宾斯基见到一个女孩，社长给我介绍说她叫J，是新来的雇员。我觉得社长是想用这女孩把我挤兑走，因为我在《TIME》干了十

几年，资历很老，整天懒散晃荡不干活，每月薪水2400美金，够雇好几个新人，每年还有6周带薪年假。别看《TIME》名头很大，它在中国也限制员工人数，通常只有一个分社社长和两三个记者，其他的像翻译、司机和行政助理之类都不算时代周刊的雇员。外交部下面有个外交人员服务局，负责给所有的外交和新闻机构提供这些办公服务。不把我开掉，社长就没法添新人，但是要解雇我的话就需要支付昂贵的补偿，所以又动不得，我就成了社长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在等我提出辞职。这就是我跟社长相互讨厌的深层原因。

J确实挺能干的，她来自上海文汇新民集团旗下的某张报纸，有做记者的经验，英文也不错，理论上有能力把我挤走。我对她的第一印象是讨厌。对女人我有三大忌讳，第一讨厌上海姑娘，第二讨厌戴眼镜的，第三讨厌穿尖头皮鞋的。J把这三大忌讳占全了。

等我结束在高级酒店醉生梦死的隔离生活，出来一看世界全变了。4月20日，政府宣布免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的职务，这两个人背负了隐瞒疫情信息的责任。我开始继续追踪报道“非典”，这次去了三〇九，通过关系找到了医院副院长，他告诉我，曾经有46个病人隔离在三〇九医院旁边的一个旅馆里。世界卫生组织派人来中国调查，上头不想让世卫组织发现这46个病人，怎么办呢？世卫组织来人的那天，医院弄了几辆急救车，把病人装到车上绕着三环不停跑，等检查人员走了再回医院。据说很多医院都这么干，那些医护人员和开车的司机都叫苦不迭，他们是跟一车致命病毒同呼吸共命运，一圈又一圈跑在北京的三环路上。

官方随后公布了真实的统计数字，造成了确诊病例一夜之间从几十个变成几百个的惊悚效果，疑似病例还有上千个。老百姓确实陷入恐慌了。可以设想，假如政府一开始没有隐瞒信息，几百个传染病人对北京这么大的城市来说其实不算多，而且很容易控制。问题就在于

先隐瞒后公开，伤害了政府的公信力：谁知道你还有没有隐瞒更大的秘密呢?

2003年我总共写了三四篇关于SARS的报道，4月25日《TIME》的总编还写了一封感谢信到北京分社，说我们干得太棒了。此前我做这份工作已经觉得无聊至极，我采访过的人开始都对外媒寄予厚望，以为问题只要捅到国际上就能解决，事实上我根本帮不了他们，反而会给他们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麻烦。证据就是我有一个特别牛逼的电话本，上面几乎什么人都有，但是我如果给曾经采访过的人再打电话，对方一听是我就会骂“滚蛋”。

2003年，我第一次觉得工作给我带来了成就感，我写给美国人看的文章总算影响到了中国人。

兴奋完了就想，妈的，会不会有危险啊。我倒不怕得病，因为我每天抽烟喝酒，从无头疼脑热。这里有个简单常识：病毒要找宿主也会选个健康点的，哪个家伙身体里边环境好，病毒住着也觉得舒服。像我这种已经把自己的肺弄烂的人，病毒都不爱在我这儿繁衍生息。我说的危险在于这事算给政府抹黑，搞得两个大官都“下课”了，他们不来找我算账？我就告诉老婆，如果哪天我突然消失了，你需要给谁谁和谁谁打电话，也许他们能帮我。我每天把护照和绿卡都揣怀里，随时准备买张机票跑路。绿卡是个很方便的东西，但是它也给我带来麻烦，就是像我这种有绿卡又不在美国定居的人，为了保住绿卡，每半年就得回一趟美国，俗称“跑卡”。当我感觉到北京的紧张气氛，正好也到了该去美国“跑卡”的时候，我顺理成章就跑了。

5月份到美国，纽约总部给我颁了一个奖，这奖是表彰我为《TIME》的公共服务领域作出的贡献，影响力比不上普利策奖，但在新闻圈子里大家还都知道。对我来说这趟去纽约的意义就是看了看总部里那些平常电子邮件往来的家伙都长什么样。总编拍拍我肩膀，说继续努力。结果是我不思进取，回来又晃荡了一段时间就辞职了。

我在美国待了一个多月，回来的时候，中国民众抗击SARS的运动正如火如荼，但是我已经不需要再做报道了。美国读者只要知道“中国政府在这件事上欺骗了民众”就够了，很难再有耐心关注远隔重洋的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就算我写这样的报道也发表不了，就算发表出来读者也理解不了。所以我又变成无所事事的状态，每天坐在办公室里看报纸。J坐在我对面的位置，社长把外交人员服务局派给我们的秘书给轰走了，让J顶了秘书的名额。对此我毫无意见，有个年轻漂亮的女孩朝夕相处总归不坏。社长唯一的优点是允许我在办公室里抽烟，我就一天到晚抽个不停，用电脑开大音量播放乱七八糟的流行歌曲，许巍、小刚、伍佰什么的，还有很多英文歌。办公室一天到晚烟雾缭绕，仙乐飘飘。

“过完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歌声从音箱传出来。

“这是什么歌？挺好听的。”J问我。

我告诉她是小刚的《黄昏》。J也很无聊，她当时跟一个老外好着，那老外在北京胡同里租了个四合院，俩人成天打架。我当时也在跟第二个老婆打架，她刚生完孩子，低血糖导致情绪暴躁。我不知道低血糖还能让人发神经，就动手打老婆，现在想来颇为后悔。

我跟J聊来聊去，就好上了，这段恋情倒是陪我过完了2003年的整个夏天。我们每天晚上喝酒，通宵唱卡拉OK，天亮再去上班。跟J好上以后我才知道，社长对她也有觊觎。按说他把J招进来的，应该比我先得手。只是社长也有老婆孩子，没敢冒进，被我抢了先，从此更加心怀怨恨，但表面上我们愈发客气。社长给我加薪，然后理直气壮地指使我干更多的活儿，他用这种办法折磨我，导致我每天睡得昏昏沉沉听见闹钟响的时候都会梦见自己得了绝症。

现在我终于梦想成真了。

死亡并不可怕，难题在于选择何种死法。我17岁开始得抑郁症，很快发展到有自杀倾向。我认真分析过各种自杀手段，觉得首先没一个死得舒服，其次没一个死得好看，就放弃了自杀的念头，转而盼望上帝让我得个绝症。2003年在一线采访SARS疫情，我从来不戴口罩，也不采用别的什么防护措施，一方面自恃身强力壮，另一方面可能潜意识里也觉得，让我得这个病试试也挺好——接触那么多病人，终究还是没得上。2011年春天确诊得了食道癌，我由衷高兴，觉得这辈子运气实在太好，最后的愿望都被上帝满足了。人说诗酒余生，我是酒色一生，最大爱好就是啤酒和美女，两样都齐了我就生无所恋。第一个老婆是歌唱家胡松华的女儿，我们从学生时代早恋，分分合合好多次，终于结婚又离婚。第二个老婆是美国回来的，2000年底我俩领证，2004年8月离婚，同时我也决定不再忍受无聊的记者工作和讨厌的社长，于是递交了辞呈，获得彻底自由。2009年我第三次领了结婚证，这个老婆是在酒吧认识的，如今每天陪着我去肿瘤医院做化疗，用手机拍我肿胀的脖子发到微博上。化疗让我失去了头发和眉毛，导致老婆拍的照片看上去具有了某种佛性。我告诉她，马雅可夫斯基说“死是容易的，活着却更难”，我活到现在，已经看见了人生的终点，好运气都还没用完。

香港什么都没有发生

香港人陈冠中已经住在北京十余年了，依然留着银色长发，看上去仙风道骨，实则性情中人。1976年他创办的《号外》杂志，至今仍是香港文化的标志符号之一。2009年他写了本长篇小说《盛世》，把在北京的朋友们编排了一遍，有点儿政治寓言的味道，结果只能在香港出版。2010年陈冠中开始再版自己的“香港三部曲”，总算能在内地顺利出版了。在陈冠中描写的商业社会里，游戏规则清晰，人们各自来去，孤独、生死、爱恋好像都不那么重要。这一代香港人空前但未必绝后，他们的价值观如何形成，或许能从陈冠中的叙述中寻得端倪。

做专业的事，赚钱，

享受美食、红酒、女人，

一切钱能买到的最好的东西。

尖沙咀的青春期

我这一代香港人，也许是赶上了最好的时代。因为相对于内地而言，我们生活得顺风顺水，什么都没有发生。

1952年我生在上海，家里边是小商人，1949年的时候没有走。我爸爸大概不会想到，做点儿生意也会遇上政治运动。经过“三反”“五反”，资产阶级被整顿，爸爸就先跑到香港，然后申请全家人出去。那

是1956年，我4岁，人生第一个记忆就是妈妈带着我跟我姐，在广州车站露天过夜。

到了香港，我家四口人住在一个小房间里，大约七八平方米，在尖沙咀。如果你看过张曼玉演的《花样年华》，就知道那种五六层楼的连排屋，有一个长长的走道，前面的房间大，后面的房间越来越小，我们住在中间。那个年代香港很多人是像我家这样从内地过来的，还算对贫穷和节俭的生活有点儿记忆。

尖沙咀的连排屋，是我在香港的第一个家。在那里住了5年，我读完幼稚园，进入小学，爸爸也开始在香港站住脚。1961年终于买了房子，我们就搬了家，仍然在尖沙咀。长大后我也都住在尖沙咀的老区里，感觉从小到大，这里都没有什么差别——我指的是老香港的味道。如果说高楼大厦，当然现在起来很多，所有的老店也都换了招牌，房子几乎百分之百拆过改建，但我家还在1961年买的那个房子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比起广州，比起更广阔的中国内地，显得繁华太多。我这代香港人的青春期，是从1964年开始，到1973年结束。1964年的标志事件，就是甲壳虫乐队来香港演出。

当时香港有三种文化：国语文化、粤语文化、西洋文化。对于年轻人，三种文化都能接收到，但我们觉得最时尚的是西洋文化。之前其实已经有猫王这样的偶像影响到香港，但是1963年甲壳虫乐队成立，震撼了世界。英国的这支乐队在1964年到美国演出，美国人都疯了；跟着来香港，香港人也疯了。他们拍了个电影叫作《一夜狂欢》，我姐姐去电影院看了整整10遍。我们男孩子都开始留长一点的头发，穿牛仔裤，但父母非常反感。那时候香港还没有牛仔裤，我们到处去找，一些做成衣出口的工厂才有出口剩余的裤子。还有就是拼命练习弹吉他，香港的一大批乐队这时候纷纷起来。这是标志我们成

长的时间节点，嬉皮文化彻底改变了这代年轻人的思想。我们注重现世享乐，跟父辈完全不一样了，两代人从此没办法沟通。

青春期的尾巴就是1973年的“股灾”。中国香港股市从1971年开始狂涨，全民炒股，恒生指数从100多点涨到1700多点。大家学会了投机赚钱的思想，原来不用做事就可以赚到这么多。可是1973年，股市又从1700多点掉回100多点，这个学习过程就完了，很多人跳楼死掉，我们则正式进入社会。

这个时候内地的年轻人在干什么？在闹“文化大革命”，在当红卫兵，所以人生经验完全不同。我写《什么都没有发生》，主人公名字叫张得志，我整本书就在写他的价值观：做专业的事，赚钱，享受美食、红酒、女人，一切钱能买到的最好的东西。“我们是国际资本的港籍‘雇佣兵’。为谁？无所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爱自己。”

文艺书屋和新浪潮电影

我在香港的生活地图中，形态各异的书店是重要站点。上学的时候最常去的，算得上我的启蒙书店，是开在尖沙咀一座大厦五楼的文艺书屋。

其实香港一直都有很多街头小书店，因为租金高昂，租不起底层的商铺，所以通常都开在高层单位里面。但是我自己对于书店比较注意，可能要到念大学第一年的时候。大概是在某份报纸上看到介绍，就摸到了文艺书屋。感觉不算早也不算晚，踏进了对的地方。那里都是盗版的中国台湾的书，这太重要了，因为当时的台湾才是中国文化最有创意的地方，很多好作家都在台北。在文艺书屋里，我看到林语堂、梁实秋的作品，张爱玲的东西也在重印，还有白先勇、李敖、柏杨、余光中、殷海光这些作家的书。中国台湾的书是最有意思的，我

认为如果当时不是在很短的一年时间里，我频繁造访文艺书屋，可能在我的知识结构里会丢掉很大一块。那样的话，我会比较像正常的中国香港的年轻人。

和我同龄的这一代，所谓“正常”的香港年轻人，崇尚西洋文化，也在学校里学传统的中国文化，背唐诗宋词，因为要考试的。可是这种教育没有现代，历史书讲到清末就没有了，不再讲下去，我们不知道现代都发生了什么。中国台湾这个窗口就显得很重要，打开了我对现当代中国的眼界。中国台湾文化的趣味，是民国的趣味，如果没有这一块，我们都会从传统中国直接跳到西洋去。

那时候也不光依赖文艺书屋，我还自己找东西来看。从《中国学生周报》上面知道，电影很重要，而且不应当只看市面上的好莱坞电影，欧洲电影也很重要。当时中国香港的电影院已经非常多，而且香港有影会，就是电影爱好者们业余组成的俱乐部，最重要的一个是“第一影视”。影会这种形式最早是在香港的外国人发起的，专门放电影院里不放的片子，租用会所的场地，也对观众收门票。所有当时最重要的艺术片，几乎都可以同步在“第一影视”看到，那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电影方面我们已经和欧洲同步了。大家觉得特别时尚，去影会看电影显得比较有文化，所以自认是文艺青年的都要去看欧洲艺术片。

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是法国文化中心，专放法国电影。我在那里看到了很多新浪潮作品。现在北京也有了法国文化中心，不过都是放DVD了，很方便。不像当年胶片时代，要申请拿拷贝才能放电影，所以需要一个专门的组织去做这些事。

年轻时的读书和观影经历培养了我的兴趣。那时候大家认为最好的工作是做医生，然后是政府公务员，再后面是进企业做事。律师还不像现在这样吃香，香港大学在20世纪70年代刚成立法律学院，头两年只能招到最差的学生，因为大家对这个职业不太了解。结果香港经济在那时突然转型，金融资本落地生根，所有公司一夜之间都要找律

师、会计师。可当时我完全想不到自己要去做什么，就去念了新闻学位，想拖延时间，另外也觉得做新闻好像什么领域都能看到，应该有趣。

在香港大学和美国波士顿大学念完新闻，我进了香港的一家英文报纸做了9个月记者，所有报道都做遍。有时候去法庭，有时候去火灾现场，有时候去政府。每天很早起来，听我们老总的指令，把中文报纸的重要新闻翻译成英文，然后去采访，非常累。9个月够了，什么都学到了，我开始想办自己的杂志，于是有了《号外》。

走在主流之外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香港有很多小报，由知识青年们创立，不公开发行。有名的除了刚才提到的《中国学生周报》，还有《年青人周报》，后来还有一份激进青年办的《七十年代》双周刊。大学预科那年我开始看《明报月刊》，一期不缺，感觉摸到了中文知识分子的真正趣味所在。像我这样的文艺青年们都唯《明报月刊》马首是瞻，以致我大学毕业后两年，用中文写的第一篇上万字的长文，就是投给《明报月刊》而不是自己办出来的《号外》。

1974年我去美国，看到当地嬉皮文化最后一波地下报纸，比如波士顿的《*The Boston Phoenix*》《*The Real Paper*》、纽约的《村声》。这些报纸的特性就是依照同代人的趣味来定位，一面谈论世界大事、政府丑闻，一面谈论文学、电影、音乐。凡是这代人喜欢什么，里面就有什么。我回到香港以后就想做这样一种综合性的刊物。但还是从香港的报纸传统起步，最初的5期是报纸，开本差不多就是现在《新京报》这样大小，中文名字叫《号外》，英文名字是《*The Tabloid*》，意为“小报”。出到第6期，改成16开的月刊，英文名也改为《*City*》。

我找了三四个朋友一起办《号外》，第一期印了一万份，发行出去一两千份，因为发行商看我们寒酸，不愿发行。最后卖掉两三百份，剩下的我用手推车送去湾仔横街后巷的废纸回收店。本来是双周报，改成月刊，也是因为在报摊放太久，报纸都烂掉了，杂志会好一些。

我们叫《号外》，就是想做香港主流媒体之外的东西，后来发现很难。开始是我自己出钱做，后来招股，朋友们陆续加进来，招到20多个股东。我们一直亏本6年，之后慢慢收支打平。应该是运气好，很多人愿意免费帮忙来做这本杂志。我自己从1976年到1980年做出版人，没有拿过薪水，就这样熬过来了。

《号外》在20世纪80年代比较成功，其实香港的70年代才是真正的百家争鸣，非常多的小刊物，有些做一两期就没有了，也有的能做几十年。现在看内地的局面也比较丰富了，但是办杂志的成本已经太高，每天就是烧钱。实际上我觉得，今天内地的媒体，已经比香港做得更好，像南方报业旗下很多报刊的深度调查，还有《财经》这样的杂志，更是远远超过香港同类媒体。要知道香港财经刊物都是很烂的，他们怕得罪企业，基本都是一边倒的公关文章，深入的报道没人做。

我做杂志一直没收入，到1981年扛不住。当时有小孩了，我只好去做编剧赚点儿钱，就这样进入电影圈，正赶上香港电影的所谓“黄金十年”。一批留学外国学电影的人，像徐克他们，20世纪70年代末回到香港，还有一批是TVB（香港电视广播有线公司）训练班出来的人，比如谭家明等人，从电视转战电影，这样两批人就汇集出了新的风格。一些新导演看到我写的文章挺有意思，就叫我去写剧本。20世纪80年代香港文化有种整体要转型的趋势，老板们宁愿试一些新人，都不要老人们做下去。我进入电影圈一看，40岁以上都不要了，全是我这样二三十岁的人。机会汹涌而来，大家都成功了。

好运气的一代人

我在内地出了这本《什么都没有发生》和《我这一代香港人》，描写的就是中国香港所谓“婴儿潮”的一代。1949年之后，很多人从内地到香港，香港人口增加很厉害，有很多小孩出生。今天香港的主导力量，就是生于1949年到1960年的这一代人。

这代人运气特别好，在安定的社会长大，没有吃过太多苦，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的生活。小时候可能住在贫民区，拿到扶助金进大学，毕业时正赶上20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膨胀，马上能找到很好的工作。我记得港大1973年毕业的社会科学院的同学，一下子被美资银行请去三十几个人，我们都傻了，以前哪有外资企业请这么多人？因为20世纪70年代初外企拼命在香港设立总部，请好多刚毕业的新人进去训练，后来做到港府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就是这批人里的一个。他的很多同学也都运气很好，30岁左右就纷纷做到外企的副总裁位置。

即便遇到1973年“股灾”，外资仍然蜂拥进入香港，合力造就繁荣。这也让我们这代人接受了西方现代商业理念。大家整天想的就是怎样投入较少而回报较多，而且只要眼前回报多了就好，将来的事先不管。我们父辈不见得有这种心态。

如果说这代人的经历中发生过什么，1967年的街头运动应该是有影响到我们，尤其是外省移民。第一拨移民的感觉好像是逃工来香港，差不多要稳定下来了，谁想到爆发运动。那年房价跌得厉害，街头有骚动，有些胆大的，并且也决心留下来的人就去买房子，后来赚到很多。所以1967年是香港财富转移很厉害的一年，很多本地商人，包括李嘉诚他们，就是在1967年崛起的。他们对香港有信心，不怕。港英政府经历1967年事件之后也开始改变，做了很多善政来安抚民心，包括提供公共房屋、设立廉政公署，等等。如果没有1967年的冲突，也许改变还不会这么快。

我那时候读中学三年级，看到街上有冲突，有对阵，有示威，当然有点儿害怕。我们的父辈有种“过客”的心理，本来只打算在香港暂留而已。可是我们这代人开始觉得，香港是我们自己的地方，是我们的家，一生要在香港终老。所以我一直都说，我其实挺理解2008年中国青年表现出的那种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跟我们那代人对香港的自豪感相似，就是要经历一些事件才会激发出来。香港那时候也还有很多毛病，但是如果人家批评香港，我们会跟他翻脸，因为我们觉得香港好，大家都能分一杯羹。

但是我们这代人的公共意识也没有那么强，大部分人还是沉默的。20世纪70年代香港兴起保钓运动，那几年也是香港学生运动最强的时候。最大的那次游行我去了，可是只见到一两个同宿舍的同学，大部分学生都没有参与。后来很多人说，那是个火红的年代，实际上它的影响，并没有现在回顾历史时说的那么大。

北京是最好的看台

《什么都没有发生》的结尾，我让张得志在街头中枪死掉，他的人生终究还是不能圆满。这代香港人的故事，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算是一个节点。1997年也有金融风暴袭来，经历过1973年的香港人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我们每次最多低迷几个月就会回来。经济总有调整，调整完毕就会更快更强地上升——这是香港人的思维惯性，没想到1997年这次风暴，深深打击了香港人的自信，一直到2004年左右才恢复过来。当时大家觉得，可能真的不行了，这一代人的好运气到头了。

出于对1997年的担心，20世纪80年代很多香港中产阶级移居海外，但年轻人已经有了归属感。即便走掉的人其实也挺怀念香港，很多人把老婆小孩搬出去，自己再回到香港做事。不能没有归属感，没

有地方可去啊，香港是唯一的家。如果是20世纪60年代出去留学的人，可能会千方百计留在美国，但是我20世纪70年代出去，留学才一年零三个月，都很想回香港。年轻人有改变社会的雄心壮志，在国外读了一点儿书，觉得有点儿想法的时候，就特别想回去改变香港。

1992年我来到北京，1994年又去台北，那时候开始想到，应该多看看香港之外的中国。北京是最好的看台，这里混杂太多不同的人，太强大的气场，香港和台北都找不到这种经验。我想一定要住在北京，就花很大力气，把放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美国的书都搬过来，不准备再回去了。香港曾经很精彩，现在已经没什么故事再发生，而北京的大戏才刚刚开演。

2000年我开始定居北京，可是这么久了也才写出一本小说来。《盛世》里边我写了一个叫韦国的年轻人，名校学子，热心仕途。其实我不能说自己很理解当下的年轻人，我接触的也不多，主要都是媒体里面很聪明很厉害的年轻人，大家才能聊到一起去。但是像韦国这样的也碰到过，我觉得这种要干大事、要从政、要领导国家的精英心态，也许只有少数名牌大学的青年才会有，多数中国年轻人不见得这么关心政治。记得看过一个调查，让大家列出最崇拜的10个人，在北京做这样的调查，可能10个人会有各行各业。如果在香港，我想结果9个会是大商人，剩下一个是明星。起码从我们这一代香港人开始，偶像要么是做生意的，要么是演艺界的，不可能有其他的文化影响这代香港人。

所以张得志没有别的出路。他自己也没想过做别的事，就是寄生在资本里面，按照游戏规则出牌，但随时可以破例。他学到一些看报表、写计划书的技术，可以活在任何一个世界，全看机会选择。只是靠自己，没有回家的方向，“我又有何损失？”

这就是一代香港人的生存哲学。如果把香港的故事拍成电影，我们一定是平淡的最终章。

以诗之名，书写草原

2010年，席慕蓉在大陆正式出版了诗歌全集，算是对过往30年诗人生涯的一个总结。事实上她早已不是30年前那个写《七里香》的席慕蓉，如今让她念念不忘以至反复书写的，是辽阔的蒙古草原——她称之为“原乡”的地方。谈起民族文化，她自己觉得，“如果你不打断我，说上三天三夜都不会停。”然而她终究是写诗的人，她的讲述中蕴藏着对自然事物的细密感知。半个世纪的漂泊、奔走，在她看来，也抵不过草原上一片落叶的重量。

在这样一座落叶堆积的森林里面，

有这么多人走过，

相信也有人爱过。

永远的插班生

我喜欢小开本的诗集，可以放在包包里，跟着我一起旅行的那种，贴身又贴心。在我年轻的时候，准确说是初中二年级开始写诗，那时我绝对想不到将来可以出版自己的诗集，更想不到会在大陆出版。而现在我却恍然发觉，从1981年《七里香》出版，居然已经过去了30多年。

我读书、写诗，都是因为寂寞。因为战乱的关系，我到香港读私立小学，老是做一个插班生。每次都是人家已经读了一年了，是个完整的团体，这时候我转学过来，怯怯地站在门口。我们总是对陌生人

有天然的排斥感，我年纪小，不知道自己侵入了一片新的“领土”，总觉得自己是被排斥的，与周围的同学格格不入。当我很努力地融入这个团体，得到一两个朋友，就又要转学了，一切又要从头开始。

最恐怖的时间，是我从香港的初一到台湾的初二，考进一个非常好的女校，又是插班生的身份。香港的初一是没有代数的，而台湾就学过，所以数学课本对我来说是天书，那时候我的数学都是考零分的——永远需要补考。补考的时候老师开恩，考试前一天写四个题目在黑板上，写完就走了。其他同学一看，这些题目简单到不得了，就教我们这些补考的学生做。我还是不会做，傻傻地看着题目，最后只有靠背下来，四题里面背会三题，第二天补考得75分。

有个教我做题的同学，后来到马来西亚去了。前几年我去马来西亚发表新书，那个同学也来了。我就对台下的读者们介绍说，这位是我的恩人。我对数学如此恐惧，以至于多年以后做梦，梦里面老师还对我说：你零分。梦醒了我就好高兴：我已经长大了，不需要学数学了。

这样惶惑的少年时代，是什么救了我呢？就是国文课。国文老师拿我写的作文到别的班级去展览，我写东西的时候，老师就站在旁边看着，我都不知道——我完全沉浸在文学的意境里面。在国文课上，老师教我们《古诗十九首》，让我们背《长恨歌》《琵琶行》，“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这么简单的几个字，给我巨大的震撼。

你也许会说，才十几岁的小孩子，怎么能够理解《古诗十九首》里面的离散、漂游？可我确实有颠沛流离地走来，一路做插班生，一路被排斥，直到遇见诗歌，突然间觉得有生命在文字里跳跃。我现在懂得，诗歌可以放到任何一个人的心里面，而我寂寞的心，刚好接收到了这样的讯息，从此对古典诗词特别喜欢。当年教我们小学跟中学的老师，其实很多人都完全可以教大学，只是因为战争流落到香港、台湾。他们把战乱年代的悲伤和祝福，都凝聚在了国文课里。

蒙古祖先的记忆

1958年，我发表第一首诗，当时念高中二年级。我在教室里得不到朋友，回家就在日记本上写诗，日记本是我的朋友。母亲说我脾气蛮犟，我自己也知道，跟社会相处的时候，必须要做一个合群的人。但写诗是可以最不合群的一件事，比画画还要自由。你知道每个艺术家都有所谓的虚荣心，画一幅画出来想要得到别人的赞赏，然后开画展还要去找会场，都要跟社会打交道。但是在写诗的时候，我没有欲求，谁也不要想管我。

可是最后我发现，还是我的原乡管住了我。《七里香》这本诗集里有两首是1959年写的，有一首写我穿过松林，有月光，每天晚上有鹿的影子。结果在2003年我就真的看到了这首诗里面所写的景象：在我母亲的家乡，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今内蒙古赤峰市），中秋节的晚上，月光如水。我穿过母亲家乡山上的松林，遇到长着美丽犄角的鹿坐在路边看着我。我乘坐的车子过去以后，那头鹿站起来，走进了森林里。

月光，松林，鹿影，一切都是我十几岁时写过的景象。

《七里香》里有幅我手绘的插图，画的是一棵树，有长长的影子。朋友对我说："画得不对，台湾的树哪有那么斜的影子？"这个朋友在许多年后跟我到草原上，指着一棵树惊讶地叫我："席慕蓉，那不就是你画的树吗？"太阳即将落下，一棵小树长在草原上，拖着好长好长的影子。

我无话可说。这样的事实对我有什么意义？原来我的身体里面，除了出生以后的记忆，一定还有属于我的族群、我的祖先的记忆——来自蒙古草原的记忆。

于是我想回去看看，可是两岸长久隔绝，便有了所谓的“乡愁”。

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

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

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惘

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

离别后

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

永不老去

听说这首《乡愁》还被选进了大陆的课本里。对我来讲，乡愁不是针对个人的情感，英文里面有个说法，乡愁是“对久远的、已经消失的美好事物的怀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人类都有共同的乡愁。

这个世界真好玩儿，我当初写诗真的是为自己，才不在乎谁要看。而现在我写很多关于蒙古的诗歌，包括《追寻梦土》和《蒙文课》这两本散文，就特别希望别人来看，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我热爱的蒙古草原。每个人都对我说，因为你是蒙古族人，所以你喜欢蒙古草原。我开始也以为是这样，后来慢慢发现：不是的，乡愁不限于故土。在我还没有回过原乡的时候，为什么也有乡愁呢?

重返草原

问题在于，我并非刻意，而是走着走着忽然发现乡愁的所在。1989年我终于到了大陆，当时两岸解禁不久，公教人员可以回来探亲。我像一个婴儿般，触摸到了真实的蒙古草原。有人带我走一些

路，有人告诉我一些故事，像老师一样教我理解自己的原乡。我后来跟人家说，感觉自己好像进小学了。

然后就是频繁地回来。有些地方我不止去一次，像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我已经去了八次。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第四次来。还有巴丹吉林沙漠，第二次来。我一次再次地回来，在很多地方碰到人问我："你怎么老来？"我说我也不知道，就是觉得上次好像没有看清楚，很想再来看看。

我拿着书，一路走一路读。我读乌热尔图先生写的鄂温克史话，比如《述说鄂温克》。鄂温克族在呼伦贝尔游牧，乌热尔图先生是鄂温克族优秀的文学家、学者，他的作品就像字典，一个个部族的名字，在我看来都蕴藏着深邃的历史。你知道真相的后面可能还有真相，乌热尔图的书就常常让我有这种感觉。举个例子来说，我去过好几次鄂温克地区，在大兴安岭里面有个沙地樟子松的保护区，那片森林我还进去过。山上有位80多岁的女猎人，我拜访过她两次，我还是鄂温克的荣誉公民——这些已经证明我足够了解鄂温克了吧？后来听人说，像她这样的鄂温克猎人，中国只剩下100多位了。鄂温克族还有两万多索伦和几千个通古斯（"索伦"和"通古斯"为鄂温克部落名称），一共差不多三万多鄂温克人在中国，他们来自西伯利亚的勒拿河流域。

这已经是真相了对不对？其实还远远不够，我读了乌热尔图先生的书才知道，天哪，这个族群的文化，远比我想象的还要丰富。原来在蒙古秘史里面有记载，年轻的铁木真曾经遇到一次最大的灾难，把他救出来的就是一位鄂温克人。后来铁木真娶的那个皇后孛儿台，也是鄂温克人。鄂温克人的历史分布，从贝加尔湖一直延伸到阿拉斯加。

有个神话传说：很久以前鄂温克人要往人多的地方迁徙，走到海边的时候不敢走了，那是白令海峡，冰天雪地，环境险恶。萨满带他

们走过去，说不要害怕，记得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叫阿拉斯加——我翻开乌热尔图的书，他说在鄂温克的语言里，“阿拉斯加”的意思是“等候你”。多么美丽的传说，我们在白令海峡的对岸，等候你。

我现在就随身带着乌热尔图先生的四本书在读，还有耿世民先生的书，关于突厥碑文的翻译，我也读得津津有味。怎么办？我现在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人，欲罢不能。如果说1989年我刚回来的时候像个婴儿，对自己的原乡一无所知。那么现在20年过去，不断地走路和读书，我应该算是大学一年级的新生了吧？

我折叠着我的爱

有人问我，既然你这么热爱蒙古草原，为什么不在那里定居呢？我要坦白说：我怕冷。到了大兴安岭，零下三十几度，我实在受不了。现在还常有那边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说，空气都结冰了，大白天出门要开灯，因为整个世界都在雾里面。我已经是在中国台湾生长起来的一棵树，不敢移植到蒙古草原上，就是这么简单的理由。所以我春天来、夏天来、秋天来，冬天很少来。

可是蒙古草原，无时无刻不在我的心中和笔端。《我折叠着我的爱》这首诗原来的名字叫《长调》，因为我有一次听完蒙古长调之后，非常感动，到处找人问那个颤音叫什么。没人回答我，直到问到一位唱长调的女歌手。

她站起来对我说：“席老师，在我们蒙文里面，长调的这个特殊唱法叫‘诺古拉’，汉语的意思就是‘折叠’。”

我折叠着我的爱

我的爱也折叠着我

我的折叠着的爱

像草原上的长河那样婉转曲折

遂将我层层地折叠起来

这就是我找了十几年的灵感。蒙古的长调，歌词可能只有两三句，唱起来却百转千回。正是她所说的“折叠”打动了我，我的忧伤可以折叠起来，欢喜可以折叠起来，见到你，我就慢慢地唱出来，一点一点，把折叠的爱打开来——这不就是蒙古长调的神韵所在吗？虽然听起来像绕口令，但是能够抓住“折叠”这个词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又进入了蒙古原乡的更深一层。

有一天晚上，我乘车在呼伦贝尔走夜路，为了等后面朋友的车，我们就停在大草原的中间。他们招呼我下车看看，我还不想下去，因为很困。

朋友说：“你还是下车会比较舒服一点儿。”

我就下车了，在车灯照射的范围内活动，伸伸腿什么的，也很无聊。茫茫原野，周围是无边的黑暗。司机说，后面的车好像还要很久。然后他就把马达停掉，车灯熄了。

这一下子陷入黑暗，我才下意识抬头看天：哇，真是穹苍！圆的天幕上面，满满的星星。在车灯照亮的小范围里面好像很高大的一个人，面对星空，忽然像蚂蚁一样渺小。但是人在缩小的时候并不会害怕，我脚下踩的地还很踏实。在那样的时空中，我忽然发现，人类是怎么走过千万年的岁月的？那么久远的时间里，我们所有人的祖先都在这样的星空下走过，走在黑暗的土地上，温暖而又坚实，这样走出一条路来。那天晚上我收获了惊喜，遇见了我的原乡。

我总以为别人跟我一样，能体会到这些繁复细密的情感。所以别人问我，你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我不知道。也有人帮我解释，说每个艺术家，或者说从事艺术工作的人，都有一个追求的目标，精神的原点。我想没错，我是受美诱惑的人，如果蒙古草原不是这么美好，我大概不会如此痴迷。

人生没有当下

我在写一本新的诗集，已经写好了几十首，其中有一首写道："以诗之名，我们呼求繁星。"有位满族学者富育光先生是研究萨满教的专家，他说满族祭星，就是大声地呼唤，相信星星会经过人们的呼求而更加明亮。

这给了我启发。相同的道理，我在大兴安岭看到杜鹃花开的时候，落叶松、樟子松底下的腐质层，就是一层一层的落叶堆积化成。其实这就是生命的过程，所有的腐质层，是我们生命落下来的记忆。以诗之名，我们呼求繁星，以诗之名，我们还要做很多事情，比如呼求爱情。在这样一座落叶堆积的森林里面，有过戎，有过氐，有过鲜卑，有这么多人走过，我相信也有人爱过，不是只有我而已。

我以诗之名书写蒙古，难道一定是要发表议论吗？不，我有很多种方式来表达情感。我写过一首短短四句的诗叫作《鹿回头》：

> 在暗绿褐红又闪着金芒的林木深处
>
> 一只小鹿听见了什么正惊惶地回头
>
> 眼眸清澈的幼兽何等忧惧而又警醒
>
> 恍如我们曾经见过的 彼此的青春

这首诗副题为“记一把三千年前制造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小刀上的纹饰”。我曾看到一把古老的青铜质匈奴刀，匈奴刀上会刻很多动物纹样，这把刀上是一只小鹿在回头看。“回头鹿”是鄂尔多斯青铜器里面很出名的一种纹样，我从这把刀上，看到了自己从前恍惚见过的景象。每一只小鹿在森林里面都很紧张，时不时回头张望，一如年少时永远做插班生、永远做陌生人的我。所以其实这首诗，来自一个考古界的线索，但是我拿来放在诗里。我们年轻时候都是蛮惊慌的，不知道要碰到什么，这就是青春。

其实我想说，人生没有当下。“当下”永远是马上过去的，所以诗歌是把“当下”留下来的重要方式之一。我们常说珍惜时光，把握当下，其实当下在哪里？在诗里，在所有的文学作品、绘画作品里，在一切艺术里，唯独不在我们的人生里。

我的本业是绘画。在台湾，我常画荷花，用很大很大的画布，有时像一面墙那样大。我出过一本画册，集中了我几十年来画的荷花。我为了画荷花到处跑，比如跑去巴厘岛，等等，在没有回到蒙古草原之前，我的生命都是在画荷花。

但是到了蒙古以后，我觉得又停不下来了，我必须在草原上、在森林里一直走。你问我是在做田野调查吗？不是，我就是去走路、去看，回来以后写一下我的想法而已。可是我认为我画不了草原，因为坐不下来，时间不够。我很羡慕那些蒙古族画家，他们画的草原让我自叹弗如，自己更加不敢画了。

找一个本子，然后开始

中国台湾的出版社出了一本我的散文精选集，要我谈谈所谓的“散文观”。我说其实我没有什么明确的观念，如果要我分析绘画、诗歌跟

散文，我会说绘画是我的理想，我希望在绘画领域达到某种目标，让别人可以肯定我，这是我很在意的。诗歌是我的痴狂，我管不了那么多，非写不可。并不是人们说怎样的诗好，我就去写怎样的诗，而是我只想说出自己的意思，有时候短，有时候长，有时候这样说，有时候那样说，诗歌就是这样绕着我的东西。

而散文是我的感动。其实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喜欢写诗，但有时候生活不让他继续写下去，必须要先去做别的事情，等到什么时候忙完了再过来，也许发现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想大家都可以写写散文，就在日记本上写，记录自己每天的感动。

我只是一个喜欢写作的人，很幸运有人喜欢我的诗，也很幸运能在生活中持续地写下去。所以无论出书还是挑选日记本，一个朴素的平装本对我都是最合适的。我庆幸自己从那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写诗，而且写完都留了下来。你知道吗，有次我去给高中生做演讲，学生问我，要怎么写出一首好诗？我想我不知道怎么写一首好诗，可是我知道怎么开始写一首诗。你先不要管好诗还是坏诗，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读者的评判标准，也许隔了几十年、几百年以后，今天的好诗坏诗都要混淆起来。那么我开始写诗的办法，就是去买一本自己很喜欢的本子。我从小喜欢看上去干净朴素的本子，在这样的本子上写日记，慢慢写起诗来。一句话回答问题，就是先去找一个本子，然后开始。

我经常也拿一个本子进卧室里，哄我的两个孩子睡觉。平常我在画室里画油画，自从孩子出生以后，我所喜欢的猫狗都不能进房间，我每次碰孩子之前要洗好几次手，我变成一个有洁癖的妈妈。孩子的房间不能有虫蚁，当然也不能有油画的颜料跟气味。

那我想画画的时候怎么办呢？在欧洲留学的时候，除了学油画，我还辅修铜版画，但是那种铜版画用的药水也不可能放到小孩的卧室里来。我就拿了一支针笔，再拿一本比较大的本子，在孩子的两个小

床旁边坐下来。孩子们躺在床上，看到妈妈用针笔细细而缓慢地画，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那是非常安静和幸福的时刻。有时候孩子们也要求我讲故事，我就一边画，一边讲我编出来的故事。故事不小心编得比较深入的时候，我就放下画笔，合上本子，开始声情并茂地学给他们看：风吹过来怎么样，雪下起来怎么样。这样讲得手舞足蹈，忽然发现，我的先生在房门口偷听呢……

比他老的老头都走了

2010年7月28日，北京通州，万荷堂。

“荷塘的荷花开了。”素净的请柬上，写着这样的邀约理由，毛笔小楷，语气淡然。“万荷堂有个小小聚会，如果有空，欢迎您的光临。”末尾还有句提示：“勿带小孩，以免恶狗咬伤。”我跟着李辉先生造访万荷堂之时，正值热浪烘烤京城，院中大狗数条，皆未拴锁，却也纷纷慵懒地趴着，懒得看穿梭来客。

门外豪车列队，堂内显贵满座，每年例行的赏荷会，也是万荷堂主黄永玉的寿辰。

2010年，他已八十有六，依旧精神矍铄，行动敏捷。每日烟斗不离手，火光闪亮，袅袅烟雾升腾，黄永玉便来了谈兴。几多英雄故交，历史波谲云诡，盛名非议，都成传奇。

大时代像个筛子，

这帮青年就像沙子一样被筛来筛去。

李辉萌发为黄永玉写传的念头，早在20多年前。

1989年清明，两人同往凤凰古城，这是黄永玉的故乡。一路上话题不离沈从文——李辉要做研究课题，黄永玉则是沈从文的表侄。直到几天后临别之际，黄永玉才讲起了自己的儿时记忆：“少数民族庆典，大傀儡戏，搭台，一个人演。清明挂坟。端午节有龙船，重阳登高，过年舞狮子。中秋节，衙门口的石狮子全城人都去摸。”黄永玉说，“我有时不免奇怪，一个人怎么会把故乡忘记呢？”

他骨子里却还是不安分的人，湘西土家族的血脉传承，让黄永玉敢于冒险，不惧远行。1937年硝烟弥漫中华，12岁的黄永玉背起行囊闯江湖，从此一生漂泊。在厦门，他考入著名侨商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不爱课本爱木刻，读了两年书就弃学而去。当过瓷器作坊小工、蹩脚的话剧演员、上海郊县中学教师，依然抱定刻刀不松手，终于在文艺界崭露头角。汪曾祺给沈从文写信：“真有眼光的应当对他（黄永玉）投资，我想绝不蚀本。若不相信，我可以身家作保！”黄永玉亦视汪曾祺为难得知音：“我的画只有他一个人能讲。”

在香港，黄永玉交游广泛，萧乾、聂绀弩等人对他多有助益，黄永玉也开始涉猎更多元的艺术领域，甚至写过电影剧本。1948年黄永玉在香港大学举办首次画展，1998年，香港大学再次邀请黄永玉举办画展，名曰“流光五十年”。黄永玉感慨万分：“时光待人，快慢各不同。抗战8年，很长；‘文革’10年很短；‘文革’后20年几乎一眨眼；于是，十几岁的人一下变成70岁的老头。”这时他重逢昔日同事金庸（查良镛），半个世纪前两人在《大公报》同一间办公室。黄永玉脱口而出：“小查！”金庸笑道：“现在恐怕没有几个人叫我小查了吧？”

1949，转折之际，在北平的沈从文精神失常，自杀未遂。获救后，他写了封长信给黄永玉：“解放军进城，威严而和气，我从未见共产党军队……你应速回，排除一切干扰杂念速回，参加这一人类历史未有过之值得为之献身工作。”听了表叔的召唤，1953年，黄永玉携妻挈子，离港归京，也就此卷入了浩荡险恶的政治洪流。

李辉的笔记本上有黄永玉画的一只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寥寥几笔，憨态可掬。那还是在1989年的凤凰，某天黄永玉兴之所至，用钢笔信手勾勒，并在画下题写四字“为善最苦”——这当是有感而发。回想“文革”10年，美术界落叶飘零，黄永玉同丰子恺、林风眠、李可染、李苦禅、黄胄等诸多大师，一并被批成“黑画家”，相对年轻的黄永玉更是不合常理地名列首位。“黑画事件”的祸水，便来自

他擅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被说成“仇恨社会主义革命现实”。那段岁月，黄永玉识尽人间百态。

在李辉看来，1976年之后的黄永玉生平与创作经历，是更加绚烂多彩的图景：以黄永玉为原型创作的电影剧本《苦恋》引发激烈争议；黄永玉设计的新中国第一枚生肖邮票“猴票”成为集邮界追逐的极品……20世纪80年代以来，黄永玉成了坊间皆知的“画坛首富”，也与一些艺术家之间颇多恩怨纠缠。这一切，都远非当年那个湘西山中的少年所能想象。

“他两岁多，坐在窗台上。爷爷从北京回来，见到这个长孙，当着全家人说，这孩子‘近乎丑’！”

这是黄永玉手头正在写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开头。李辉说：“黄永玉的文字，完全看不出所谓时代的烙印，他的表达方式没有受到任何政治语汇的影响，这在与他同时代的老辈文人中绝无仅有。仿佛当他提笔写文章，就立刻进入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艺术世界。”如今的黄永玉，不仅画画，更爱写作，也许在文字构筑的回忆里，有更多故人魂兮归来。

1997年5月，汪曾祺因病去世。彼时黄永玉正在意大利的家中，女儿黑妮告诉他：“汪伯伯去世了。”

黄永玉闻言，“嗬嗬”两声，说：“汪曾祺居然也死了。”

那年8月，黄永玉的万荷堂修建完工，他重回北京定居，叹道：“要是汪曾祺还活着该多好，可以把他接到万荷堂多住几天，他一定很开心。”

2008年的某个夜晚，黄永玉又给李辉画了一只猫头鹰，画得很慢，很细致。与1989年不同，这次的猫头鹰，两只眼睛都睁着。

黄永玉在画上题跋："二〇〇八年画这张猫头鹰，是因为日子平平安安，才那么悠闲从容一笔笔画下来。以前那些浅薄可笑残忍的日子里，要弄死一个人随便找个理由就行了，何况还有一些毋须乎理由被弄死的许多人。"

画完写完，稍许沉吟，他又加上一句：

"李辉同志请勿揭发。"

黄永玉自述：12岁出门远行

我这个人的生活很简单，就是劳作。

从少年时代开始，习惯了每天干活儿。12岁离开家，在外面到处流浪，吃了很多苦。1937年日本人来了，有一次我正在理发，飞机扔炸弹下来，我赶紧跑，炸弹就在旁边爆炸。还有一回碰上日本人开大炮，后面还有骑兵，我也跑掉了，都很危险，差点儿没命。

那时候我从湖南凤凰的老家出来，本来进了厦门的集美学校，是华侨陈嘉庚办的，当时很有名。不过我不好好念书，过了两年就从学校跑出来，在福建一个山区小城德化，那里有名的是瓷器，我就在一个瓷器作坊里当小工。空闲的时候，和几个同样年轻的朋友一起学习木刻。我们在报纸上发现了一个卖木刻刀的广告，很高兴，省吃俭用三个月，凑齐了四元两角钱，还附了一封热情的信，寄到卖木刻刀的浙江金华。又过了6个月，几乎绝望了，终于收到邮局的通知单，我们从邮局里像抢劫一样领出了包裹。回去打开，发现有一把小圆刀已经碰断了，好伤心。

1947年到上海，我在闵行县立中学教书，和汪曾祺、黄裳的交往比较多些。汪曾祺在上海城里的致远中学教书。每到星期六，我就坐公共汽车过去找曾祺，再一起去找黄裳。黄裳在轮船公司做高级职员，很高级的那种，我们一去他就可以放假，不用跟别人请假的。黄裳有钱，我和汪曾祺没有钱，所以几乎每次都是黄裳请客。大概有一次是我请，是有个稿费寄到了，他们说你该请客了，所以我可能请过一次。汪曾祺谈不上请客，其他时候都是黄裳带着我们到处玩儿。

关于汪曾祺，该写的我也写了。他是我认为全中国文章写得最好的，一直到今天都这样认为，他的文章很讲究。跟汪曾祺在一起玩儿，一起到处走。但是也就这么几句话，没有太多的事。在我心里，汪曾祺的分量太重，反而写不出来。

倒是巴金先生，我要写的话还真的可以写一些东西，比汪曾祺可写的要多。我年轻时很怕巴金先生。倒不是说他脾气大，他怎么能对人发脾气呢？就是非常敬畏他。我见到那么多的老作家，都没有害怕，唯独对着他，肃然起敬。

我感觉，巴金先生真的可以称得上伟大，教育了整整几代人。到延安去的那些青年，都是受他的文艺思想所影响，我们叫作进步思想。他的作品，包括他的翻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他也是新文化的奠基人，跟鲁迅先生一起，有这样的力量。为什么没有人去总结当年这种群体感情，对他说一声多谢呢？反而后来大家对他的评价，好像用了另外一种眼光。

当年我搞木刻，显然受到鲁迅的影响。鲁迅发起了木刻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这是很有号召力的形式。现在说起来，我们都是在诞生不久的共产党领导下工作。然而对于文化界的老前辈，冯雪峰、夏衍、田汉、阳翰笙、楼适夷、乔冠华、叶圣陶，等等，我都是当成伯伯、叔叔、老大哥、老大姐，没有把他们当成领导——因为那个时候谁知道你是不是党员？就是他们说一句话，我们听了就照做，而且做

得非常坚决。我不是党员，也不懂党的号令来自哪里，现在懂了，原来那时候党员和党外人士都在执行革命任务呢。

硝烟下的港岛文人

艰难时世，自然有艰难的生活。现在叫“党性”，照这个说法，我们的确都很有“党性”。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我穷到没饭吃，每天走十几里路，到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去吃一顿饭，走回来继续工作。搞艺术也没有津贴什么的，我就讲，这是“自费闹革命”，很真诚的，一直保持很久很久。比如刻一个木刻，很普通的一张，发表了才5块钱。那么房租要50块钱，1个月要刻10块木刻，才勉强凑够房租。但是哪里有什么机会能让你发表10个木刻呢？进步的杂志本来有一些，让国民党封了，越来越少。上海这么多作家、画家，都靠那点儿稿费为生，都很穷。这样的状况下我做木刻，刻了一张不满意，觉得一个人物的脚腕那条线不好，就重新刻，又不满意，再刻，一直刻了5次，发表出来也还是算一张，5块钱。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这也是汪曾祺给逼出来的，他的意见我真诚地尊重。

1948年，我在香港开了第一次画展，那年24岁。本来我感觉自己还不够资格开画展，我这个水平怎么行呢？但是萧乾先生鼓励我，他在《大公报》做编辑，认识香港大学的校长，那校长是个老学者，英国人，叫施罗斯。这样就介绍我开木刻展，在香港大学的冯平山图书馆。我真诚地感觉到自己不够格，可是开了这么一次，胆子就大了，摸到门路，一直就开起来了。

那时候内地很多画家、老前辈去香港，躲避国民党的迫害，郭沫若、茅盾这些人都在，我一个小伙子算是搭在里面。在香港，和聂绀弩的来往非常多，基本上三两天见一次面。可能平时跟他在一起的那

些人让他心烦，我比较单纯。聂绀弩曾经把我的文章集结，要出一本散文集，书稿转来转去，后来也没有结果了。

查良镛是我在《大公报》工作时的同事，我跟他在一个办公室。当时他还没有写小说，只是翻译一些外国人写的“中国震撼世界”这一类东西。我们叫他“小查”，1998年我又见到他，还是这样叫。现在他最知名的名字是金庸，见到我就笑着说：“现在恐怕没有几个人叫我小查了吧？”

20世纪50年代，楼适夷先生的弟弟楼子春介绍我写剧本，当时香港那些进步新闻界里头，写电影我是最早的一个。还要感谢费穆先生，他是上海文华公司的大导演，阮玲玉的电影还有《小城春秋》都是他导演的，非常好的人。他让我改行做导演，跟他一起搞电影。我说你先看看我的画展再说吧。看完画展，他说，那你还是画画吧。

我写过一个剧本《海上故事》，费穆去世的那天晚上，正在改这个剧本。半夜里，他趴在桌子上死了，鼻子嘴巴的血就在稿纸上，流很多血。我的剧本《儿女经》拍成了电影，《海上故事》没有拍，因为费穆先生死了。

猫头鹰惹出“黑画”

1953年，我从香港回到北京。表叔沈从文给我写过很多信，比如1949年8月，他被安排到历史博物馆工作，在信中告诉我：“解放军进城，威严而和气。我从未见共产党军队，早知如此，他们定将多一如我之优秀随军记者……你应速回，排除一切干扰杂念速回，参加这一人类历史未有过之值得为之献身工作……”

沈从文是我的表叔、长辈，做人非常之好。他是比我更早一个时代的人，我很尊敬表叔，但艺术上很难有特别的影响。我和他风格不一样，看问题的方法也不一样。在艺术上，倒不如说，聂绀弩对我的影响更多一点。

为什么要从香港回来呢？其实到哪儿去，你都要回来。到美国，到欧洲，千方百计也要回来。当时看到国家这么好，把旧社会推翻了，产生很多理想。千辛万苦跟着共产党一起学习、一起工作，人家把国民党打跑了，那怎么能不回来呢？当然回来。这些理想是很真诚的，不是我一个人，千千万万的青年，包括壮年甚至老年，都从海外奔回来，就是真诚。

回来以后发生了很多事，但我不喜欢计较这个那个。我在中央美院过组织生活的时候，老受到批评，说"名利思想"什么的。为什么批评我呢？学校里那些人画素描，几个月才创作出一张，很困难，就我天天在刻，刻得还很快。这是我的工作习惯，抗战时候就养成的习惯。你说名算什么？利算什么？花半月二十天时间刻一个木刻，《人民日报》的稿费仍是8块钱，这又算什么名利？我十八九岁就在名利场混，还要什么名不名的。利也利不到哪儿去，我要利的话就不回来了。在美院教书，我这个人也没有后台。要找后台的话以前有很多老人家，我也不懂得去找。我不是延安来的，也不是徐悲鸿他们的学生，能放到美术学院里，我自己已经感觉到够幸福了。

那时候什么都不懂，对组织生活什么的都不懂，反正就一片开心地来工作，因此挨批评理所当然。那时候讲很多事情不应该做，其实怎么回事我也搞不清楚。比如说听音乐，我带回来很多唱片，一说都是资产阶级才有这些东西。党说这是资产阶级，我怎么能说不是呢？到了运动来的时候，我就沉默着接受了。让我写检查我就写嘛，就写以后要改，可是好像也没有改什么。我让学生看外国画册，也看延安的作品，延安时期的木刻的确是刻得很好。但是更多是要看外国的画

册，不光看木刻。我给学生们开书单，搞艺术的不看书怎么行呢，结果反而招来了批评。我老老实实写检查，过一阵子不搞运动了，学生们还是愿意听我的话，看外国画册。结果运动又搞起来，继续批判。

到了“文革”，人家看了我画的那些动物，就揭发出来，说攻击社会主义。我画了“睁一眼闭一眼”的猫头鹰，就被列在“黑画”的第一名。有些坏人，趁这个时候来搞事。有些人可能是我得罪他了，他暗中去告我。现在想起这些问题，我脑子里面越来越清楚。时间会让真相越来越清晰。

现在他们肯定会说，当年那样做是不对的，当年太“左”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今天很多人利用政治概念来推卸责任，“左”啊“右”啊，都是掩饰自己的说法，说到底还是人的品质问题。我有点儿可怜他们，因为成天把时间浪费在算计别人上头，荒废了他们很多宝贵的光阴，所以那些人现在很难画出画来。听说有一个平时靠整人为业的人，新时代来了，没有机会整人了，自己的画又画得不好，只好成天在家里生闷气，关起门来打老婆。按道理讲现在这么好的时代来了，你应该画得更好呀，应该远远比我画得好呀，可是没有，为什么？艺术需要突破，需要技巧，需要一点儿真诚和良心，而这个人的时间基本都用来整人了。

《苦恋》剧本出炉始末

“文革”结束之后，才是真正可以做艺术的好时代。反正几千年来，翻翻历史，也就难得这几十年安定时间，我觉得差不多可以了。但是我也不可能一天到晚想着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我给毛主席纪念堂画里面那个画的时候，《北京日报》记者来找我，问我“画画的时候心里想什么”。我说我就想，时间很长了，画了8个月了，希望赶快画完。他说还想别的什么吗？我知道他想让我说“一边画画一边想毛主

席”——这怎么可能呢？想这个耽误工作啊。我要认真工作，为了纪念堂把这张画画好，不就是为了毛主席吗？还有那些唱歌的，唱阶级斗争的歌，一边唱一边流眼泪，那你不就唱跑调了吗？人家欣赏的是你的歌，你的艺术，不是你廉价的眼泪。

后来还有个电影剧本《苦恋》，那是白桦找的导演彭宁，对我说要写个电影。写就写吧，他们找我聊天，聊啊聊，聊到后来，我要去广州开画展，他们还要跟着去。我说不行，你们去了影响我。他们保证不影响，于是就去了，还是我给他们找宾馆住。他们对我还是很礼貌的，最后白桦写了这样一个电影。写完之后，夏衍同志跟我说，剧中主角不要用我的真名。我感觉到夏公说的话很诚恳，他是有经验的，懂得电影里面的套路，一定有道理。我便把夏公的意见转告了白桦，并关照夏公的意见一定要遵守。

但是剧本在香港《文汇报》发表出来，剧中主角还是用了我的名字，我心想怎么会这样子呢，就不是很开心。到后来，北京的杂志《十月》要发表这个剧本，杂志编辑、诗人晏明来找我。我说你发表可以，不要用我的真名。他说发表用不用你的真名是我们的自由。我说这是夏公说的，如果你一定坚持，那我们可能要打官司。

然后他可能告诉白桦了，白桦花了很短的时间修改这个剧本，最后改写成大家看到的电影。当然不再用我的名字，故事也不是我原来的故事，那就和我没有关系了。

电影出来以后引起争议，对白桦的这种批判是不公道的。中国刚刚有新的面貌，为什么要批判？有一次在北京饭店二楼，那里有个我们美协的画廊，我走出来碰见白桦，我就对他说，你可能要吃官司了，如果到了法庭，我会走下来跟你站在一起。这个话，白桦应该记得。

以后有没有见面不记得，可能有次吃饭我过去和他握握手。后来听到他的说法是，“黄永玉不满意，因为黄永玉想亲自演主角，我们不同意”。有这个事吗？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他不了解我，我所有的老朋友都知道，我是根本不能上台的，因为我上台讲话完全不流畅，演戏就更不行了。20世纪50年代初在香港我自己写的电影《儿女经》，讲我朋友家里一群孩子，就是在香港怎么教育孩子的故事。故事里有个“叔叔”就是我自己，那个长城公司的老板提议让我演自己，我都不演。抗战时期我在泉州那边的剧团待过，有次演一个传令兵，就一句台词：“报告司令员，前面发现敌人。”这一句话排练了两个多月，结果上台就哑了。不是忘词，是“哑场”。没办法只好关幕，临时换一个演员顶替我。还有一次，在福建仙游，和几个人一起排演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我演男主角。演到三分之一，我又演不下去了。当时《闽中日报》的编辑林景煌，现在沈阳，他写过一篇文章叙述这件事，题目就叫《一个仓促的果实》。

所以我这辈子啊，绝对不能演戏。白桦大概是想不出什么主意了，就说我想演戏。其实你随便说个别的理由都行，比如说我跟你要钱你不给或喜欢骂人之类的理由都行嘛！他是编剧，应该会编各种理由嘛，但是硬讲我要演戏，恰好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荒唐了。只要是熟人，我美院所有的同事和学生，以及所有的朋友都清楚，我上台做演讲，都是要写很长的稿子看着读的。

还是写文章过瘾

写文章和画画相比，还是写文章比较过瘾，只要语言够用就行了。语言没问题的话，我心里头储存这么多年的经历，这么多的人物，写文章当然舒服了。我现在《收获》杂志连载《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是自传体小说，已经写了40多万字。我写文章没有提纲，想到

哪里写到哪里。当然也有个打算，就是想让人家看看我们那个时代是怎么过来的，一个小孩子怎么生长。

可是写文章养不活自己，我还得用画画来养我的文学爱好。我不讨厌买画的人，有史以来，中国、外国的画家靠谁活下来？米开朗琪罗、达·芬奇、拉斐尔，都要靠人欣赏。中国古时候画画的人地位不高，画出来给皇帝做贡品，一样的道理。你说清高，你也得谋生，怎么清高呢？躲在山洞里会饿肚子，当然也有个办法，假装住在山里隐居，把山洞弄得很有意思，搞一点儿手脚引人家来是可以的。所谓终南捷径嘛。可是现在看来，光躲在山洞里面不行，要靠传媒，让人家知道。没人知道你，躲在山洞里就完蛋了。

金钱和我的工作比起来，当然是工作重要、艺术重要。我的意思是这样，艺术给人带来的快乐和钱不一样，一心想着钱，你就别画画了，画也画不好。你认真画画，自己会很快乐，好朋友们也会沾染你的快乐，同时这些画出来反倒能卖个好价钱，真的。不然你干脆画钞票算了，你快乐吗？不快乐，而且画好多假钞票，也换不来几张真钞票。认真画画，钱来了，你挡都挡不住。

我个人的感觉，画画就是在探索技巧，一天到晚哪里有那么多的意义？一般来讲，人家看你的画，说这个色彩很到位啊，感情很激烈啊，都是人家在讲。也许伟大的政治家喜欢寻找意义，但是画家如果也要意义，就显得好笑了。但是艺术到了政治运动里头，那就也讲点儿意义了。比如说到了“文革”快要结束的时候，“四五运动”悼念周恩来，天安门很多人，就用木板围起来了，不让人进去。人们希望邓小平出来。一个以前做过武工队头头的朋友苏烈，从广东来看我，还有画漫画的沈培，兴致来了，我画了一个小玻璃瓶，上面写一个“等”字——等（邓）小瓶（平）嘛。我爱人还提醒玻璃瓶里要装红墨水，然后我们就把写的画的都揣在怀里，步行从北京站住处走到天安门去。

到了广场一看进不去，我那个朋友胆子也不是很大，他想了个主意，走到围墙边上，看到有解放军正在往墙上贴大字报。他跟一个解放军说"你帮我贴一下"，解放军说好，你等一等，贴完我的就贴你的。他就把那个"等小瓶"拿出来给了解放军。后来我们就走了，过了大约两个钟头，另外的朋友跑来告诉我们，说天安门有个人，贴了一张"等小瓶"的画，到晚上就让人撕了。

像这种画就是有意义的，在政治里头，意义就出来了。但是我们到底是搞艺术的，不能天天搞意义。我一直讲，画家和政治家，各干各的事。艺术和政治有一定的关系，时常又有一定的距离。

我的成长经历，就像沈从文跟我说过的：大时代像个筛子，而且是筛眼很大的筛子。我们这帮青年就像沙子一样被筛来筛去。很多人从眼里漏下去了，剩下粗大一些、耐磨的几粒留在上面。可是这样的筛法，浪费了多少生命？抗战期间，民族战争，打仗死人，大家没得说，死而后已。可是战争结束之后，还有那么多动乱，就太可惜了。历史决定我们今天的生活，让我们获得教训。

我现在80多岁，将来死了以后，如果有碑，上面只刻5个字：爱，怜悯，感恩——这5个字，也来自沈从文跟我说过的话。他说一个人，第一是要充满爱去对待别人。第二，摔倒了爬起来，赶快走，别心疼摔倒的那个坑。第三，永远抱住自己的业务不放。我自己的成长中，遇到多少对我好的老前辈，他们帮助我，所以要感恩。

而怜悯，是对待那些残忍的人。

现在回想一生，人应该坚韧一点儿，不要动不动就难过，动不动就痛苦。我的家乡在凤凰，我们那里人的性格就是这样，临危不惧，这是我很大的本钱。我受过虐待，受过迫害，有时候就想，哎呀，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死亡，这么多人受苦，何必呢？应该很宽大地看待这些事，像菩萨在天上一样，看芸芸众生。

思想家归来

李泽厚又回来了。

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已经旅居美国20多年。不过近年来他习惯每年回国住几个月，通常春夏之交回来，秋风渐凉时再离开——像一只反季节的候鸟，从一个冬天飞往另一个冬天。

大多数时候，他回国会住在北京翠花胡同的家中，一栋老式高层住宅，与王府井闹市只有一箭之遥，算是闹中取静的所在。李泽厚站在窗前，就能看见不远处的中国美术馆正在举办什么展览。

2014年，他选择去上海。从5月9日到5月21日，

他像一只反季节的候鸟，

从一个冬天飞往另一个冬天。

李泽厚在华东师范大学开办“伦理学研讨班”，讲了四堂公开课和一场与其他四位学者的对谈沙龙。“我已经很多年没有上课堂，为什么要讲四堂课？”李泽厚说，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杨国荣从2009年到2012年，每年都邀请他来讲课，“我都答应了。答应了四年，我就讲四次。”

上海本地媒体用“本来是上课，后来变成了文化事件”来形容李泽厚开讲的动静。从第一堂课开始，李泽厚的到场总能令全场听众起立鼓掌。上海电视台主持人李蕾跑来听课，说：“我很少出来，但他是李泽厚啊，我也是来好好学习的。”李泽厚讲课的小会议室里挤满了人，旁边还有间大教室，150多人在那里看视频直播。

华东师大党委书记童世骏教授主持了一堂课，1985年李泽厚到华东师大讲课时，童世骏还是大一新生，负责在讲堂过道里收集听众提问的纸条。

当年的盛况远非今日可比。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美学热”的兴起，李泽厚成为中国最富有创造力和大众影响力的学者，几乎“没有之一”。当时李泽厚的严肃学术著作动辄能有数十万册销量，他讲学所到之处引起的轰动效应，不亚于当下的娱乐明星。

“李泽厚还是李泽楷？”这个笑话是易中天讲的。2005年他发表《盘点李泽厚》一文，提到有的年轻学生已经分不清李泽厚和李泽楷，甚至根本没听说过前者。“80年代的大学生有谁不知道李泽厚？”易中天感叹，“其实，就连我们这些人，现在也不读李泽厚了。”

易中天说的是事实。属于思想家的年代，已然远去。

哲学是什么

2010年9月，我第一次见到李泽厚，就在他翠花胡同的家里。李泽厚不爱见陌生人，我跟随他的学生——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系赵士林教授一同登门拜访。1984年，李泽厚在社科院公开招收博士生，报考者云集。本来有两个招生名额，最后只录取了赵士林一人。“我只得了二十几分，很多人都是零分。”赵士林说，“他招的专业是中国美学史，出的题是西方哲学史，哪个老师会这样出题？”后来在李泽厚门下时间长了，赵士林才悟出老师的用意——做中国的学问，怎么能不懂西方呢？

李泽厚刚洗完澡，穿着宽大的浴袍接待我们。他通常下午会客，因为从年轻时起就有了失眠的毛病，几十年来，每晚都要依赖安眠药

入睡，要到下午才有精神。不过聊起天来，他的思维依然缜密清晰，东方西方、人文自然乃至市井百态，李泽厚对现实社会保持着一贯密切的关注。他提到中医，说曾经到同仁医院看病，一个20多岁的年轻大夫，开了一副中药就治好了他的病。“中医强调个体差异，讲究异病同治、同病异治。这里面的一些经验，现代科学还不能够解释。”

我问他知不知道当时一度爆红的“神医”张悟本——这个人就以中医食疗专家自居，鼓吹“绿豆治百病”，不过很快遭遇公众质疑。当时我所供职的《新京报》发表了一组调查报道，揭穿了张悟本的老底。“知道啊，你们不是揭发他嘛，他那个不是真正的中医。”李泽厚说，“还有方舟子打假也很有力，但是方舟子讲取缔中医，是绝对错误的。现在美国医生也在搞针灸，因为确实有效啊。我在一篇文章里讲，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就相当于西方的辩证逻辑，都是对事物的概括性认识。西体中用，因人而异。”

2014年4月，李泽厚还与北大哲学系教授干春松有一次对话，两人聊出了一个“中国式自由主义”的概念。干春松生于1965年，20世纪80年代读大学，彼时李泽厚在学界正如日中天，“少年高旷豪举之士多乐慕之，后学如狂。”干春松研究李泽厚的学术处女作《论康有为的〈大同书〉》，这篇文章发表于1955年，李泽厚将康有为看作中国自由主义的鼻祖。

半个世纪过去，李泽厚对于自由主义的看法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讲中国式的自由主义，不能严格按照西方自由主义的定义。”李泽厚说，“其实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讲妥协，讲宽容，不强调阶级斗争。”

这次到上海开讲，李泽厚是受了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的启发。桑德尔在哈佛开设公开课讨论“何为公正”，李泽厚这次和几位哲学家探讨的核心议题是“何为哲学”。童世骏、陈嘉映、杨国荣、郁振华四位哲学家谈了各自的看法，李泽厚说：“哲学是意见。不是知识，

也不是信仰。哲学只是对一些人生根本问题的意见，起的是启发作用，哲学只能起这个作用。”

时光倒退30年，哲学对于刚刚走出“文革”阴霾、打开国门的中国社会，起到的作用可要大得多。

马克思主义者

1930年6月，李泽厚出生在湖南一个邮局职员的家庭。12岁丧父，他和母亲相依为命。“我还记得12岁上初中一年级时的‘精神危机’，想到人终有一死，废书旷课数日，徘徊在学校附近的山丘上。”多年之后李泽厚回忆，可能正是少年时思考的这些“人生终极问题”，引领他走进哲学殿堂。1950年，李泽厚同时考取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两所高等学府的哲学系都向他敞开大门，李泽厚选择了北大。

在北大，李泽厚下了很多苦功。当时他体质很差，患有肺病，北大把生病的学生“隔离”在一栋楼里，两个人一间宿舍。李泽厚还嫌不够安静，在楼里逡巡，发现顶层有几间小阁楼没人住，大喜。

“我就破门而入！”80岁的李泽厚聊起学生时代这段往事，还会兴奋地做个踢腿的动作。

北大图书馆规定学生每次可借5本书，教师可借30本。李泽厚找任继愈先生要了教师借书证，每次用个大布袋，装几十本书背回小阁楼，闭门苦读。2009年任继愈先生逝世，李泽厚在美国，未及见恩师最后一面，痛惜不已。

1955年大学毕业，李泽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所（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那一年，初出茅庐的李泽厚在核心期刊上

一口气发表了3篇文章，篇篇掷地有声，震动学界。其中一篇《关于中国古代抒情诗中的人民性问题》，提出古代抒情诗“以形象反映了一定社会历史环境下的人民思想情感和它所形成的社会氛围；反映了生活的真实和历史的真理；反映了先进的社会理想和美学理想”。这其实是后来李泽厚在美学大讨论中提出的“美感的矛盾两重性”的先声。

所谓“美学大讨论”，就是自1956年开始，持续近10年的新中国第一次“美学热”。李泽厚是这场大讨论中的一员主将，他与朱光潜、蔡仪、高尔泰、叶秀山等知名学者展开论战，一战成名。李泽厚激烈批判以朱光潜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开创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脉相承的“实践美学”学派。

“我反对美在自然、与人无关的论点，也反对将美等同美感，只与人的心理活动、社会意识相关的论点。”李泽厚认为，美的根源来自人类的实践活动，他将其称为“内在自然的人化”。

以不到30岁的年纪，取得学界一派宗师的地位，李泽厚之后再无来者。如今回顾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思潮，人们不难发现其中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

“大家认为您事实上是个马克思主义者。”2014年，干春松问李泽厚，“您认同吗？”

李泽厚回答：“我认同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很多人都认为我跟邓小平是一致的，当然就认为我是马克思主义者了。”

历史的偶然

虽然成名很早，李泽厚在当年的社科院哲学所也还是小字辈，稿费拿不少，职级和薪水却不见涨。“学部里边大人物太多了。”李泽厚也因此在“反右”运动来临时逃过一劫。

“当时讲学部里有两个漏网右派，一个是我，一个是贺麟。”李泽厚去北大校园里看大字报，见自己的名字上打了黑叉，心想这回完蛋了。开批判大会时，他是最后一个离开会场的。“我以为肯定要挨批斗，结果看到散会没人理我，我就回去了。”李泽厚说，“学部里有张闻天、何其芳、侯外庐他们一大堆人。我工资很低，要批斗也轮不上我这个小不点。”

1966年“文革”开始，《红旗》杂志发文批判周扬的“十大罪状”，第10条是“提倡形象思维”。作为美学家，并且在1959年发表过《试论形象思维》一文，李泽厚这回没逃过批判，他被下放到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劳动。干校里只准读《毛选》，李泽厚在《毛选》下放了本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偷偷阅读，这开启了他学术思维的另一扇窗。

“后来毛泽东给陈毅的信讲，搞文艺的还是要有形象思维。这个话一出，大家就像得了圣旨似的，把这个案彻底翻过来。”2010年，李泽厚说，“所以80年代的‘美学热’其实早有铺垫，讨论形象思维非常重要。”

1976年唐山大地震，李泽厚这时已经回到北京，在地震棚里写出了对他的学术生涯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这本书的主要框架其实在“文革”期间就已写好，李泽厚担心被抄家，把手稿用塑料布包好放在一个盒子里，再把盒子藏在自家厨房的下水道里。

“到‘文革’结束我也没被抄过家。”李泽厚说，“不过在那个年代，只有毛泽东有思想，别人不可以有思想。我这本书写康德，实际上是通过康德表达我自己的思想。这个内涵，很多人到现在都没看出来。”

1979年，《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首印三万册，很快售罄。这一年李泽厚还有本重要著作《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出版，李泽厚分析了从太平天国运动到辛亥革命的历史，包括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梁启超等人的思想，指出“历史的必然总是通过事件和人物的偶然出现的”。

“您关于历史偶然性的说法招致很多人批评。”干春松说，“批评的理由是认为您建立在假定的基础上。”

“历史当然有很大的偶然性。”李泽厚回答干春松。关于改良与革命、偶然与必然的话题，我也问过李泽厚，他的看法颇有些令人意外，却又能自圆其说：“即使清王朝是腐朽的，一场革命爆发，把它推翻了，马上就乱。假设维持这个腐朽政权，有个牌位在，慢慢改良，可能也未必错。”李泽厚对慈禧太后的看法也与很多学者不同：“慈禧死得太早，晚死10年才好，那样不会有袁世凯作乱。要么她早死10年也好，戊戌变法就成功了。”

“可她偏偏死得不早不晚。”我说，“所以历史进程充满偶然？”

“当然，我不赞成人家讲的‘一切都是历史的必然’，没有那么多必然。”李泽厚说。

思想家淡出

赵士林说，李泽厚是“在难以出现思想家的时代出现的思想家”。这话放在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美学热”时期没错，李泽厚的出现，是中国思想界的惊喜收获。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学再度成为显学，无论思想还是行为上禁锢已久的中国人，几乎是“必然”地呼唤着李泽厚们的回归。很多学者撰写长篇大论，分析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群星

璀璨而大众亦欣然接受乃至热烈追捧精神领袖们的原因，归结起来不外乎一句话时势造英雄。

从1981年到1989年，李泽厚著名的“美学三书”相继出版——这三本书是《美的历程》（1981）、《华夏美学》（1988）和《美学四讲》（1989），李泽厚创立并逐步完善着自己宏大的哲学体系，即“人类学本体论的实践哲学”。1985年，李泽厚出版《中国古代思想史论》，提出儒家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孔子以“仁”释“礼”，强调情感和理性的和谐统一。“我的哲学将历史与心理结合起来，从马克思开始，经过康德，进入中国传统。”李泽厚总结道，“马克思、康德、中国传统在我的哲学中融成了‘三位一体’，已非常不同于原来的三者。”

这些纷繁玄妙的学术概念，给受众设置了很高的理解门槛，却被整个社会旺盛的求知欲望轻易突破。无论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还是内地的小县城甚至乡村，骤然流行起了蛤蟆镜、喇叭裤和太空步，时髦青年们提着双卡录音机招摇过市，许多垂垂老矣的学者、教授重登讲坛——美学，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不单纯是一种学术，更是一种思想解放的武器。

但是这一切在20世纪90年代戛然而止。商品经济大潮袭来，思想家自然退隐江湖。1992年，李泽厚远走美国。按他自己的总结，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学界，“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被抬上天，陈独秀、胡适、鲁迅则退居二线”。公众也不再关注最新的学术思潮，如何能多挣钱、获取更好的物质生活，才是社会多数人关心的话题。

李泽厚本人对财富看得很淡，他想不出自己有什么值得花钱的地方。“有些人穿名牌衣服，住高级旅馆，开豪华汽车，也许是需要显示自己的实力。我是做学问的人，不需要那些东西来证明自己。”近年来回国，在王府井逛街，看到商场里标价60万元一块的手表，李泽厚大吃一惊：“60万戴在手上多不舒服！”

可是聊到社会变迁，乃至中国转型方向的选择，他也认同经济发展为先。在美国这些年，李泽厚可没闲着，新书一本接一本地出：《论语今读》《世纪新梦》《乙卯五说》《人类学历史本体论》……1995年，《告别革命》出版，这是李泽厚和刘再复的对谈录，书名和内容都引发很大争议。李泽厚在书中提出，中国现代化要按顺序“四步走”：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

“我在国外遭到最多人反对的就是这个‘四步走’。”李泽厚告诉我，“很多人说必须先搞政治民主，放到20年前，连刘再复也质疑我，为什么把政治民主摆在最后。我就是觉得，首先发展经济才是正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例子摆在那里。我希望中国经济发展，促使政治体制不得不改革。中国的很多事情就是‘挤’出来的，不能‘冲’，你一冲，门就关上了。”

刘再复则说：“《告别革命》就是一本温和的书，我们主张告别斗争哲学和死亡哲学，选择和谐哲学——不是你死我活，是你活我也活。”他比李泽厚早三年去美国，现在两人都住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住所之间步行只需10分钟。

生活中，李泽厚爱好“剧烈运动”，比如骑马、冲浪和蹦极。前些年有次回国，他给学生赵汀阳打电话，说要找个地方蹦极。赵汀阳吓一跳，好说歹说劝住，“七八十岁的人了。”在美国的家里，李泽厚摆了个骷髅，提醒自己直面死亡。“今天我见到你，明天也许见不到了。”李泽厚对我说，“当年我跟太太结婚时就讲，可能我说不定哪天就死掉了。那时候开玩笑，现在死亡对我来说就是个现实问题，我时刻准备着。”

“你不怕死？”我贸然问了一句。

“我怕痛，不怕死。”李泽厚哈哈大笑，“我说过人要死的话，最好是心脏病突然爆发，没有痛苦就死掉了。但我现在是养生一族，人都

想活着，这是动物性的本能，那么就快乐地活着吧。”

他仍然喜欢思考宏大命题。过去强调“情本体”、“积淀说”，现在李泽厚认为，中国最缺乏的是理性，而非情感。“现在启蒙理性作为基础的就是自由主义这一套，但这一套是不够的。”李泽厚与自由派和新左派都有理念分歧——他强调的“西体中用”，肯定普世价值，是与自由派一致的观点。“但是我不同意自由派讲什么‘天赋人权’，他们主张现在就搞一人一票的普选，这样会天下大乱。”新左派呢？“我和新左派相同的地方在于，中国要走自己的路，现代化不是美国化。但是新左派搞文化相对主义，其实是要维护专制，这又是我反对的。”李泽厚说，“所以两派人都骂我，无所谓，我从来不讨好谁。”

“那你寂寞吗？”我问李泽厚。

他摇了摇头：“我认为这代学者里边，只有我真正抓住了中国文化的神。”

镜头里的中国故事

1976年，广州。

广播里回荡着哀乐声，人们胳膊上缠着黑纱，神色沉静，但脚下的步子明显轻快了。饭店墙壁上悬挂的毛主席像，也装进了黑色的相框。

美国《TIME》摄影记者刘香成站在街头，有些诧异地看着这一切。

就在不久前，他还在繁华的欧洲诸国穿梭。刚刚采访完法国总理，刘香成就在地铁站看到一张报纸，登出整版的毛泽东照片。

“中国出事了。”刘香成想，“我要回去。”

中国就像湖里的鸳鸯，

你看水面很平静，

可是水下面，

鸳鸯的脚在拼命划。

大事件

对刘香成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个激动人心的、很大很大的故事。

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摄影记者之一，刘香成用他手里的相机，记录过众多的“大事件”：在印度，甘地夫人遇刺，种族纷争频仍；在斯里兰卡，宗教战争火焰熊熊；在阿富汗，到处都是苏制坦克、大炮，“我差点儿被火箭筒轰掉”；而在苏联，他又亲眼见证了这个庞大国家机器的土崩瓦解。

“做新闻的人总是贪婪的，喜欢越做越大。”2008年7月11日，刘香成在北京的家中，和我喝着茶聊天。他提到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格局为之巨变。刘香成觉得，很难再找到更大的新闻故事了。“让我再去白宫，或者欧盟，都是已经做过的事情，没有任何兴趣了。”

于是他再次选择回到中国。

上次回来，他看到了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1978年，作为《TIME》首任驻京摄影记者，刘香成异常兴奋。在他的镜头中成像的，有不少大人物，比如站在主席台上的邓小平、赵紫阳、胡耀邦，比如坐在故宫广场上一脸茫然的爱新觉罗·溥杰。但更多的照片上，则是无数普通的中国人：天安门前举着可口可乐瓶子的年轻人；贴满大字报的破旧墙下，羞涩地谈情说爱的情侣；披头散发高呼“自由”的艺术家；三个穿军大衣却戴着墨镜的小青年……1983年，《毛泽东之后的中国》（China after Mao）出版，这本摄影集收录了刘香成在中国拍摄的96张照片。在他按动快门之前，西方媒体罕有对红色中国的真实描绘，以致哈佛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说过：“尼克松访华前，美国派往月球的人都比到中国的多。”

“中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故事，有无限的可能。”刘香成说，“我只能用很小很小的细节，来讲述它。”

普利策奖

“平时出门旅行，我从来不带相机。”刘香成说，“没有随便照相的习惯。”

他的四合院就在紫禁城边，北京的中轴线上。院中可闻鸟鸣，可品香茗，岁月如水流淌。

但是那些过往峥嵘从未远离，相机一旦举起，就像军人拿起枪，意味着进入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无异于战争。

1990年，刘香成被美联社派驻莫斯科。时间迅速滚动到1991年12月25日晚，克里姆林宫，总统办公室，刘香成跟着CNN董事长汤姆·约翰逊，一路混了进来，他成为全球媒体唯一入场的摄影记者。通过关卡时，克格勃特工警告刘香成，绝对不许拍照。

此时此刻，戈尔巴乔夫正在发表震惊世界的讲话。一个超级大国，即将不复存在。

刘香成在等待机会。他目测距离，悄悄调好相机的光圈、焦距。

演讲稿一共4页，戈尔巴乔夫读到了最后一页。“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说完，不知是出于愤怒还是惋惜，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把讲稿平稳地放回桌上，而是猛地一扔。

电光石火间，刘香成手中的快门“喀嚓”作响。

几乎同时，砰！克格勃的一记重拳也砸在刘香成后背。

刘香成忙不迭地向盛怒的特工解释，甚至恳求，自己没有恶意，只想赶快发稿。

克格勃终于把刘香成推了出去。克里姆林宫鲜艳的红地毯上，这个抱着相机的记者一路狂奔。

大门外，几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正在焦急等待。看到刘香成冲出来，所有人朝他比出中指。“Fuck you！”他们大骂，“这家伙拿到了独家新闻！”

第二天，全世界大报的头版头条，用的都是刘香成拍摄的这张照片——“戈尔巴乔夫扔讲稿”，一个时代结束了。

1992年，刘香成荣获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他成为获得该奖项的唯一华人。

国家肖像

茶香袅袅。

桌上，摆着刘香成刚刚出版的新书，花4年时间编成的摄影集《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刚从德国的印刷厂空运过来。

50多岁的刘香成早已不做记者。1997年10月，他出任时代华纳集团驻华首席代表。2000年9月，他加入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任常务副总裁。2008年，他的身份是CAA（Creative Artists Agency）高级顾问。

昔日的一线记者，顺利转型成为跨国媒体集团的管理者，按中国的传统说法，刘香成走着一条“荣华富贵”之路。

他心里始终放不下的，却还是记录时代的冲动。

“我可能会拍25个影响中国服装变迁的人。”刘香成说，这是洪晃的提议，“我还是很喜欢拍人像。”

因为拍人像，刘香成很早就结识了中国文化界许多杰出前辈，这些采访对象都成了他的忘年交。1981年，刘香成30岁生日那天，侯宝林送来了亲笔书法，黄永玉教刘香成吃大闸蟹、听俄罗斯民歌。还有吴祖光、黄苗子。“他们把我当小弟，今天给我上这个课，明天上那个课。”刘香成笑道，“某种意义上，他们是我打开中国大门的钥匙。”

他也不急着拍摄这些大师，而是先和他们长久地聊天，深入了解。仿佛回到他少年学艺时，在《生活》杂志做实习生，跟着摄影大师米利（Gjon Mili），几乎无所不谈。大师唯独不教他的，就是具体的摄影技术。光圈多少，快门多少，这些都不重要，“只要有思想”。

出师之后，他开始了满世界地历险，专往动荡不安的地方跑。有段短暂的美妙时光，是在阳光灿烂的南加州，每天开着敞篷跑车，带他的法国娇妻兜风。可没过多久，他又向美联社提出申请，要去新德里。“刘，你疯了？”同事们大惑不解，“全美国人都爱南加州，你为什么总要去鬼地方？”

哪有什么“鬼地方”？刘香成不能忘记的，是1969年的中国，武斗正凶，四处喊杀。那年他高中毕业去广州，只见捆绑起来的尸体，在珠江水中浮沉。后来，他去了中国香港，接着又赴美求学。本想念新闻系，被父亲劝阻：“新闻不要学的。”

刘香成的父亲刘季伯是资深报人，在香港《大公报》供职。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大公报》也不能报道阿波罗登月，因为那是“美帝国主义的胜利”。

和刘香成谈话非常愉快，当然，需要精力高度集中。他用词精准，时刻让人感觉到，这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记者。

“欲望，”刘香成斟酌了一下，选择了这个词，“什么都压不住中国人改革的欲望。”

《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封底，是刘香成拍摄的照片：一个滑旱冰的青年，双臂张开，宛若飞翔——而他身后的背景，则是一尊高大的毛泽东塑像。

那是1981年的大连，刘香成出差去大连理工学院，偶然看到了这个正在玩儿的小伙子。

“含义太丰富了。”我说，“恢复高考啦，青年自由啦——可是毛主席的影响还在。”

刘香成微笑不语。

中国的故事，还在继续。

不要低估中国改革的欲望

武云溥：我想和你探讨的主题，一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情况，二是中国媒体的发展。听起来两者有紧密的联系，而实际情况则是割裂的，传媒行业的前进速度似乎远远落后于经济改革，甚至与政治改革相比也有一定程度的延迟，你怎么看？

刘香成：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1994年我离开美联社来到中国，也是想挑战这个难题。因为对我来说，作为一个记者的挑战已经没有了，只有作为媒体管理者，还存在很多可为之事。我走遍世界各地，每次上飞机都习惯找报纸和杂志来看，但是看不到任何一份真正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文报刊。其实，世界应该听到中国的声音，眼下的中文媒体，与这个时代脱节了。

所以时代华纳找我来做事情时，我就希望能把《TIME》引进中国。直接引进有困难，但是《TIME》下面有一本小杂志叫《TIME Digital》，讲数码技术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是一本休闲杂志，中国政府是允许引进的，我们计划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合资来做。可惜，美方要求先做市场调研，而且这个调研是找香港人来做的，结果显示这本杂志如果引进中国，发行量大约能达到5万本。对于《TIME》来说，5万本的刊物为什么要做？所以这个合作就没有进行下去。现在看来，是低估了中国市场的潜力。

默多克对我说，我们做媒体，一定要去人口多的地方。他的意思就是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我帮助他拿到了电视台在广东的落地权，这就是星空卫视。大型的传媒集团肯定首选电视，但是我真正感兴趣的还是纸媒。

回到你的问题上来，其实我认为中国媒体这些年的进步还是看得见的。1998年中国洪灾，我给荷赛（世界新闻摄影比赛）的大师班讲课，就拿很多中国媒体的照片给他们看。当时可以看到的问题是，洪水本来是天灾，但是媒体普遍觉得这件事的主角是中国共产党，所以大量突出解放军扛沙包的照片。10年之后的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国媒体已经非常关注灾情本身了，这让全世界都为之震撼。我觉得中国是个在不变中蕴藏剧变的国家，做媒体一定要有耐心，对改革要有信心。

武云溥：这就引出了接下来的问题，中国媒体的改革，应该如何推进？

刘香成：就此而言，日本的媒体或许对我们有一点儿启发。我们知道日本的人口只有中国的1%，可是仅在东京就有五六份报纸的发行量超过一千万份，而这样规模的报纸在中国一份也没有。日本的媒体生存环境怎么样呢？日本政府开吹风会是不允许外国记者去的，相对来说中国政府开新闻发布会，西方记者可以进场。这说明，即使在日

本，媒体的报道空间仍然是受一定限制的。可是在这种限制下，日本依然能形成强大的媒体集团，这些集团的商业利益与国家利益并不冲突。我相信在中国，当媒体真正实现市场化的时候，也不会损害国家利益。而市场化改革，恰恰是中国媒体一直没能深入实践的领域。

武云溥：你的信心从何而来?

刘香成：当我们回顾1949年到现在，这60年中国走过的路，你就会理解中国人全心全意搞改革的决心，以及政府的务实与谨慎。这一切都是有理由的，有过太多惨痛的教训，今天的中国一定不会再回头了。只有被火烧过的人，才知道“烫”是怎么一回事。1980年邓小平在深圳搞改革试点，我是第一批到深圳的外国记者，外交部组织我们去看。我们坐的小面包车停在一片田里，放眼看去，周围一片荒凉。当时没有一个美国记者能想到，深圳会变成今天的样子，有同行就说，中国人在开玩笑。他这话就是低估了中国人改革的欲望。中国就像湖里的鸳鸯，你看水面很平静，可是水下面，鸳鸯的脚在拼命划。

武云溥：具体应该怎么着手去做呢?

刘香成：其实可以先做实验，在大的国企或者财团支持下，拿一份刊物来改。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到《时尚》，它上面的主管单位是国家旅游局，这本杂志已经给大家树起了一个市场化运作的样板。但是报纸还没有这样的先例，大家普遍觉得报纸还是应该国家管。现在北京的好几份报纸，看起来同质化非常严重，唯一有区别的就是《新京报》，在文化报道方面有自己的特色。其他几份报纸，千篇一律，都是传统的日报路线，市民新闻。

武云溥：不过就发行量而言，市民新闻还是最能吸引读者的，特别是对正处于开拓期的报纸而言。比如日本《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都是从“市井小报”起家，发展成为日发行量过千万的大报。

刘香成：可是这两份报纸现在都变得很严肃，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刚才提到，中国人口是日本的10倍，那么照理说我们没有发行量到一亿的报纸，也应该有3000万、5000万吧？如果世界上有一份报纸发行量达到3000万的话，我简直可以向毛主席保证，这份报纸一定会指引整个世界前进的方向。但是在中国，现在连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报纸都没有，占据市场的只有按地域划分的日报。上海人不会看《新京报》，北京人也不会去看《新民晚报》。

武云溥：这样的报业大平台没有搭建起来的原因是什么?

刘香成：其实空间是很大的，中国人有很深的读报传统，有这么多读者，未来的中国很可能给世界报业带出一条新路。假设现在有个大财团投给你100亿资金，明天你就会做成全国的报纸。

武云溥：你认为是钱的问题?

刘香成：表面上看当然是缺钱，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没有一个好的机制，有钱也进不来。中国并不缺乏预备投向媒体的资本，但是投资者的地位得不到合理合法的保证。做媒体单靠卖广告吃饭，是很难的。你只有去上市，吸引资本力量，才有可能做大，但是这个机制目前不存在。

武云溥：资金缺乏对媒体发展的制约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刘香成：比方说有偿新闻，怎么打击？我看到很多记者，他们没时间跟你谈问题，因为他很忙，他在忙着赶场子。一家好的报纸，要很好地鼓励有水准又努力工作的记者，不能让记者为了生活去搞乱七八糟的事。商业世界的游戏规则就是这样，某个人有很好的业绩，很好的名声，别人就会高薪请他。国外成熟媒体的作者，一个礼拜写一篇文章就行，而且可以全世界跑，和任何他想见到的人谈话，不会因为经费不够而去不成。

武云溥：其实中国的资本市场已经建设得不错了，只是传媒业还不够开放。

刘香成：对，所以我跟你说，等到未来中国有了发行量1000万的报纸，就会改变整个行业的生态环境。这是可以做到的，也应该去做试验。我曾经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安排默多克先生到中共中央党校去演讲，谈文化产业的价值。我告诉默多克，在中国的党校演讲，你不需要谈中国的事情，就谈你熟悉的西方国家。于是他就讲伦敦和纽约之所以成为出版和舆论的龙头，一来是英文语言的优势，二来就是这两个地方可以容纳有才华的人，吸引全世界的人才。他的意思就是，中国也应该变成龙头，中国文化产业的成长土壤，应该得到培育和珍惜。

来之不易的信心

武云溥：30多年前你作为最早入华的外国媒体记者，工作环境怎样?

刘香成：各方面管制很多，中国人面对外国媒体时，说话非常谨慎。我甚至会遇到危险，有一年中国女排输球，我去天安门，被激动的人们从墙上抛下来，幸亏有人保护我。有时我拍摄人群，会发现他们也拿相机拍我。

武云溥：你揣摩当时人们的心态是怎样的?

刘香成：就是里外有别。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的普遍自觉意识，认为西方媒体过来就是偷窥阴暗面的，要防备记者。我去成都、上海，几乎任何一个城市，都必须通知当地的外事办。可是今天我们看到，奥运来了，外国媒体也大量来了，到处都可以去。中国人更有

信心面对世界了，如果不是这30年改革的步步推进，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武云溥：说到北京奥运，你觉得对中国的改革进程意味着什么？

刘香成：来之不易。我们每个人都经常说，中国现在的局面来之不易，可是西方人不明白。我用照片记录了中国走过的路，编成书给你看，什么叫来之不易。经过了这么多事情，包括直面国际舆论，唯一的结果就是让中国人更有信心了。这么多困难都克服了，下一步的改革还难吗？只不过现在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这种信心不要变成过分的民族主义。

武云溥：就舆论引导和宣泄而言，你见证过西单民主墙，也看到了今天汹涌澎湃的互联网话语，两者是否有某种程度的相似？

刘香成：中国的变化始终围绕着一个根，这个根就是务实。当年的西单民主墙，是邓小平希望用一种不同的声音，冲击长期以来遗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观念。等到经济改革上了轨道，邓小平需要的就是安定团结的局面，杂音不利于发展。“黑猫白猫”的说法背后，其实是中国人的一种基本智慧，这种智慧在“文革”中被埋没了。

我们现在讨论问题，老早就超越了那个时代。西方国家一直还在猜测中国的民主、人权，其实中国人现在关心的不是这类问题，我们就是务实，埋头发展，不再讨论这个人很“左”，那个人很“右”。中国的主要精力在于研究发展模型，这时候媒体起到的作用，归根结底就是创造一个平台，让全国人民可以冷静、理性地讨论问题，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而不是一言堂。

摄影的细节力量

武云溥：即便是最早来中国记录改革开放进程的外国媒体记者，你的镜头也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瞄准中国的阴暗面去拍。在你的很多作品里，都可以看到丰富的生活细节，这种感觉非常动人。

刘香成：是的，有一年我和李肇星一起去成都，当时他还是外交部新闻司的副处长。我因为总是背着相机，后背很疼，他就带我去看中医。他说，我注意到你拍的东西了，你对中国的报道还是很全面的，从经济改革到人民生活。当年我们记者发稿都要去西单电报大楼，所有的稿件在那里都有存档，所以他看到了。

讲到观察细节，与我在《生活》杂志工作时，对新闻摄影的学习有关。我知道，无论拿起相机还是笔杆子，你都不可能一天到晚说宏观的事情。我在中国生活过，深刻理解经济条件的变化是如何体现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在街上看到戴墨镜的三个年轻人，我就会想到以前中国人穿的衣服，无论男女都是一样的。

武云溥：中国很多摄影师都是从你这里惊奇地发现，照片还可以这样拍，拍这么细微的东西。这是一种习惯，还是临时的灵活反应？

刘香成：是思想，思想决定了你怎么去拍照。不同的记者出门，就会拿回不同的东西，这个是课本上没法教的。我小时候出身不好，全班唯独我一个人没资格戴红领巾，说我是“黑五类”。等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我从海外回来，在珠江岸边，看到那些人的表情和肢体动作，我就知道，包袱已经放下了。我从记忆中寻找旧时代，跟现实对比，就能发现这是新的时代，有生活经验，然后有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才能发现细节。

武云溥：据说20世纪80年代你在中国采访，出去时会骑一辆军用挎斗摩托车？导致别人以为，你的身份很特殊。

刘香成：那是个误会。其实是武汉生产的摩托车，叫“长江750”，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军工转民用的产品。我就买了一辆，因为北京很多胡同汽车进不去，摩托车方便些。

海外看中国的视角

武云溥：成长和生活的背景，对你的影响有多大？我看过许知远写你的一篇文章，有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你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身份。很多海外华人可能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应该用什么样的视角来看待中国？

刘香成：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存在的。因为戴不上红领巾，我被儿时生活的环境所排斥，对一个10岁的小孩子来说，这种影响是很深的，可是反过来也加深了我对中国的兴趣。当年能够去中国香港的人不多，到“文革”时期，好多是逃难出去的，或者游泳出去的。对他们来说，心里想的是不要再回到这个国家了，走得越远越好，去纽约、去温哥华。但是我没有这种想法，我一定会回来。

可是当我终于回来的时候，很有意思，大家说，刘香成是美国人——他把你一下子摆到另一个框架里了。——当年钱学森回国，不也是拿着美国护照吗？可是所有人都认定他是绝对的中国人。你是钱学森，你是科学家，我们就认同；如果你是商人，或是记者，那就不一样。

武云溥：不过中国的媒体同行在提到你的时候，还是会忍不住羡慕，你有了世界级的平台。

刘香成：是的，这个评价有一定道理，但是没有看到我在这个平台背后所做的努力。你可以说，因为有美联社，因为有《TIME》，我

在中国可以做到更多的事情。但是我得到的最高荣誉，并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我自己也很陌生的地方。

武云溥：我们想知道美国媒体的真实状况，在“新闻自由”的旗号下，是否也有一定的约束?

刘香成：美国媒体可以公开自由地批评政党，但是也要服从国家利益。所谓“自由”是指，各种思想和意见都可以在媒体上表达出来，但是有所谓正统、主流的思想，也有相对边缘的思想。说到底，边缘思想是不能打败主流的，你只是可以存在。美国第三任总统、也是《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弗逊说过：“我宁要一份没有政府的报纸，也不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这个精神是写进美国宪法的。即便是一张胡说八道的报纸，也比一个乱七八糟的政府要好。所以美国媒体的“自由”从建国第一天起就有合法性，社会需要监督政府运行的媒体。当然媒体经常说错话，但是这个社会需要它，这个机制也会保留它，允许它犯错。

武云溥：所以中国要出现伟大的媒体，先要建立起法制健全的公民社会。

刘香成：公民社会的建立，更需要经济基础。我觉得西方国家跟中国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先天条件好，工业革命早你两百年。我去过印度之后，才知道中国多么穷——每个中国人听到我说这句话都会惊讶。我在印度住了4年半，觉得老天爷给印度的那块土地都比中国要好得多。我在中国旅行，经过乌鲁木齐，经过兰州，经过整片的沙漠。当年我采访艾青，他说“文革”时他被下放到沙漠里，是多么绝望。那么贫瘠的地方，什么都生长不出来。中国的贫穷，是因为土地本身就穷。世界上哪里有人见面就问“吃了没有”？当你对外国有了深刻真实的了解，再回来看中国，眼光会不同。

武云溥：明白你的意思。今天在中国从事传媒工作的也有很多海归，不过你还曾经讲过，要在中国办媒体，你一定会去找本土的人才，找真正熟悉中国的人才，这其中有矛盾吗?

刘香成：没有矛盾，两方面都是基本条件。你所说的海归，我不知道他们中有多少人是真正介入了国外媒体的日常运作，可能很多只是读过新闻学院就回来了吧。国外经验很重要，但是我说办媒体一定要本地人，是因为看到了时代华纳、新闻集团在中国的失败先例。中国有特殊的地域界限，直接拿国外那套东西来办报是不行的。但是这也不等于说，中国人不能办全国性的报纸，很多东西是共通的。

武云溥：谈到人才问题，还有个情况会困扰很多媒体管理者，比方说，我想找100个人，组建一支精锐队伍，可是找来找去只有50个人合格。好了那就先用这50个吧，结果上头只批准30个名额。

刘香成：这个情况倒是中国的独特之处。我记得苏联解体、叶利钦上台时，有一天我跑到《真理报》看他们开编委会。编委们西装笔挺地坐在一起，讨论的问题居然是，怎么把《真理报》关掉。

假设你现在要办报纸，用默多克先生的话来说，首先要找一个很好的主编，然后要给这个主编很深的口袋——有钱支持他实现自己的想法嘛。但是这个次序很重要，谁在前谁在后？很多人以为，有钱就可以办报，错了。很多人还以为，谁出钱就要听谁的，老板说话算数，又错了。投资人是支持主编的角色，不能喧宾夺主，一个好的主编，是办好一家媒体的先决条件。可是在中国，主编不听话，就不得不休息了。

武云溥：你现在会关注中国的哪些媒体?

刘香成：老实讲，每天看一份固定的报纸我做不到，只能是走到哪里就看哪里的报纸。记得当年中国对外媒的信息管理很严格，外国

记者了解中国的唯一渠道就是《人民日报》。我认识《洛杉矶时报》的一个记者，他曾经很苦恼，写什么东西都要先到新闻司申请。后来，他一天到晚研究《人民日报》社论，从每天的社论里就可以找出很多材料来写文章。直到今天，我还是很崇拜《人民日报》的社论，笔杆子那个严谨啊，一句话就够你琢磨很长时间。没想到有一天我在街上，想到报刊亭买份《人民日报》，结果被摊主骂，他说："你回单位去看吧。"

中国电视剧30年

现在人们知道郑晓龙，多半因为他是《甄嬛传》的导演。任何时候打开电视机翻几个频道，你都能很轻易找到这部讲述清廷后宫嫔妃们钩心斗角故事的电视剧。其实出自郑晓龙之手的电视剧，还有好几部引发过万人空巷的轰动效应，比如《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无悔追踪》《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金婚》……拿《渴望》来说，这部50集电视剧在1991年播出，收视率超过90%。当年北京市犯罪率骤降，据说小偷们都去看电视了。公安部专门给《渴望》剧组颁奖，表彰他们为社会治安作出的贡献。

郑晓龙，这个生于1952年的北京爷们儿，几乎一个人就能跟人掰扯清楚中国电视剧30多年的发展史。

电视台的收入平均有70%来自电视剧广告，

卖淫都赚不到这么多钱。

中国第一部室内剧

1982年底，我来到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之前，我在北大中文系读书，上大学之前，我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当了3年记者，再往前，我在黑龙江建设兵团劳动1年，在二炮部队当兵5年。当时工龄超过5年的人，可以领着工资上大学，毕业后可以回原单位，也可以另行分配。我选择回原单位，可是毕业时一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已经变成了北

京广播电视局，下属有电视台、电台和电视艺术中心。我想自己学中文的，搞电视剧创作比当记者合适。

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是中国第一家专业的影视剧制作单位。20世纪80年代电视剧产量很少，一般就是上下集，或者上中下集，还只能在晚上播，今天播了上集，下个星期才能播下集。当时“飞天奖”里有一个奖项叫“丰收奖”，奖给一年能生产12集以上电视剧的单位。现在全国一年生产14000集电视剧，当年有几百集就不错了。

我先是做编剧，王朔写了个小说《空中小姐》，我给改编成电视剧。后来为了给老舍平反，1984年国家有笔拨款给我们，拍了第一部长篇电视剧《四世同堂》，我做责编。这部剧做完后拿给电视台无偿播出，我们单位和电视台都是事业单位，拍电视是完成任务，没有赚钱的概念。

过了两年我当上主管生产的副主任，开始把电视剧推向市场。为了降低成本，我想能不能完全在室内拍一个剧？这样既省了拍外景的费用，拍摄速度又快，符合电视剧流水线生产的发展规律。那么首先要组织剧本，我找来李晓明、王朔和郑万隆，在蓟门饭店关起门来谈了三天，研究室内剧应该怎么拍，搞个什么样的故事才让观众爱看。我们四个大老爷们就想，得拍女的，女的好看。作为男人，我们爱看年轻漂亮的女的，除了年龄和长相，这个女的还得贤惠、善良，富有同情心，为人正派，反正就是把我们认为女性应该具有的美德都放在她身上，那年代审美观就是这样的。这些美德怎么表现出来呢？要让她受尽磨难，就这么设计出了《渴望》里的刘慧芳。

有了女主人公，再设计男的。宋大成是个好人形象，可是不能让刘慧芳嫁给宋大成，俩好人到一块儿有什么意思呢？还得有个坏点儿的。这个反面人物不能是工人阶级，不然审查通不过。我们几个想来想去，干脆就拿我们知识分子自己来说事儿吧，可是心里又不愿意把

我们这些北京知识分子写成坏人，就让他生在上海，于是有了上海知识分子王沪生。

就这样慢慢讨论出故事雏形，李晓明回去写大纲，他一个月写出来17万字。我们几个又在蓟门饭店开会，讨论完大纲，李晓明回去接着写剧本。后来我们几个人给自己安的头衔是“策划”，当时没有制片人、出品人之类的概念，电视剧“策划”这个词就是从这儿来的。

晓明写剧本的同时，我开始组织拍摄。在香山，我们租了部队的一个篮球馆，把窗户封死，架上大梁，吊上灯板，把它改造成摄影棚。为了这个棚，我们中心一年没拍片子，钱都砸里边了。那年我做的另外一件事，是和北京广播学院合办了一个班，把单位里没有学历的人统统送去上学，接受正规训练，冯小刚、赵宝刚他们都是这个班培训出来的。

硬件和软件都准备好，剧本也差不多了，就进棚拍摄。《渴望》花了102万元，平均一集两万块，放到现在这点儿钱根本不可能拍电视剧，算是压低成本的极限了。可是最后我只收回来59万。后来又拍《编辑部的故事》，投入150万，收回97万，赔啊。

给“出国热”降温

1986年，我第一次去香港。资本主义社会给我的印象就是灯红酒绿，物质极大丰富，人民为所欲为。

后来“出国潮”兴起，身边很多朋友出国。我媳妇出国，1991年我也出国了。美国人看见我的第一句话是：“Are you Japanese?（你是日本人吗？）”我说：“No.”他又问我是不是中国台湾人。“No.”是不是中国香港人，“No.”我说我是“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我来自中国

大陆。美国人一脸不可思议："中国人能出来旅游吗？"我心说×××，我这不是出来了吗？

时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龙新民给我推荐了一本小说，他说晓龙你看看这个，《北京人在纽约》，特别好。我一看确实不错，马上找到作者曹桂林，花了大概一万块钱买下改编权，然后我就到美国体验生活，找很多华人华侨、留学生开座谈会。在美国待了半年多，回国开始做剧本。我找来参加讨论的有冯小刚、李晓明、李功达，由李晓明执笔完成一稿，后来我又改了一稿。因为除我之外，他们都没去过美国，小说里的情节也需要改，有很多问题必须要回答。

最后电视剧拍出来，前四集和原著差不多，往后的故事就跟小说脱开了。我让姜文演的王启明和严晓频演的郭燕离婚了，小说里他俩没离婚。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重要，现实中有很多出国的夫妻，到国外就分手了，为什么呢？他们在全新的环境下，面对生活的压力，很多人不适应，我们要表现这种普遍现象。我希望这个戏能告诉观众，美国不是遍地黄金，你要受苦，要奋斗，这个过程中甚至会丢失自己很多宝贵的东西，包括家庭，包括你的人格。我见过很多留学生，到了美国就剩几十美元，甚至一分钱没有。而且你还能切身感受到那种"透明的屋顶"，就是身边无形的歧视。你可以艰苦奋斗，像王启明那样开上好车，住上大房子，可是再往上呢？真正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有几个人？

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这么苦，为什么不回来？我拍了这样一个场景：王启明他们想要回国，都走到机场了，眼看护照就要被收走了，王启明把护照一把夺回来："回去怎么说啊？"中国人是要脸的，衣锦还乡可以，狼狈回乡不成，刷盘子也要在美国熬下去。中国人都是报喜不报忧，有的人刷盘子攒下一点儿钱，回到国内也要千金散尽，表现出他在美国生活多么好。大量像王启明这样的人，在国外混得很惨，这就是真实的生活。

后来我又拍电影《刮痧》（2001年上映），也是讲中外文化差异的问题。其实外国人分为几部分，大多数外国老百姓是真不了解中国；有一部分人了解一些，但是不深入；还有一部分是真的了解，但是装作不了解。比如说对孙悟空的认识，《刮痧》里的美国律师就说孙悟空是造反派，打砸抢，这只猴子还被中国人奉为英雄，以此证明移民美国的许大同（梁家辉饰）有暴力倾向。以前远隔千山万水，大家相安无事，当地球变成一个村的时候，文化冲突就凸显出来了。小则人与人的误会，大则国与国的误会；小则大家吵吵架，大则可能发生战争。

《北京人在纽约》投资150万美元，最后我们一共收回来70万人民币，这70万人民币怎么来的？央视当时给我们5分钟贴片广告，按当时的刊例价，我把这5分钟的广告全部拉满才挣到70万。本来20集的片子，最后变成21集，就是因为本来每集50分钟的内容变成45分钟了。前边除了我这5分钟广告，央视自己还加了更多的广告，首轮播映给他们带来的收入就有4000万元。

小垄断抗不过大垄断

中国的电视剧发展30年，到现在还是小作坊式生产，始终没有实现工厂化，而工厂化是国际通行的做法。比如写剧本，就应该有专门想创意的，专门写大纲的，专门写人物的，专门填台词的，甚至专门加笑料的和专门政策把关的，每一个工种都应该挣到足够的报酬。而我们现在从头到尾就是一个编剧，三五个人就能攒出一部电视剧，还都嫌挣钱少，因为没有钱嘛。电视剧拍一部赔一部，拍两部赔一双，偶尔有个赚钱的，也只够维持简单再生产，根本不能形成规模化大生产。影视剧生产是高风险行业，但是高风险应该有高回报。

钱被谁赚走了？现在电视台的收入平均有70%来自电视剧广告，小电视台可能占到80%以上，像央视这样大的电视台也差不多有50%。可是电视台用来收购电视剧的钱，连他们广告收入的5%都不到。中央电视台就公开讲他们是微利标准，所谓“微利”是他拿大利，你拿微利，你花60万拍一集片子，完了他给你65万。

电视台是垄断渠道，压低价格我们也没办法。1995年我和28家省级电视台签约，买断晚间黄金档的一个小时，叫作“长青藤剧场”。这一个小时里，我提供节目，电视台播出，每集给我两分钟广告时间，我用这两分钟去广告公司拉钱。这样的模式是用“小垄断”对抗“大垄断”，做了一年，播出314集电视剧，赚了1000多万。《无悔追踪》就是长青藤剧场在全国播出的，只有北京没播。当时有人写匿名信到北京台，说这部电视剧“刻意美化国民党特务”，意思是政治导向不正确嘛，北京台怎么能播呢。

可是一年之后我发现，我的产品跟不上了，这300多集电视剧是我好几年积累下来的，不可能第二年再做保质保量的300多集给人家播。播出过程中也经常出问题，电视台会故意漏播广告，或者换他们自己的广告，因为他们也不高兴看到我垄断。于是“长青藤剧场”运行一年就停播了，我还是小垄断抗不过大垄断。

只有竞争才能打破垄断，光有人呼吁没用。以前北京有北京台和北京有线台共存，就存在竞争，那段时间电视剧价格突飞猛进。今天之所以有些电视剧还能赚钱，就是当时奠定的基础。竞争也能使电视台做大做强，湖南台这几年发展很快，假如有两个湖南台，发展会更快。有一年各省的电视台领导一起开会，上海台领导发言说我们发展很快，盖了广播大楼，盖了电视大厦，还参股了大桥和高速公路的建设。他说完之后我发言，我说我听了上海的发言之后，既为他们高兴，又为他们忧虑。如果作为一个房地产公司，这样做确实不错，然

而比起北京城建公司还是差太远。电视台应该干什么？我们的内容产业始终得不到发展，我们的大楼却得到很多发展，凭什么啊？

好在近年来国家开始逐步重视内容产业发展了，中国是世界工厂，什么物质产品都能出口，为什么文化产品不能出口？即便从文化安全的战略角度来说，也应该扶持内容制作。

白给的不是好东西

1991年，我在美国创办了华艺影视录像节目有限公司，在北美地区发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电视剧，同时代理中央电视台在北美地区的录像节目发行，这是中国在海外开辟的第一个电视节目发行阵地。因为国内市场就这么大，我想外国人可能更尊重版权，能带来更好的收益。正好遇到纽约来的几个人，我就跟他们谈，是不是可以共同成立一个公司。

去美国前，我也不知道中国电视节目到底能卖到什么价钱。当时还有“外宣”的概念，我们国家的外宣基本就是一个字：送。有时候还倒贴钱给人家，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白给的东西，人家往往不觉得好，还会怀疑你的意图。反而付费的东西更容易让外国人接受，我成立这个公司就是想卖节目到美国去。公司做了五六年，每年能卖10万美金。

后来我发现，真正要打开美国市场是很困难的。美国人见到我们的片子，基本上会说“interesting”（有趣）。他先告诉你很有意思，完了以后就没下文了。逼急了他会说哦，你们的品质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中国电视剧只能卖到海外的华人地区，从来没有进入过人家的主流频道、黄金时间。全美广播电视网没有播过哪怕一部中国电视剧，我们的主流频道、黄金时间倒是播过不少外国电视剧。

外国都是谁会看中国电视剧？大部分是华人，也有一些意识形态和我们比较接近的国家，比如《渴望》在越南也很火，越南政治局开会时都要停下来看《渴望》。在美国，我们的片子只能卖给华人电视台，价格是每分钟2~3美元，一集也就100多美元。美国华人台的概念和我们想象的还不一样，只是在几百个频道里边，华人社区会租用其中两三个小时的时段，用来播中文的新闻和其他节目，养活他们自己都困难。

相比之下，美国主流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一集的制作成本能达到200万美元，美国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购买美剧《急诊室的故事》，价格是每集1400万美元。话又说回来，我们买美国的电视剧，一集也就给他们几千美元。

片子卖不动，一方面是我们的制作质量确实差太远，人家都是拿胶片拍电视剧，摄影棚里搭出一条街来。我们是满大街可见摄制组，以至于形容有些热门景区“大水冲过，蝗虫飞过，摄制组来过”。高希希导演拍《甜蜜蜜》有很多穿帮镜头，问题是那点儿制作经费让高希希能怎么拍？这都是没办法的事。

另一方面，也有意识形态原因。其实美国片子也不是纯娱乐化的，里面处处体现的“美国精神”，带有很强的宣教作用。我们如果拍弘扬自己民族精神的，但不是干巴巴弘扬的，拍好了照样有人看。比如《金婚》，播出当年国内收视率第一，也很主旋律啊，没有说为了收视率非得拍三级片吧。

中国电视剧30年，如果一年选出一部最火的片子，30部里边我们制作的能占5部：《四世同堂》《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金婚》。除了这5部，还有一批有重大影响的片子：《凯旋在子夜》《便衣警察》《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一年又一年》……全都是现实主义题材，全都创造了极高的收视率。《便衣警察》还开创了警匪片的潮流，海岩当时写完这本小说，我老婆是责任编辑，就

推荐给我拍成电视剧。连“贺岁片”也是我发明的概念：1994年我回国，发现一到春节，就没我们电视剧制作单位的事儿了，各电视台成天播的都是文艺晚会。我就想专门为春节拍个片子，于是有了第一部贺岁片《万事如意》，冯小刚编剧，赵宝刚导演。后来冯小刚搞了个电影《甲方乙方》，把这个概念拿过去，现在一说贺岁片就想起冯小刚，其实第一部在我这儿呢。《万事如意》三集片子制作费一共花了40万，最后一集卖90万回来。各大电视台都抢，为过节增添喜庆气氛。咱们国家从此有了春节专门播的电视剧，是我郑晓龙的脑袋想出来的。

拍电影像一场屠杀

如果有一部影片叫作《陆川！陆川！》，讲述导演陆川自己创业的故事，那么2009年的春天应该播映到高潮华章：4月22日，陆川作品《南京！南京！》全国公映。陆川正在积极争取，让这部讲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电影，去日本放映。

我们按动快退键，影片倒带，宛如时光倒流。4月18日深夜，陆川在上海开往南京的车上，睡不着觉。他掏出手机，写了一条长长的短信："巡回已走3站，效果惊人。可以说现在是城城爆热，场场爆满！北京点映5场变成点映10场，全部满票。杭州，大会堂2000人，进来了两千三四百人，观众群情激动，高喊：感谢你们拍出这样的好电影！大学生高喊：中国要自强！上海四家影院票全部销售一空，全部自发买票，大光明1300人场竟然全部售空，创历史之最……更为感人的是，剧组所到之处，陷入观众热情的海洋，不在现场您很难想象，中国观众表现出的素质让剧组感到叹服和激动。"

陆川和覃宏吃过饭，

在街上溜达半天，

这才得到通知，

可以进"海"里了。

短信写好，陆川在末尾加上一句："这是记者陆小川从前方向你们发回的报道。"

然后，他把这条短信发给了三个人：覃宏、韩三平、张宏森。

赌局

星美传媒集团董事长覃宏是加入陆川赌局的第一个资本玩家。

覃宏下注之前，庄家陆川已经拿着借来的钱开局了。2006年10月，北京东南三环，龙头公寓，陆川把《南京！南京！》剧组安置在一个仓库般简陋而巨大的室内篮球馆里。制片主任邢松说："老陆当时很穷，他干这行的年头挺长了，又是编剧，又自己导戏，还拍广告什么的，按说应该早就有房有车吧。结果一看，他就自己买辆车，房子没有，基本就是穷困潦倒、寄人篱下。"2006年9月19日，陆川突然召集拍摄《可可西里》时的主创班底曹郁、邢松等人开会。陆川说，我找朋友借了100万，准备拍南京大屠杀——不是投资，我给人打的欠条，这事不成的话，100万我要还给人家的。邢松一听就"惊着了"，他记得陆川对大伙说："这100万就是我的决心。"

可是在覃宏看来，陆川的想法有点儿冒失。"他很多事情都不按常理出牌，通常我们要投资一部电影，应该先看到立项、剧本、预算，包括演员阵容，等等，投资方确定之后，你才能去建组。可是陆川整个反着来：先建了组，再找投资方，再去立项——我觉得他当时想问题还是简单了。"

促使覃宏下决心投资《南京！南京！》的，是陆川写的长达14万字的剧本。"电影剧本一般都很短，五六万字，很少有上10万字的。"覃宏看过许多剧本，只有《南京！南京！》是一口气看完，马上拍板。

其实陆川知道潜藏的风险："立项是个致命的问题。我都不敢跟剧组的人说实话。"陆川心中忐忑，却还在咬牙做出信心满满的样子，指挥剧组有条不紊地筹备拍摄。"问我有钱吗，我说有钱。问我能拍吗，

我说能拍。”陆川回忆，“可是人家一打听，电影局都没通过呢，能拍什么啊。那就是一大地下电影。”

邢松说自己动摇过，还给陆川写了辞职信。覃宏经常和陆川喝到宿醉，醉后称兄道弟，互相鼓励。覃宏说，我存折上还有一些钱，全打到剧组账上，咱们扛到这些钱没了，就散伙。陆川感动不已，在剧组办公室墙上贴了两个大字：死磕。

中南海

死磕5个月，事情终于有了转机。

“那天晚上，我这辈子第一次进了中南海。”陆川记得，进去时已经是夜里零点之后，陆川和覃宏吃过饭，在街上溜达半天，又去喝了茶，这才得到通知，可以进“海”里了。“好像搞什么秘密活动似的。”

陆川见到了一位首长。首长问，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陆川用了一套“强大且正确”的说辞来解释自己的意图。

“我说中日关系问题，官方要有声音，民间也要有声音。如果只有官方声音，是不够弹性的，对政府来说，有时会需要民间的声音。但是民间的声音不可能在需要时立刻造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应该着手准备。”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陆川，深谙外交逻辑。

此后一路绿灯。执行导演赵一穗记得，2007年3月的一天，他刚走到剧组门口，陆川开着车过来，冲他喊：“上车。”

“结果给我拉到一超市。陆川说，你去买两瓶香槟。”赵一穗疑惑：“我说买香槟干吗？”他反问：“你说呢？”

“立项下来了？”

陆川点头，微笑，不语。

2007年6月，长春市农安县龙王乡郊外，一片600余亩的土地上，开来了几台铲车。电影《南京！南京！》外景地选址在此，陆川要耗资千万搭建一座“1937年的南京城”。

“放在我案头上有4个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剧本，4个不同的导演。其中一个是德国的，一个是美国的，一个是中国香港的，还有一个是中国内地的。”2007年7月13日，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说，“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经过反复推敲，最终决定，在现有的关于南京事件的故事片中，我们确定只拍一部《南京！南京！》，导演是陆川。”

台下的剧组成员们热烈鼓掌。

2007年10月7日，《南京！南京！》在天津开机。

梦魇

长春外景地，是陆川的梦魇。

事实上，《南京！南京！》开机伊始就麻烦不断。2007年10月17日，开机仅10天，网络上就出现了《南京！南京！》剧本。陆川怒不可遏：“我很想撕开那些黑布，想跟这些在幕后鼓捣事情的人面对面。”

更大的打击却还在后面。剧本泄密第二天，陆川接到消息，由于投资方资金不能及时到位，剧组在长春正在搭建的外景地将全面停工。

“施工方一直在垫资施工，我们这边就是派制片一直在安抚他们。”陆川说，“但是没有办法，人到最后还是要认钱。”

那天陆川急得直掉头发。

等到下午3点，总算解了燃眉之急。“上海一个非常好的朋友，雪中送炭，给我打过来480万，这才把工程款交上了。”

可是资金问题始终困扰着陆川。他不仅是导演，还同时担任执行制片，每天在片场讲艺术，手机一响，就要跟老板们谈钱。剧组人员形容陆川能同时做8件事，即便如此，这种分裂生活还是让陆川抓狂。“我们有两个投资方在2007年冬天时，自己的企业遇到问题，资金确实紧张，所以我们这边常常无以为继。”陆川说。拖欠工程款成了常事，由开始时每月一付，到每周一付，再后来变成每天结算。“不结的话，就每天从工地上跑工人。”

任杰是制片主任，证实了这个说法：“本来1000多人施工，后来变成500人施工，又变成100人、50人施工，最后就十几个人，成了看工地的了——没人了。”

这时的长春，气温降到零下27度，必须用热水和水泥。水泥一抹上墙，立刻冻住。

任杰从工地回来，对陆川说：“誓死捍卫《南京！南京！》。”

“但我也说句心里话，”任杰说，“我不知道永远有多远。”

内鬼

陆川所遭遇的，既有外患，亦有内忧。

一个路灯3500元，一座铜像5万元，砖瓦、服装、餐费、交通……陆川捏着报账单暴跳如雷："我们是拍电影，不是搞基建！1937年南京晚上能亮路灯吗！"花钱如流水，是拍电影的常态，可这个流水的速度太快了。"关键是没有人想把水龙头拧紧，都是想把水龙头给拧大。他不管这蓄水池里头有多少水，恨不能把池子也给砸了。"当陆川发现已经砸进去2800万元人民币，长春外景地还是不能如期进驻时，他必须采取行动了。

"我知道这里边有问题，我们队伍里边有些人已经被收买了。"

一天，剧组正在拍摄大群难民聚集在教堂里的戏，按照计划，应该有1000名群众演员在场。突然，教堂四门紧闭，陆川下令：查！工作人员挨个儿清点人数，结果发现，实到不足800人。

在陆川的账上，每个群众演员一天的酬劳是35~45元，那么，这一天少来的200多人，就意味着近万元片酬支出不翼而飞。还有200人的盒饭，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这只是普通拍摄一天的猫腻。后来陆川还查明，群众演员实际拿到手的酬劳，只有剧组计划支出的一半不到。

"有个群众演员跟我讲，说他一天只能拿到十几块钱，还得自己负担交通费。"陆川悲哀地说，"人家给你站一天，让哭就哭，让笑就笑，让到泥水里打滚就打滚——最后挣十几块钱，疯了？"

陆川果断地开除了几个"有问题"的剧组成员，并且宣布，今后每一笔开支，无论大小，必须经过导演本人签字。

“我轻易不会去主动伤害别人。但是，我是一个有大目标的人，我不允许任何人和事，阻挡我完成这部电影。”

2008年1月29日，一家投资方资金链断裂，剧组停机。2月28日，天津，二次开机。陆川点燃三支香，举至额头，鞠躬拜神。

突围

《南京！南京！》艰难的拍摄期间，陆川反复看一本红色封皮的书《毛泽东传》。“我特别喜欢看讲他长征的这一段。因为我真觉得，戏拍到那个份儿上，特别像一次长征。”陆川说，“我不仅要带着队伍走出草地，还要为他们找到一个归宿。”

最坏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2008年6月10日，剧组拍摄日军轰炸光华门的戏，对景区的城门有所损坏。按照陆川的描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景区施工方以剧组毁坏金属脚手架为由，索赔8万元。双方协商不成。6月13日，施工方扣押了剧组的5辆坦克、1辆集装箱车、1辆越野车，价值约600万元。

“最危急时，我们5个人被近20个手持棍棒、砖头的人包围。”陆川在博客里写道，“昨晚某些瞬间，我觉得很像一部劣质纪实风格警匪电视剧：手电筒晃动的光束，奔跑着的打手，手持砖块的面目不清的人们，雨中沉默的警察们……车灯光束中细细的雨丝，阴影里的交易，斡旋和撕扯……”

6月21日深夜，被困8天后，陆川在当地公安民警协助下获救。

此前的6月15日，《南京！南京！》已宣布杀青。

陆川的电影公映，似乎可以象征他的队伍经历坎坷长征，终于突围而出。而一幕幕场景仍在回放：2003年11月，《可可西里》杀青，陆川和摄影师曹郁乘坐一辆越野车，穿行在青海边境的群山中。陆川说："嘿，我想拍南京大屠杀。"曹郁说："太夸张了，你还是先把现在这个戏拍好吧。"于是陆川的越野车变成了一辆自行车，他和姜文骑着车走在贵州青岩古镇的土路上，尘埃飞扬。那是一起拍《寻枪》时，姜文说："记住，陆川，一个男人不为自己的错误辩解。"可陆川早就是条汉子了，1989年，他考进南京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当了7年兵，毕业后又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陆川的硕士毕业论文是《科波拉：体制中的作者》，他想成为科波拉那样的导演，不边缘，也不妥协，在艺术和商业上都获得成功——是的，这两者并不冲突。关键是，他热爱电影。甚至在小时候，他就曾梦到自己在一部电影里——陆川在日记里写：

> 电影的开始，我站在一片草场上，草场长如巨兽毛发的长草中，长着无数的白色蘑菇。当我走近的时候，我发现那些白色蘑菇不过是一颗颗白色的羊头，它们被砍下来，丢在草丛里，眼睛圆睁着，看着天空。我出场了，我的手中拿着通红的铁条，我把铁条伸向羊的眼睛。羊眼睛发出一阵淡淡的蓝烟，随后羊眼睛瘪下去，不再明亮，暗淡无光。那时的我浑身上下都绑着皮带，把能捡到的棍子都插在身上。妈妈说这昭示着我未来的命运：从军。

中关村风云

1991年2月5日，北京，中关村。

北四环边上的一座旧仓库要拆除了，纪世瀛跑去拍照留念。这座小库房在中科院物理所旁边，核聚变实验楼的东北角，低矮破旧。这里十多年前堆满废旧材料，蛛网层层；十多年后平地起高楼，车水马龙——无论站在哪个时间节点上，都不会有人注意到此地，想起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

除了纪世瀛和他的伙伴们。

“搞改革不容易，历来没有好下场。”2008年4月23日，春光明媚。昌平区的一家五星级酒店里，纪世瀛喝完咖啡，叹口气：“我能活到今天，非常幸运。”

中关村太像硅谷了，

我们手里掌握着高科技，

大墙外面却几乎是刀耕火种。

中关村三结义

1980年的中关村88号楼，是中科院的集体宿舍，陈景润、张广厚、杨乐等大名鼎鼎的科学家都住在这座楼里。纪世瀛住在103室，那年他38岁，是中科院很年轻的工程师。“我出身农村，后来考进中国科

技大学近代物理系原子核工程专业，毕业后到部队接受再教育，因为反对林彪被打成反革命。”在农村当了三年反革命，林彪倒台，纪世瀛得以进城，分配到中科院物理所，从事核聚变工程研究。能进入中国最高科学殿堂工作，他很自豪。

可是这年秋天，纪世瀛却约了两个人到家中密谈——陈春先，物理所一室主任，有机半导体和原子能受控热核聚变专家；崔文栋，物理所高压电气技师。“陈春先搞理论，崔文栋搞技术，我搞总体工程设计，这就算桃园三结义了。”纪世瀛说，三人关起门来偷偷打的主意，就是“走出去自己干”。

事情的起因，或者说灵光乍现的时刻，是1978年和1980年陈春先的两次美国之行。在这个被视为“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陈春先看到了“硅谷”和“128号公路”，见到了那些走出大学创办企业的教授，听说了惠普和苹果这样的世界级大公司在车库里诞生的故事，他深受震撼。

此时在国内的纪世瀛，也常为体制的束缚而苦恼：“一切科研工作都严格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科学院的申报审批制度也非常复杂，在单位里想自己搞点儿什么是不可能的。”虽然待遇不错，生活安稳，可总有一股闷气让他沉不下心来。更重要的是，核聚变这样的长期工程，天知道什么时候成功。“我已经38岁了，还没有真正的建树，虽说在攀登科学高峰，但是永远看不到顶端。”

陈春先回国后，把在美国的见闻说给两个伙伴听，他们都激动不已。“中关村这个地方太像硅谷了，我们手里掌握着高科技，大墙外面却几乎是刀耕火种。”纪世瀛想，能不能仿效硅谷的做法，跳出大墙去，把技术变成产品，为国家兴旺做点儿实事？

三人一拍即合，立刻着手网罗人才。中科院里有不少像他们一样不安分的科学家，可大多郁闷在心里，不敢轻易付诸行动。他们只找

到7个胆大的同志：曹永仙（力学所工程师）、陈首燊（电工所研究员）、吴德顺（电子所工程师）、罗承沐（清华讲师）、刘春城（物理所技师）、潘英（物理所会计）、汪诗金（北京等离子体协会秘书长）。10个人聚在一起，决定押上自己的饭碗，豁出去赌一把。

1980年10月23日下午，陈春先在北京市科协的会议上宣布要成立一个“服务部”。隔天的25日是周六，纪世瀛叫来几个人，把一间几乎没人去的库房打扫了一下，杂物堆了半间，腾出半间用作今后的办公室。当晚，10个人在仓库里开会，正式宣布“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成立。

今天的史家将其定性为“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写进了《中关村科技园区志》。而在当时，这个“服务部”没有营业执照，没有法人代表，成立时也没有留下任何文件和照片，除了几个久居书斋的知识分子，几乎一无所有。纪世瀛现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感慨道：“这既是一个革命行动，又是很唐突的冒险。”

知识分子赚外快

时间就这样开始了。

“我去工商局要办执照，人家都不给办，说你一个科研单位，要执照干什么？”纪世瀛笑道。“揭竿而起”后的最初两个月，他作为服务部管理小组的常务副组长，为办理各种手续满城奔走。单是银行开个账号，就几经周折：当时只有正式的国家单位和企业才能开账号，个体户只能以个人名义办存折。纪世瀛找到工商银行东升分理处，一位姓包的小伙子接待了他。“小包说，你们这几个人凑起来就想开账号？我就给他大讲我们的宏伟蓝图，告诉他美国如何如何，我们这样做的意义有多么重大。”纪世瀛说。

听完一番侃，小包表示同情：“那你拿什么开账号啊？”纪世瀛掏出大伙儿七拼八凑的500块钱，说这不是有钱嘛。小包说不行，你们科学家就是不了解社会，开账号不能使现金，得有支票。纪世瀛就去找服务部挂靠的北京市科协，软磨硬泡，好容易借来了一张500元的支票，才把账号开出来。“科协领导也说没见过这种事，怎么能随便拿钱换支票呢？”

有了独立账号收钱，“生意”也滚滚而来。“社会上有很多项目，需要高精尖技术，比如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需要高压火花开关，只有我们能做。”纪世瀛说，“而像中科院这样的大单位又不愿意承接小项目，研究原子弹的人谁会给你做这个小玩意儿？”这正是纪世瀛们瞄准的市场空白，他们陆续承接了长脉冲电源、激光仪器、海淀锅炉厂技术改造工程等项目，还协助海淀区劳动服务公司建立了四个集体企业，做得风生水起。“我们这支‘科技游击队’成长也很快，集中了上百名不甘寂寞的高级知识分子。”

不要国家编制，不要国家投资，自筹资金，自负盈亏，自担风险——服务部建立的这套新体制后来被简称为“两不三自”。吸引众多身怀绝技的专家放下“铁饭碗”、跟着纪世瀛他们瞎折腾的重要原因，还在于服务部建立的一套分配制度：每人每月发7~15元津贴，科技人员讲课每小时酬劳6元，每月收入最多不得超过30元。

这些钱意味着什么？作家凌志军在《中国的新革命》一书中记载，当时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线是每月8元，初级工人月工资18元，本科毕业生可以拿到56元，中科院有20年以上工龄的研究人员最高能获得月薪105元。“陈春先一分钱不拿，我每月拿7块钱，还是被迫带的头。”纪世瀛说，“我要是不拿钱，别人就更不敢拿。”参加服务部工作的科技人员都有自己的单位，在本职工作之余还能多赚些钱，积极性立刻被调动。“很多人平时上班没精打采，一来我们这里就精神抖擞。”一时间，北京的科研单位活跃起来了，知识分子们奔走相告，不

仅中科院人心浮动，许多其他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里的专家们，也纷纷投奔入伙。

试水者的三宗罪

“这一火就出问题了。”纪世瀛说，服务部的活动很快引起了中科院有关领导的注意，并遭到强力打压。

1981年5月，中科院物理所所长管惟炎找陈春先谈话，说服务部是“科技二道贩子”，搞歪门邪道，不务正业。纪世瀛记得管惟炎后来提出了服务部的三大罪状：扰乱科学思想，打乱科研秩序，腐蚀科技队伍。“我设身处地为领导想想，着实有这三条，说得不为过。”纪世瀛说，“但恰恰要看，我们打乱的这个秩序好不好？这队伍应该是什么样？”

点名批评、开会批判，矛盾不断升级，终于闹到查账封门——管惟炎恼火的，不仅是这个服务部搞得人心惶惶，他还怀疑，陈春先身为物理所一室主任，会不会拿着所里的科研经费，到外面中饱私囊？管惟炎查到，陈春先名下至少有两笔支出去向可疑，合计17万元。

“这里有一笔钱是拨给合肥等离子体所，10万元。还有一笔调到电子部四所，7万元。”纪世瀛解释，钱是划到合作单位去了，作为领导，管惟炎产生怀疑也是应该的，但后来的调查认为，不存在挪用科研经费的问题。这件公案的最后结论发表在1983年1月31日《经济日报》上，记者李洪波、张枕丹找到中科院合肥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丘励俭做证，证明这17万元“完全正常”。

然而科学院的财务调查已经使服务部陷于瘫痪。“物理所派来副所长和会计查账，这一下子就炸窝了。”纪世瀛说，很多拿了钱的人纷纷

把钱退回来，上百人的技术团队顷刻间分崩离析。1982年底，山穷水尽，“最后又是只剩我们三个人了。”陈春先、纪世瀛、崔文栋一筹莫展。

“到这时封门，两年多时间，我们做了20多个项目。”纪世瀛总结，“有几千块钱的，也有几万块钱的，合同额加起来共有十几万元。”但是这些钱也包括了购买元器件的成本，最后纯利润有多少，纪世瀛说他也算不清楚，“没有利润观念，总而言之没有亏钱。”

总书记的批示

转机在1983年初到来。

1月25日早晨，物理所大院突然一片喧哗。纪世瀛被“咣咣”的砸门声惊醒：“我以为又出什么事了，就听外头喊：快，快出来，快听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你们大方向正确！”

“那是《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里播的，说知识分子搞技术扩散，大方向正确，应予支持。”纪世瀛简直不敢相信这天降的喜讯，他本来已经做好了回农村倒卖大葱的打算。这并不是最坏的考虑，倘若关于挪用巨额科研经费的指控坐实，陈春先和纪世瀛等人都可能锒铛入狱。

狂喜的纪世瀛马上奔出去，在路上碰见了同样激动万分的陈春先和崔文栋。“我们三个都互相问，是不是你干的？到底是谁干的？”

他们不知道，逆转形势的大手，竟然来自中南海。凌志军在《中国的新革命》里记述了此事幕后的经过：一直支持服务部发展的北京市科协副主席赵绮秋，把纪世瀛等人的遭遇告诉了她的丈夫周鸿书。

周鸿书时任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他指派记者潘善棠前往中关村调查此事。潘善棠写了一篇内参直达中央，内参中表扬陈春先学习美国硅谷的经验，一个“新技术扩散区”正在中关村出现，而物理所个别领导人进行阻挠，严重影响了他们继续试验的积极性。

高层的反应十分迅速。《中关村科技园区志》记载，1983年1月7日，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批示：“陈春先的做法完全对头的，应予鼓励。”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批示：“陈春先同志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子……一些确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可以先富起来，打破铁饭碗、大锅饭。”同一天，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示：“可请科技领导小组研究出方针政策来。”

后来，纪世瀛在科协的办公室里看到层层转发下来的文件时，感觉胆子立刻壮了：“总书记都批示了，这可牛得很。”

看到中央批示后，管惟炎从此默不作声。纪世瀛说：“最后他的态度是这样的：你给我滚出物理所。”1983年4月15日，纪世瀛记得很清楚，他最后一次走出中科院物理所的大门，有一种终于解放的感觉。此后不久，管惟炎离开中关村，赴合肥出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1989年被免职，2003年死于交通事故。

被改革低潮扼杀

“从此我们东山再起。”渡过难关的纪世瀛意气风发，“我们服务部和北京市科协、海淀区科委、海淀区工业公司联合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一个新的企业。”这个想法得到了海淀区委书记贾春旺的支持，于是有了“北京市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简称“华夏所”，陈春先任所长，纪世瀛、崔文栋任副所长。纪世瀛说这是“从游击队发展成正规军了”。

1983年至1984年，华夏所完成了15项国家计划外的技术项目开发，初步形成了“技工贸一体化”的雏形。目睹华夏所的蓬勃生机，有更多的人按捺不住心痒，下海弄潮。陈庆振创办“科海”，王洪德创办“京海”，万润南创办“四通”，金燕静创办“信通”——这就是日后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明星企业“两通两海”。中关村作为改革开放在科学技术领域的试验田，逐渐声名大噪，响彻全国。

“华夏所发展很快，没想到死得也很快。”纪世瀛叹道，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扼杀”了华夏所。

1984年，华夏所与中科院北京器材供应站签订了一个总额320万元的合同，内容是由华夏所在130天内向对方交付100套微机。当时的中国，微机还是稀罕事物，只有电子部六所有开发能力，且不能投入批量生产。当华夏所拿到从广州海关进口并空运至北京的66套计算机零件时，合同约定时间只剩下不足一个月了。

“我们日夜加班赶工，终于按时完成了任务。”纪世瀛说，“可是供应站却不要这批货了。”

按照纪世瀛的说法，在华夏所全体动员，抓紧组装微机的过程中，科学院方面认为，完成这项任务的人大多来自科学院内部，既然这样的话，无论技术还是渠道，都相当于已经被自己掌握。“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科学院是老大哥，说不要就不要了。”纪世瀛说，“我们可是贷款搞的啊，这一下就坑死了。”

华夏所愤而诉诸法律，要求中科院北京器材供应站履行合同。1985年8月28日工商局仲裁委员会下达裁定，1986年10月2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都是华夏所胜诉。供应站不服判决，上诉至高法，高法又打回中院再审。1989年9月6日，中院二审判决仍然是华夏所胜诉。陈春先和纪世瀛等人很高兴，满怀希望地盼着收回货款。没想到1990年11月1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改判，华夏所败诉。

“理由是超范围经营，说我们没有计算机经营范围。”纪世瀛说，“我们被改革低潮扼杀了。最后华夏所被查抄，连一张纸都没有剩下。”

创业者的命运拐点

华夏所被查抄后，陈春先、纪世瀛、崔文栋三人各自为战。他们的人生，从此拐向不同的方向。

纪世瀛借了5万块钱，带着华夏所原班人马，成立了北京市理化应用技术研究所。“这是华夏所延续到今天的唯一一支。”机缘巧合，纪世瀛的新企业成功进入军工行业，有9项产品作为高技术装备列入军备。“我们是空军在北京的重点军事科研协作单位里，唯一的一家民办研究所。”纪世瀛说，“这要感谢朱镕基。”

纪世瀛介绍说，他们研制的黑匣子破译技术，起初没人敢用，中国台湾当局得知了这项技术，要花500万美元买断。“我们研究决定，宁可闲置不用，也不能卖。”这时朱镕基得知了情况，马上作出批示。“说有困难，请帮助一下，军队也可以考虑。”纪世瀛说。

而纪世瀛本人则不再从事具体管理，转向为企业家服务——他连续3届、担任了14年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会长，中关村里的大小企业，有了麻烦都来找他解决。“谁被掐电了、封门了、停水了、拘留了、判刑了……我就到处捞人去。”纪世瀛笑说，“相对于背景深厚的国企，民营企业没有爹娘，就这么一个组织，我不管谁管？”

这不是一份简单的差事。1996年12月24日凌晨，匪徒入室抢劫，纪世瀛身中27刀，险些丧命。“肺都扎透了，4个大夫给我做了3个多小

时手术缝合。”纪世瀛说，“可能砍我的人觉得，我是中关村老板们的老板，应该更有钱。”

相对于另外两个伙伴，纪世瀛的确算是“有钱”了——2004年8月10日，陈春先病逝，死时两袖清风。“1980年他和我们一起下海时，家里住的房子，一直到他死都没换。”纪世瀛扼腕长叹。陈春先生命的最后10年，尝试过很多行业，比如塑胶手套厂、房地产、数据录入技术，等等，均折戟沉沙。纪世瀛评价：“他过于理想主义，提出的理论都对，执行力和战术大大的不行。”陈春先位于中关村804楼的住宅，有4个房间，共约100平方米。2001年6月21日，在写给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陆昊的一封信中，陈春先表示，希望能把这套房子，连同自己20多年创业历程积累的无形资产，一起作价50万元交给某个公司经营，以此解决自己的医疗和生活困难。不幸的是，这个愿望很难实现，没有公司愿意为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埋单。

另一位曾叱咤风云的人物崔文栋，后来躲债在外，下落不明。他的落魄源于一栋被强制拆除的房子——今天中关村海龙大厦与四通大厦之间的黄金位置，曾经是一家餐馆。崔文栋花200多万买下来，改作自己的“华夏电器公司”门市，红色的玻璃钢装修极尽豪华。谁知修建政府街的命令下来，这些门市房因属红线内的临时建筑，被限令无偿拆除。崔文栋从外地出差回来，眼见一片废墟，欲哭无泪，从此负债累累。

几年前，纪世瀛曾经见过崔文栋：“他打车到我公司，见面先不寒暄，第一句话就是：‘老纪，我兜里没钱了，替我去付出租车钱。’”临别，纪世瀛说：“我请你吃顿烤鸭。”崔文栋说：“不用了，你把吃烤鸭的钱直接给我吧。”

尾声

“早年也有人叫我村长，我不干。”纪世瀛乐呵呵地说，“后来这名号让段永基接了。”他说自己最喜欢的头衔是“中关村第一村民”，因为低调，符合他的处世原则。

既然一直是村民，也就无所谓心理落差。62岁时，纪世瀛从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会长的位置上退下来，转向创办企业家学校。工作之余，生活平和安乐。当年他眼看着成长起来的年轻老板们，如今都成商界大佬，仍然会坐在台下听他讲课。在他看来，善于审时度势，调动一切社会资源，是残酷商战中生存的要诀。“我要赶紧把一辈子积累的经验传授给他们。”纪世瀛说，“在中国办企业，必须熟悉中国的规矩。”

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

1985年：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

1995年：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

2005年：养老不能靠政府。

2012年：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

以上是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把近30年来官方有关养老问题的宣传口号罗列出来，颇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还有一份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2012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当被问及“如果政府和雇主靠不住，养老靠谁”时，38%的中国受访者回答“靠自己”。而在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东亚国家如新加坡和韩国，认为养老应该“靠自己”的受访者占比则超过七成。

养老是政府应该做的事，

享老则是每一个人应该有的梦想。

于德鹏对此表示“呵呵”。他住在北京东五环外的某个小区里，养了一条狗和一只猫。每天在小区里遛狗的时候，他看到很多老人也带着狗在晃荡，身边不见子女，老人的亲密伙伴，只有狗。

是时候讲一个“老人与狗”的故事了，于德鹏想。

于德鹏：带着我的狗去流浪

1978年，于德鹏生在沈阳。在他成长的30多年里，这座古老的重工业城市经历过剧烈的转型。工人和工人子女构成城市居民的主体，如果没有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大规模“下岗再就业”，他们的生活大体上将会波澜不惊：在国企工作的父母退休后，通常会设法安排子女接班——这也是于德鹏的父母给他设计的人生轨道。“这两年我回沈阳，见到小时候的那些朋友，他们看起来都还是‘凑合活着’，他们将来老了的样子我也能想象出来。”于德鹏说，正是因为厌倦了循规蹈矩的生活，他选择来北京闯荡，成了一个电影导演。

他正在筹拍的电影叫《带着我的狗去流浪》。故事框架很简单：一个老头带着他的狗踏上旅途，狗丢了，老头一路找狗，遇到各色人等。按类型划分的话，这是一部典型的公路电影，如同很多年轻人梦想“在路上”，老头也想通过流浪来缓解自己的精神危机。

耐人寻味的是结局：老头的儿女也上路寻父，终于把老头接回家，好吃好喝孝敬着，可没过多久，老头就死了。

之所以想拍这样一个看上去有点儿莫名其妙的故事，于德鹏是从父母的生活状态里，恍惚看到了几十年后的自己。他的父母今年都过了70岁，一辈子生活在东北老家。在一草一木都了然于心的熟人社会里，由于衰老，他们依旧感觉孤独。“两代人有不可弥合的代沟，我自己肯定不想回去，父母也不愿意来跟我住着。他们就像一棵树，在沈阳还算生长在森林里，要是到了北京，一棵树就是一棵树。”

于德鹏经常想自己老了该怎么办，想来想去觉得，没有人可以指望，只有狗会忠心耿耿。他很推崇1987年上映的一部日本电影《忠犬八公的故事》，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一条名叫“八公”的秋田犬和主人相依为命，八公每天迎送主人上下班，某天主人离家后，意外中风去世，再也不能回来了，八公却依然痴痴守候。这个故事平淡却感人至深，以致秋田犬已经成为日本人心目中“忠诚”的象征，如今在东京涩谷车站前还有一尊忠犬八公的铜像。

2009年，好莱坞翻拍了《忠犬八公》。于德鹏也想拍一部类似风格的片子，最好是《忠犬八公》加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那种。2012年4月的第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带着我的狗去流浪》剧本获得了优秀项目奖，这让于德鹏获得了一些信心。他四处筹资，想争取在2013年秋天开机拍摄，2014年上院线公映。男主角他想用李保田，或者中国台湾的金士杰，这两个人比较符合他心目中"有范儿的老头"形象。不过在资金到位之前，一切都还只是设想。"现在有100万的投资了，再找200万我估计就能拍。"

电影节评委黄建新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只是觉得结局太过悲观。于德鹏坚持不改。"作为艺术家我只能提出问题，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他说，故事里的老头死在家里是必然的，表面看来家庭团圆，实际上大部分为人子女者都不明白老人真正需要什么，物质充盈却无法排解内心苦闷。"这个状态是恶性循环。"于德鹏说，"应该是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人信奉养儿防老，但是目前这个社会根本做不到。不管你是有钱人还是穷人，都没办法。"

"我们父母那代人的观念，就是儿子必须听老子的，哪怕错了也得服从。"于德鹏认为，"他们经历过'文革'，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但是人都有叛逆期，所以就会和上一代人有冲突。等过了这个阶段醒悟过来，知道要孝顺老人，父母却已经老了。"

除此以外，悲剧的根源可能还在于欲望。"不仅精神层面渴望关爱，老年人也会有性的需求。"于德鹏想拍的电影里的这个老头，在流浪路上遇到一个老太太，两人互有好感，最后还是放弃了。"现实就是老年人遇到爱情会胆怯，会考虑彼此的孩子能否接受，左邻右舍闲言碎语什么的。他们想找个伴儿是非常困难的。"在东北老家，于德鹏耳闻目睹过很多矛盾丛生的家庭，婆媳关系、财产分割、子女不和……"我就没见过那种理想化的、特别和睦的家庭，能把这么多复杂关系都理顺的。"

一个都没有?

“反正我见过的人中，”于德鹏想了想，“一个都没有。”

李曼华：让我们快乐老去

同为导演，李曼华和于德鹏的不同在于：一、前者是女性；二、看待老年问题，前者比较乐观。

李曼华忙着拍摄的是系列纪录片《我们快乐老去》，2013年4月19日，她在北京举办发布会，宣布这个系列的第一部《希望不是梦》开机。两个片名体现了她的基本看法：衰老并不可怕，老年人也可以快乐、有尊严地生活，甚至可能比年轻时活得更精彩。

这不是李曼华初次接触老年题材。她原本是央视的编导，2007年辞职创办自己的工作室，计划拍摄女性电影。当年就完成了第一部作品《闭上双眼》，在一些国外电影节收获了不错的反响。但是自从2008年开始关注老龄化社会问题，李曼华就放下了“女性电影三部曲”的计划，转而写了两个以老人为主角的电影剧本。“我父母有一天问我，你从央视这样的大单位出来，以后老了怎么办？”李曼华说，“这问题我过去从来没想过，可是父母已经老了，我突然意识到，衰老并不遥远，这事跟我有很大关系。”

2011年，李曼华推出了纪录片《我们正在老去》和同名摄影展，她用积累的大量影像素材讲了三个故事，分别对应当下中国养老的三种基本形式：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老人最大的问题是空巢。”李曼华说，“二三线城镇还好一点儿，老人和孩子基本能生活在一起。空巢率最高的是一线大城市和农村，官方统计数据是63%，也就是说近七成老人处于独居状态。”北京的李奶奶走进了李曼华的镜

头，在《我们正在老去》里，李奶奶每天独自坐在小屋里等待——她有三个孩子，都生活在北京，每周来看她一次。等待每周一次和孩子们的聚餐，就是李奶奶生活的全部。

“其实很多人的父母和李奶奶很像，平时生活很简单，心思都在孩子身上。”李曼华说，“盼着能给孩子做一桌丰盛的饭菜，孩子们吃完就走，剩下老人默默吃一个礼拜的剩饭。”李曼华给李奶奶买了十几个苹果，老人一直舍不得吃，直到苹果烂掉，老人用刀削掉腐烂的部分，把剩下的苹果都吃了。李曼华看得直掉泪，硬要拉李奶奶去下馆子“吃顿好的”，老人死活不去，“下馆子好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

李奶奶是另一位老人辛爷爷介绍给李曼华认识的。2011年拍片的几个月时间，李曼华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寻找合适的拍摄对象，为此她成天泡在北京的几个大公园里跟老人攀谈，询问他们是否同意拍摄。辛爷爷是个爱说话的老头，觉得和李曼华这样的“耐心听众”相处愉快，就允许摄制组进了家，还带他们去拍楼上的邻居李奶奶。拍了不到一个月，辛爷爷的儿子回家，发现一群陌生人支着摄像机在拍父亲，大怒，把摄制组轰了出去。“他不相信我们在拍公益纪录片，说我们是骗子。”李曼华很无奈。

又过了一个月，李曼华接到辛爷爷的电话。“你们回来吧。”辛爷爷说，“我很想你，就算是骗子我也认了。”他有5个孩子，却只有李曼华这样的“疑似骗子”愿意坐下来，陪他喝杯茶，说说话。

老人们在家往往面对“空巢”，住进养老院也未必幸福。北京通州有家民营养老院，专门接收失能失智老人，条件很简陋，入住费用是每月1000多元，平均每个护工要照顾十几个老人。夏天，李曼华带着摄制组过去，看到两三个老人住一间小屋，室内异味扑鼻，酷热难耐，老人们却还盖着厚被子。有个老头大喊“好热”，护工闻声赶到，当着李曼华等人的面把被子一掀，只见老头全身赤裸，大小便都失禁在床上。

“我没有责备这些护工的意思，其实他们也非常不容易。”李曼华说，有个护工在这家养老院工作了5年，很辛苦，月薪也就1000多块，如果她去城里做保姆能多挣几倍的钱。养老院的院长也向李曼华诉苦，有时候护工忙不过来，院长还得亲自干活。“针对富裕阶层的高端养老院条件好些，但收费昂贵。老百姓能住得起的养老院，又频频爆出虐待老人的新闻，吓得大家不敢来住。”李曼华拍摄的这家民办养老院已经坚持了11年，院长说“日子太难过了”。

看过太多人间辛酸事，李曼华有个“85后”的助理崩溃了。拍完《我们正在老去》，助理哭着对李曼华说：“导演我想好了，活到60岁就自杀，我可不要受这些老人一样的罪。”李曼华无言以对。“有段时间我特别恐惧，怕自己变老，怕变得不漂亮。后来三观都颠覆了，知道比变丑更可怕的事情还有好多。”李曼华说，“一味展示悲惨是没有用的，我开始思考，怎么才能改变这一切？”

她想到的办法就是提倡“享老”而非“养老”，帮助老人们重新发现生活的乐趣。李曼华有个同学的父亲是退休工人，整天宅在家里无所事事，时间长了愈发自闭，谁都不爱搭理。李曼华去他家吃饭，老人说的话一共只有“你好”“吃菜”这么两句。吃完饭，老人就默默坐在电视机前一动不动。同学觉得李曼华是“老年之友”，让她帮忙想想办法，怎么才能让父亲变得活泼点儿。

“那天很热，吃过饭我们就切西瓜吃，我发现老人看到西瓜，目光就会多停留一会儿。”李曼华心念一动，问老人：“叔叔你爱吃西瓜吗？”老人答：“爱吃。”“北京的西瓜越来越不好吃了，叔叔你知道哪里的西瓜好吃吗？”李曼华和老人聊起了西瓜，惊讶地发现老人是西瓜专家。“原来他以前下乡插队的时候，跟农民学种瓜，特别有经验。”李曼华的同学都不知道父亲当年这段经历，对她的眼力深感佩服。现在这位退休老人有了新工作：在大兴郊区指导当地农民种瓜，每天乐此不疲地忙碌着。

“所以做子女的一定要用心观察父母，找到他们喜欢做的事。”李曼华说，“人老了就像小孩子一样，你得学会和他们交朋友，告诉他们不妨尝试玩点儿什么，这才叫享受老年生活。”

为了筹拍《我们快乐老去》，李曼华经常参加各种公益和商界的活动，向四五十岁的社会中坚们宣扬她的“享老主义”。她发现很多中年人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种种问题就扑面而至。一次饭局上，有个事业成功的朋友喝醉了，当着李曼华的面掉泪，说自己很失败。“四十多岁的男人，很有钱，也很孝顺，曾经认为钱可以解决世上所有的问题。”李曼华说，“可他80岁的老父亲某天突然离家出走了，到一个老阿姨家里去同居。我这个朋友想不通，80岁的老人还玩私奔，让孩子的脸面往哪儿搁？”

“我就跟他说，你的孝顺只是把自己喜欢的东西给老人，却不知道老人想要的是什么。”在李曼华的建议下，朋友试着去理解父亲的想法，请父亲和阿姨回家吃饭，表示支持他们在一起，“结婚也可以啊。”

“不知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想过，人生的最后10年，你想怎么度过？”

2013年5月18日，李曼华在“一席”发表演讲：“我曾经在深夜里醒来，再也无法睡着，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我希望，我最后的10年：我爱的人还在我身边，还有几个能说话的朋友，我身体还算健康不需要坐轮椅，我头脑还算清醒可以做点儿和电影有关的事，我能过着有尊严的老年生活。我想说，养老是政府应该做的事，享老则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的梦想。”

“我已经影响了一些认识的人。”李曼华很高兴看到自己的努力成果，“前几天李奶奶打来电话，说要请我下馆子呢。”

周茜：大公司研究大问题

2013年“五一”期间，李曼华受邀参加了“2013芯世界·社会创新周”活动，她在这里认识了主办方代表周茜。

周茜来自英特尔公司，她有两张名片：作为公益活动的组织者，她是“芯世界社会创新中心执行理事”，而在公司内部，她又是英特尔（中国）的“社会创新经理”——这个听起来让人不明所以的头衔，其实代表了英特尔这样的大型跨国企业在常规商业行为之外，试图担负更多社会责任的愿景。

这是周茜的部门与南都公益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公益机构合作举办的第二届“社会创新周”。为期三天的活动，容纳了主题讲坛、互动工作坊、公益影片展映、户外创意活动、公益演唱会等多种形式，集中探讨社区、教育、养老三大主题，参与者包括10多位演讲嘉宾、近50家公益组织和2000多名观众。在“养老”这个主题版块中，李曼华是演讲嘉宾之一，还有几位嘉宾也各有所长：来自上海的吴含章创办了“老小孩”网站，这是一个专门针对老年人的社交网络，吴含章相信老年人不仅有能力掌握电脑，更有强烈的社交需求，两者结合就产生了机会。“设想一下，当一个老人在网络虚拟社区里，把自己的人生感悟和生活片断，用文字、照片、视频的形式发布出来，他很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可能现实生活中还碰不到这么多人。”吴含章说，“老人们还能在网络上购物、学习、求医问药，组织各种线下的兴趣活动。我想他们不仅需要现实居住的社区，也需要虚拟的养老社区、精神家园。”还有来自北京的“乐龄合作社”创办人王艳蕊，她在倡导为老年人提供专业的社区生活服务。“乐龄这个词是从新加坡来的，把退休以后的老人叫乐龄人士，希望他们退休以后能够更积极、快乐地面对生活。”王艳蕊组织很多老年人参与一些简单的社会工作，让他们既能获得收入，又能找到自身的价值。“老年人的快乐是一个家庭的快乐，也是一个社会的快乐。”

而周茜的工作，就是努力发现更多的吴含章和王艳蕊们，支持这些中小型公益组织和专业人士的发展，同时从中挖掘潜在的社会需求。“我们部门的存在就是为了发现社会问题，养老只是英特尔关注的众多问题之一。”周茜介绍说，“当我们发现某个社会问题背后存在着广泛而迫切的需求，就会提交给产品部门来研发对应的解决方案。”英特尔是芯片生产商，有能力为许多社会组织和商业机构提供底层IT（信息产业）技术支持。周茜举了个例子：河南漯河以出产火腿肠闻名，当地有很多为肉联厂供应生猪的养猪户，但是生猪出栏量与肉联厂需要的供应量经常不匹配，造成生猪价格波动，影响养猪户收益。英特尔的工程师就设计了一个小芯片，安装在猪耳朵上，用来监控生猪出栏量。芯片里的数据和肉联厂供销系统的数据库同步，能够有效减少“杀了猪卖不出去”的麻烦。

这样的小发明，有很多都出自周茜所在的社会创新部门。“同样的道理，如果吴含章的老年人社交网络想给老人们提供订餐服务，我们也有可能研发相应的智能设备，让老人们动动手指就能上网订餐。”说到养老问题，周茜并不看好机构养老模式，“机构养老意味着首先要有大量的养老院，还要划分不同的等级价格，更重要的是，机构养老实际上让老年人脱离了亲情关怀，他们会感到孤独。”英特尔正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社区养老模式，美国、欧洲和日本都在由机构养老向社区养老模式转化。“我们所说的社区养老并不只是开发养老地产这么简单，很多老年公寓更多基于商业层面考虑，目的是盈利。”周茜说，“真正好的养老社区，应该包括无障碍的、优质的生活和健康服务，这也是英特尔努力的方向。”

周茜有个同事正在带头研究针对“失独”老人的服务系统。“他自己是个独身主义者，40多岁，未婚，经常说将来老了就是一个人过日子，所以现在必须想出解决方案，也许20年后就能享受到。”这次“社会创新周”活动，周茜本来还想邀请日本和韩国的两家养老公益组织来交流经验，因故未能成行，但他们的理念和运作方式对中国很有借鉴

意义。“我们一提起NGO（非政府组织）就觉得是少数志愿者的工作，可是国外的很多NGO非常庞大，甚至有几万人的规模，这种超大型NGO组织所能产生的效益也堪比跨国公司，一说营业额都有上百亿。中国就还看不到这样的。”周茜说，“我相信将来会慢慢发展到这个阶段，也许等我们老了以后，养老不再是个难题，而是一种成熟的商业模式。”

回龙观足球超级联赛

豆腐很忙。

2012年9月19日这天上午，豆腐和野马先跑去参加北京团市委召开的会议，主题是探讨“如何推动社区青年融入社会”。作为北京回龙观地区足球超级联赛（简称“回超”）仅有的两名专职工作人员，豆腐和野马已经在镇、区、市各级政府部门挂上了号，经常有些涉及“群众文化活动”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会议请他俩去介绍经验。豆腐曾经参加过的高级别会议，市长坐在下面听，豆腐在台上作报告说“我是干出来的”。市长笑了，问此话怎讲，豆腐回答：“现在国家不是提倡从竞技体育向全民健身转型吗，我组织了这么多年回超，回超就是真正的群众体育。”2009年底，央视体育频道搞“体坛风云人物评选”，通知豆腐入围了其中的“年度未名人士体育精神奖”——所谓“未名人士”，就是没什么名气，但确实为中国体育事业作出了贡献，这个说法让豆腐激动不已。结果没评上，“得奖的都是七八十岁的老头，眼看快不行了，有点儿终身成就奖的意思。我才30来岁，不急。”

足球圈是个江湖，

无论职业还是非职业，

总有很多江湖规矩的暗流。

豆腐本名王玉宇，生于1977年，他的助手野马名叫张跃跃，1982年生。回龙观踢球的圈子里习惯互相称呼网名。两个年轻人相信自己折腾的事情，早晚会获得更多肯定。

开完会出来已经正午，两人找个小馆子随便吃点儿，接着开车到菜市口一家体育用品店买了十几个足球。2012年上半年的回超比赛刚刚落幕，排名靠前的球队除了有奖杯，还各发几个足球当奖品。买好了足球，再到北三环边上另一家店拿订做的奖杯，把这些东西运到回龙观的办公室，已经下午4点钟。

办公室在昌平区青年创业促进中心的小楼里，一个不大的套间，门口挂牌“草根兰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窗外鸟鸣树幽，室内热火朝天：豆腐在不停接打电话，野马在电脑上修改赛程，有位附近中学的体育教师来找豆腐商量规则细节——回超每场比赛都请一些中学或大学的体育教师来当裁判员，主裁和巡边一应俱全。今年回超首次启动了秋季联赛，往年踢到8月就算大功告成，现在看来，豆腐和野马要忙到12月初了。

这是“回超”的第9个年头。18支参赛球队、七八百名注册球员，每个周末有10场比赛在回龙观地区的五六块草坪上轮番进行。观众兼啦啦队主要是球员家属，他们都是回龙观社区的业主，开幕式的时候呼啦一下能来三四千人。“你说这么多人要不踢球会干什么去？”豆腐觉得，组织这么声势浩大的民间赛事，让几百个身强力壮的男人在阳光下挥洒汗水，起码有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不过他也很焦虑。回超每年的运营成本大约二三十万元，商家冠名赞助在10万元上下，回龙观镇政府支持一两万元以示鼓励，其余都是球员们自掏腰包。“职业球员是谁踢球谁领工资，我们是谁踢球谁交点儿钱。”孙向学是回超球队“知本新联”的一名球员，平时正经职业是做IT的，每年交800块钱，享受每个周末都有球踢的快乐，“跟去健身房差不多。”

豆腐认为回超的商业价值还处于远被低估的阶段，他甚至不乐意把回超与国内的职业联赛相提并论。“我们的目标是英超。”豆腐说，“英超最早就是从社区俱乐部开始玩儿的，发展了一百多年，变成

职业化、国际化的顶级赛事。”他说着又接起电话，手往办公室墙上指，那里挂着4个遒劲的大字：

百年回超。

野球年代

回龙观是北京著名的超大型居民区，位于北郊的昌平区，过去是荒僻的农场。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叫“中越友好人民公社”，后来中越关系恶化，改称“中日友好人民公社”，又过了几年公社取消，改为“北郊农场”，农场的家属院就是回龙观地区最早的住宅。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北京开始大规模兴建经济适用房，北郊农场的主导产业转型为房地产，回龙观变成了巨大的建筑工地。2000年以后小区陆续建成，城区居民大量迁移至此。如今回龙观居民已超过40万人，相当于美国一座中型城市的人口。

回超早期的核心成员，大都经历过一段“踢野球”的岁月。在尘土飞扬的马路边，抑或废弃的公交停车场里，拿几个矿泉水瓶子搁地上当球门，回龙观最早的一批经适房业主们踢起了杂乱无章的足球。藏龙岛主、园丁、王壬、罗伯特、国庆、老穆、老闫……三五十个经常踢球的业主很快形成了小圈子，他们在BBS（网络论坛）和QQ上保持着紧密联系。“有在学校当老师的，有自己开小公司的，有打工的，也有刚毕业的学生。”2001年豆腐在回龙观买了房，发现周遭一片荒芜，344路公交车总是塞满了人往城里开，又塞满了人开回来。回龙观是一座不折不扣的“睡城”，大家白天进城上班，晚上回来睡觉，业余时间精力无处发泄，只有夕阳下马路边光着膀子踢球的人们活力无限。有个搞建筑的业主叫黄牛，见大伙儿野球踢得辛苦，友情赞助了两个铁管焊成的球门，算是回龙观野球界顶级装备。

附近的华北电力大学和北京农学院倒是有两块像样的球场，周末总是人头攒动，几拨人轮换着上去踢，时间长了就觉得混乱不堪，还是应该有点儿“组织性纪律性”。2002年8月，回龙观第一支足球队“野猪林”成立，首批正式队员18人。“有个叫老兔子的，还有个哥们儿叫911，说咱们回龙观组个队，跟天通苑那边踢个比赛吧。”天通苑是回龙观以东的另一处超大型社区，两个地方经常踢球的人都彼此熟识，胜负无所谓，比赛只为娱乐，踢完球就啸聚饭馆，大瓶喝酒大块吃肉，“有点儿绿林好汉的意思。”豆腐说，又因为“业主”与“野猪”谐音，“野猪林”足球队的名号由此诞生。那天聚餐的饭馆主营大连海鲜，包间都是各种地名，野猪林队那个包间赫然叫“中南海”，所以史称“中南海会议”。

球队成立后设计了统一的队服、队旗、队徽，有标准化的规章制度，对球员的训练和比赛作出安排，各项细节都向职业俱乐部看齐，队员们感觉很过瘾。没能入队的野球爱好者们艳羡不已，商量着成立更多的球队。快乐队、破马车队、天龙队、回联队……七八支球队陆续成军，各具特色。“野猪林队的门槛比较高，回龙观第一批踢得好的人都在里边。”豆腐说，“快乐队听名字就弱，因为他们的宗旨是不管输球赢球都快乐。”老闫带领的回联队以回龙观地区原住民为主，刚成立不久就拉到了第一笔赞助，一家房地产集团每年给球队2万元冠名费。破马车队是豆腐牵头组织的，自觉实力超群，悍然向野猪林队发起挑战。2002年底那场球在大雪中开战，上半场破马车队就被灌进4个球，守门员还被踢伤了手。豆腐是辽宁人，学生时代练过中长跑，本来在球队里踢前锋，看情况紧急，下半场换岗守门，居然守得不错，在野猪林队汹涌澎湃的攻势下只丢了两个球。比赛踢完，野猪林队的领队老兔子找到豆腐，说我们准备代表回龙观，参加北京全市的一个业余足球联赛，你来守门吧。

这个联赛叫“易足”，当时办到第二届，也是一帮足球爱好者拉赞助搞起来的。野猪林队踢了几场，渐入佳境。“不说见谁赢谁吧，反正

别人想赢我们也费劲。”豆腐说，可惜2003年“非典”来了，比赛半途夭折。

“非典”肆虐的日子里，很多人没法上班，拿着工资闲居在家，踢球只能就近约。回龙观的各支球队都设立了联络人，每周互相约球，约完对手约场地，场地经常被占，有时候搞定场地又发现没有裁判，需要协调的事务琐碎且繁多。几支球队的核心人物碰头商量，干脆统一组织起来，搞个联赛，以免去约球之苦。

2004年9月，回龙观第一届“业主杯”足球联赛鸣哨开踢。

商业运作

野马刚满30岁，偏瘦，和已经发福的豆腐站在一起，像对说相声的搭档。“每天都要踢会儿球，不然浑身不舒服。”野马说真正爱足球的人不会觉得这份工作累，说着往身上套了件缀有反光条的背心，拿起小旗和哨子，跟着主裁判和两队球员一起走向草坪中央。这是2012年10月13日中午12点半，回超秋季联赛第二轮，野猪林对阵知本新联的比赛在回龙观中学准时开场。野马担任边裁，主裁照例由一位体育教师担任，他执法一场比赛可以拿到100元劳务费，这个数字8年没变过。

现在回望2004年的第一届联赛，藏龙岛主和豆腐都觉得比较业余——无论踢球的水平还是组织的水平。9支球队踢了一个多月就草草收场。就在同一年，中国足球顶级职业联赛从“甲A”升级为“中超”，可看性仍然乏善可陈。深圳健力宝最终击败山东鲁能泰山，获得中超元年的冠军。“如果整个中国足球的大环境很好，回超这样的草根联赛就没有任何可研究的价值。”豆腐说，“恰恰因为大环境越来越差，职业联赛都经常打架，黑哨赌球什么的更不用说了。”这种情况下，没有利益

争夺、只在赛制和行头上模仿职业比赛，回龙观的球迷们过了一把“正规军”的瘾，享受到足球运动带来的纯粹快乐。

到了第二届，回龙观的业主们决定玩大点儿。2005年3月，回龙观业主足球协会成立，园丁担任主席，副主席是王壬和罗伯特，秘书长兼财务部长由藏龙岛主出任，还有宣传部长国庆和法律顾问老穆。“回龙观足协”搭起了有模有样的班子，史万春、年维泗、沈祥福等中国足坛元老也被请来做指导。王壬四处奔波，联络回龙观镇政府和公安局，给回超取得了合法许可。主管文化工作的副镇长蔡淑玉多年来一直支持回超，在她的协调下，北京农学院球场的场租费给回超打了对折。第二届的参赛球队扩充到11支，回龙观足球联赛正式加上了“超级”二字。

不少媒体跟进报道，让回超打响了名气，北京其他几个大型社区纷纷效仿，2005年和2006年，业余足球联赛在北京遍地开花。豆腐问野马：“你说全北京有多少支业余球队？”“起码一两千支吧。”野马估计。俩人开玩笑说，别的社区玩不过回龙观，比如天通苑的“天超”，天天想超都超不过去；大兴的“兴超”，兴许能超；只有通州比较狠，“通超”通通超过。这么多社区联赛综合观察，回超未必是踢得最好看的，但组织规范化水平最高。“回龙观足协”的几位主要负责人为此搭上了全部业余时间，他们几乎每天下班都聚到老穆开的饭馆里开会，商讨赛制、日程和规则，争论到午夜回家睡觉，第二天白天抽空落实。这样折腾到2006年秋天，第三届回超落幕，鲜花和掌声之下，所有人都筋疲力尽。

豆腐在这个当口挑起了第四届回超的担子，园丁、藏龙岛主等人陆续退出管理层。“我们忙活回超的事连家都顾不上，本职工作也受影响。”藏龙岛主说，“如果没有豆腐接手，回超可能就是昙花一现。”豆腐当时的工作是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咨询，月薪过万。“本想耽误一两个月，把回超组织好了再去上班。”不料事情越弄越多，工作一推再

推。“最后公司不等我了，说你这踢球没完没了，我就毅然决然放弃工作投身公益事业啦。”豆腐大笑，“其实我没那么伟大，媳妇说我就是玩物丧志。”

豆腐接手回超，第一件事就是找钱。“当时有个朋友的公司，给5000块钱说赞助回超，是个做IT的什么品牌。大家讨论这事的时候，又有人说能拉一万块钱的赞助。”豆腐说一开始大家都没有商业化运作的概念，有些球队的负责人觉得“有奶就是娘”，有人肯出钱就得乖乖接着；另一部分球队主张回超还是要坚持纯公益特色，避免掺杂商业利益。“我问那个出10000块的叫什么名字，一说是‘欢喜堂’，做性保健用品的。”踢球的都是壮年男子，也算“欢喜堂”的目标消费人群，但豆腐觉得听起来还是有点儿怪怪的。最后这家公司选择冠名球队，“欢喜堂野猪林队”至今活跃在回超赛场上。有人问豆腐，10000块钱你都不要，那你说回超值多少钱?

10万！豆腐说，起码这个数。

话出口就收不回来，作为回超的当家人，豆腐硬着头皮去拉赞助，一开始把目标锁定在知名品牌。“那些职业体育赛事的赞助商，我联系过几十家，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耐克、阿迪达斯、李宁、红牛……都很难找到管事的，人家全国比赛还顾不过来，一听你是回龙观的就没兴趣。”豆腐反思了一下，开始扫描身边的区域商业品牌，他找到了刚刚在回龙观开张新店的华联超市。

“因为回超本身就是一个区域品牌，这是我给回超的商业定位。”豆腐往华联超市跑了20多趟，终于见到了一位老总。“我跟他说的是，华联在回龙观开业需要宣传，我这项有几千人参与的活动，起码影响几万人，还能在回龙观一带的街头挂横幅，这都是有主管部门许可的，你花很多钱未必挂得上。”又谈了几次，对方说，给你3万吧。

豆腐当时就拉下脸来。“这是个气节问题。”他觉得3万这个数有“施舍”的味道，而回超不需要施舍。当时央视体育频道《足球之夜》的编导对回超感兴趣，带着摄影师跟拍豆腐好几天，最后摄影师都急了，把机器一撂，说谈不成就别谈了，“我拍过中超所有的球队，没见过对足球感情这么深的人。”华联老总一愣，说你们是一起的吧。摄影师就掏记者证出来拍桌子上，说我拍完片子就走，跟这事没关系，只想说句公道话，像回超这样的比赛如果完全商业化运作，绝对不是10万块钱能拿下来的。

豆腐现在都很感激这位摄影师仗义出手，帮他拉来了“北京华联杯”第四届回超的10万块钱冠名费。2007年的回超盛况空前，历时4个多月，21支球队、400多名球员参加，开幕式聚集了上千人，豆腐还拉来了秧歌队和少林武校的表演，场面煞是热闹。赛季结束一算账，居然还剩3万多块钱。豆腐一挥手：“分红！”

游戏规则

“草根兰”公司2009年初注册成立，目前只有豆腐和野马两个人。公司除了操办回超，每年还办一场“回龙观春晚”，这都是公益为主、商业为辅的项目，赚钱的活计得靠承接几个公司年会和婚庆策划，一年下来略有盈利。“回超做到第五届的时候，我媳妇学着外交部的架势，每天对我提出‘严正警告’。我也想再找个饭碗养活自己，可发现已经找不到月薪一万块钱还能让我有时间精力组织回超的工作了。”豆腐说，“没办法，我放不下来。”

放不下来的原因之一是“虚荣心”，豆腐说经常有媒体来采访回超，自己一会儿上报纸了，一会儿又上电视了，“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回超有很多不同于职业联赛的游戏规则，像一门学问吸引人钻研。

比如奖励制度，2007年“分红”分掉的3万块钱，有人提议按奖金发放，排名靠前的球队多拿钱。豆腐反对，坚持各队平分，理由是大家踢球图的是个乐，不是为了争名次。“这就是我们跟职业联赛的区别，我认为奖金越高，业余联赛生存的空间就越小。”指着刚买回来的十几个足球，豆腐说今年回超冠军球队的奖品是三个球，亚军两个，季军一个。但是另外还评选“精神文明奖”，全年没有打架的球队可以参评，在都没打架的球队里，犯规次数最少、球风最好的球队获奖，也给两个球。

“大家平时上班就挺累，周末踢个球还你死我活的，下礼拜坐轮椅上班去了，那就是扯淡。”野马也认为，在北京乃至全国大大小小的业余足球联赛里，回超对于恶意犯规和球场斗殴的处罚可能是最严厉的，“打架的一票否决。”每年回超都会开除几支队伍，只要球场上打起来，整队开除，动手打架的球员停赛三年，牵涉到的球员停赛一年——这有点儿“连坐”的意思，犯事的球队找上门来说情，豆腐一概顶回去：“你俩是一个队的不？是一个队的，看见他打架你不管，你就也有责任。你说中超都没罚这么狠的，对不起，你参加的是回超。”

还有一项特色规则叫“上三下四”，这说的是换人——允许上半场换三次，下半场换四次，而且每次可以换三个人。职业比赛如果这么搞一定乱套，可回超重在参与，要努力给每个人上场机会。“一个队伍可能二三十个人，周末都是出来玩儿的，老坐冷板凳人家就不来了。”但是又不能频繁中断比赛，索性每次多换几个。还有些人到了三四十岁，成天抽烟喝酒，体力越来越差，跑一会儿就喘，这也没法踢太久。“职业比赛的规则是优胜劣汰，回超是让你想踢就踢，踢不动了就下场休息。”豆腐说，“人都会老，规则要灵活调整，不然我们走不远。”

很多人已经察觉老之将至。10年前踢野球的业主们，大多在球场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回龙观新一代移民，其中不乏狂热球迷，因

为看中了回龙观浓郁的足球氛围，决定在这里买房定居。更多的是天通苑甚至通州开着车过来的年轻人，以外援身份在回超踢球。“回龙观足协”前任副主席罗伯特老早就意识到这里有问题，就回超外援制度跟豆腐争论过。2007年那个赛季，前国脚高峰和前北京国安球员宫磊成了回联队的外援，把北店龙马队踢了个10:0。“他们经常一场球进十个八个的，到后来大家都不跟他们玩儿了，他们自己也觉得没劲。”罗伯特认为回超还是应该以回龙观地区居民为主，但豆腐为了延续比赛活力，放宽了外援的限制，规定外援可以占到全队人数的30%，这样每支球队大约都有七八个外援。有些队人缘好，拉来很多高水平外援，甚至职业球员，确实打破了回超的实力均衡，豆腐就会“宏观调控”一下。“你今年为了争名次狂拉外援，明年你整个队就别踢了。”

在回龙观坚持踢了10年球的人，豆腐还能数出几十个来。“过去大家靠情感维系，但情感很容易出现裂痕，这就得有一个规范化的体制才能长久。”回超有准入制，发扬民主作风，每个赛季由各队的负责人对新申请加入回超的球队进行投票表决。但这种民主不是绝对的，在出现争议时，豆腐有一票否决权，轻易不使用。有一次某支球队打架，5个人因为不服判罚，把裁判打了一顿，这事触到了豆腐的底线，他决定必须开除该队。照例该有个投票程序，但豆腐宣布取消投票，“不要民主了，直接开除。”

央视《足球之夜》制片人刘建宏对回超的模式很看好：“我们国家足球都搞专业队，但国外很多职业球队最初都从社区中出来，英超一些豪门俱乐部都来自社区。我也在等，看能不能从回龙观走出职业队。”这个目标对豆腐来说有点儿宏大而遥远，他现在整天操心的还是琐碎事务。足球圈是个江湖，无论职业还是非职业，总有很多江湖规矩的暗流。豆腐跟我聊天的间隙接了个电话，脸色立刻暗淡下来：下个赛季谈好的场地租金，本来11万可以搞定，前几天有人通知他要涨到15万，这个价码咬咬牙还能接受。现在又有人放出风声，说再涨到20万。“像这种学校的球场，按政策说是节假日全部免费向公众开放，

实际上你看全北京有几块球场是免费开放的？中间都有人包下来，再抬高价格转租。”豆腐说，“我也不建议全都免费开放，但你收费得适度。这些事都没法搁到台面上来谈。”

回超的财务状况依然捉襟见肘，2007年的10万元赞助是个小高潮，2008年赞助商换成了一家快餐店“星期8 Pizza”，老板也是球迷，要给10万。豆腐盘算了一下说不行，谢谢你好意，给6万就行了。“老板有点儿意气用事，觉得这是社区活动，在社区做生意就要支持。实际上你想他那个披萨饼三四十块钱，要吃多少才能吃出10万块钱？”豆腐在回龙观的60多个小区里悬挂条幅，还印了2万份宣传单，挨家挨户宣传回超，仍然觉得没办法给赞助商带来足够回报。“我不能让商家觉得赞助回超是亏本买卖，又不能说今年的钱比去年少，那去年的赞助商该有意见了。”他对外仍然宣称拉到了10万元赞助，媒体也按这个数字报道，到赛季结束算账的时候，麻烦来了：几个领队拿着报纸质问豆腐，报上说今年有10万元冠名费，现在怎么变6万了？

“我吃苦受累都没法说，”豆腐叹口气，“确实心生退意啊。”

2012年10月13日，阳光灿烂。豆腐戴上手套站在球门前，看着场上拼抢的球员，稍微有点儿恍惚。他已经很少踢球了，曾经一起战斗的朋友们各奔前程：藏龙岛主做生意被骗，刚攒的几十万块钱都搭了进去，现在重新打工养孩子去了；老兔子偶尔在歌厅里能碰见；王壬和国庆有自己的事业在忙，也很少踢球了。豆腐自己的孩子刚一岁半，还不到在草坪上撒欢儿的年龄。豆腐有时候看着孩子想，等他长大了，回超还在吗？

后记
做你短暂的知己

这本书是我记者生涯的部分总结，主要跟我在《新京报》和《全球商业经典》的工作有关。

2007年到2012年我在新京报社，大部分时间是做文化记者，得以频繁接触一些作家、学者、艺术家、摄影师。这些脑袋里装满鲜活思想的人给我很多启发，事实上很多人本身比他们的作品更有意思，甚至有些人和作品散发着迥异的气质。比如杨显惠老师，他的书里写满苦难，人也常年奔走在西部山野，据此想象该是个苦大仇深、眉头紧锁的老人。但是我们见面在酒馆里，他喝得满面红光，不说话的时候就呵呵傻乐。和杨老师的酒局促成了我们“六根”团伙的成立，绿茶在这套书的总序里有提及，不再赘述。后来我跟着杨老师跑了一趟甘南藏区，每天吃羊肉喝青稞酒，同行的姑娘们编了个花环戴在他头上，杨老师笑得就像花儿一样。

但是坐下来谈论文学和历史时，有那么一瞬间，我看到了他心里的火。当你知道了一些人的故事，这些人就会住进你心里，成为你的一部分。这些心里的居民大部分时间是沉默的，只有某些契机能将他们唤醒，比如写作，比如采访，比如很多烟草和酒精。我喜欢记者这个职业，是因为有机会造访他人的内心世界。阎连科讲他年轻时候逃离农村的梦想；刘香成在北京奥运前夕谈论对中国传媒业开放的期待；陈冠中跟我聊香港是因为他已经定居北京，但是有本小说还是只能在香港出版；黄永玉和李泽厚这样的文化老人阅尽沧桑，到老了玩心大盛，对他们而言再没有什么事值得忧虑。

理想状态下的采访，应当是平等、坦诚的交流。写了几年人物稿，我深觉人是复杂的动物。很多夫妻相守几十年未必真正相知，短短几个小时或是几天的对话，又怎么可能看透人心。可我仍然觉得，在和他们谈话的某些时刻，在左思右想终于动笔写他们的那几天，我能够短暂熟悉对方，甚至是他们短暂的知己，这就足够。

离开报社后我参与过几本杂志的工作，其中2013年在《全球商业经典》的写作经验比较有趣。在文化之外，商业是理解纷繁世界的另一把钥匙。接受系统的经济学思维训练非常重要。我对数据不敏感，吸引我的还是一些人的故事。在广州，我跟一群来自非洲和中东地区的黑人客商厮混多日，这些友善的黑人朋友对中国社会变革以及全球化的理解，可能比像我这样的很多中国人还要深刻。在北京的回龙观，一群热爱足球的青年很认真地操办着社区联赛；在2003年SARS肆虐的时候，一家汽车电影院成了恐怖城市里的乐园……很多故事无非在告诉我们，商业可以很好玩，可以充满人情味儿，商业才是驱动时代进步的强大动力。

这些故事里还有一个人尤其打动我，他叫黄永，曾经为美国的媒体工作，是最早把中国的SARS疫情向全世界披露的人。我在书里写了他对死亡的看法，当时我们对这篇关于他的文章应该怎么写还有过争论。黄永先生不太理解我为什么要写他这个人，在他看来，只有新闻有价值。我倒觉得新闻速朽，旧闻反而常看常新。他已经去了天国，愿他像在人世一样自由、快乐。

除了给我讲故事的这些受访者，还要感谢很多朋友，没有他们就没有这本书。在《新京报》时经常编我稿子的是绿茶，我们配合默契，屡获嘉奖。潘采夫当时也是我的编辑，他主要负责短新闻和快评论，这两样东西我最怕写，所以他的任务是给我打击。我自己有时也做编辑，李辉、浩月、匡政诸兄都曾在危急关头赐我稿子，李辉还是我采访文化老人的引路导师。新京报的领导对我都挺好，尤其是副总

编辑何龙盛，谢谢他的宽容，但他的酒量太差了。到了《全球商业经典》，汪若菡和刘晋锋两位女士指使我去做了很多精彩的选题。虽然这本杂志已经散伙了，但我们的友谊长存。

最后表一下决心：我还会继续写下去，希望你们喜欢。

武云溥

